

K250.6

31

2:4

革命史资料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北京



A 881696

革命史资料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地质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11月第一版·198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8¹/₄ 字数：188,000

印数：1—30,300册 定价：1.00元

统一书号：11224·66

目 录

- 中原突围.....王首道 (1)
- 从黑暗走向光明
- 记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 苏 进 (13)
- 与魔鬼打交道的广大华行 吴雪之 卢绪章 (70)
- 广大华行的性质与任务——掩护体的由来——为党的
秘密机构奠基——打开对美国的贸易关系——总行转移
上海——总行南移香港——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深刻
的体会
- 赤水两岸.....周 彬 (88)
- 不动干戈的战斗
- 参加和平解放绥远的回忆.....何树生 (109)
- 新开岭全歼“千里驹” 彭嘉庆 (122)
- 红军与蔡廷锴、陈济棠之间几件往事
-邹毕兆 (134)
- 新四军的战歌 陈文熙 (137)
- 神兵夜袭阳明堡 汪乃贵 (149)
- 和邹子侃、何觉人同志一起坐牢的日子

.....	庄启东 (155)
囚日.....	尚 钺 (166)
海上遇险记	伍瑞卿 (177)
护送陈毅同志赴延安	曾昌明 (186)
巧过封锁线	邵剑秋 (194)
长乐村战斗	郑加平 (202)
于会泳出国丢丑纪实.....	侯德章 (208)
最初的印象——江青的“关怀”——住房的风波——难	
产的首场演出——枝节横生——安德鲁斯宾馆——	
五次交涉——外事活动——两副面孔——别扭	
的开头——演出和演员——接见与赠礼——临别的争	
论——混乱的收尾	

考 证

王佐、袁文才被杀事件	(240)
关于叶挺同志的资料	
被囚期间的叶挺将军.....	沈 醉 (252)
叶挺将军在恩施的几件小事.....	柯南山 (258)

中原突围

王首道

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接近发展到第三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这一年秋天，党中央制定了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在巩固、发展华北、华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一方面派遣一批干部奔赴东北，增援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派遣八路军三五九旅的主力 and 抽调一批干部挺进华南，开辟湘粤赣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以后由于抗战加快了进程，三五九旅南下部队刚走到广东南雄，日本帝国主义即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三五九旅南下部队被迫挥师北上，回到中原地区，与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合。从此，我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阶级矛盾，重又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国民党反动派在停战令生效以后，仍处心积虑地妄图消灭我中原军区部队，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起，即积极对我进行军事围歼部署，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四月底，蒋介石从西安飞到汉口，召见国民党武汉行辕党政军官员，直接策划中原之战，并指使白崇禧在河南新乡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谋划突然袭击宣化店，同时进攻豫皖苏解放区，以策应发动全国性的大内战。中原地区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对我们中原部队十分关心，

根据当时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对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周密详尽的部署。周副主席代表我党肩负着从政治上彻底揭露美蒋阴谋，以便为中原部队顺利实行战略转移创造条件的重大任务。五月五日，周副主席在得悉蒋介石这一毒辣阴谋的确实情报以后，立即向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美国代表马歇尔提出组成三人小组去宣化店实行监督的紧急要求。周副主席对徐永昌、马歇尔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和反复的交涉，在铁的事实面前，美、蒋双方被迫不得不接受周副主席的建议，派出代表，组成三人小组来宣化店视察。

宣化店是鄂北的一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居住着百十户人家，座落在鄂豫皖边的一个小小的盆地里。它四面环山，地形险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攻，我中原部队以此为中心，坚持着反围困的斗争。

中原军民日夜想念和盼望的周副主席来了，他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温暖和关怀。李先念、王震等同志在镇口街上热烈地欢迎周副主席。我中原军区军民在被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紧紧包围中见到了周副主席，比见到了自己的亲人还亲，激动的泪水充盈着每个人的眼眶。人们兴高彩烈，奔走相告，无比欢欣地欢迎周副主席的到来，阵阵欢呼声象滚滚春雷响彻了大地。

当晚，周副主席召集我们中原部队领导同志开会，他首先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全体军民表示亲切的慰问，听取了我们中原部队领导同志汇报关于敌人围困、进攻我军的情况以及部队思想情绪和部队粮食、被服、弹药供应情况，最后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从革命全局出发，考虑到全国战场的态势，决定中原解放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以粉碎敌人围歼阴谋的指示，并和我们一

起研究，对如何突围和突围时间、路线等都作了具体周密的部署。会议开完时，已是雄鸡唱晓了。

第二天上午，在街头一个祠堂里，三人执行小组开始举行会议，解决中原地区停止内战问题。美、蒋代表对这次来宣化店视察毫无诚意，在会议上大耍阴谋手段，尽力掩盖企图挑起内战的真相，并虚假地作了一番保证。周副主席在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他严肃地列举大量事实，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地发动内战，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阴谋和罪行，指出这是对《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的粗暴破坏和践踏，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如胆敢进攻中原解放区，破坏停战协议，以致全国糜烂，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美、蒋代表在大量确凿的证据面前，理屈词穷，无言可对。

接着，周副主席抓住国民党代表王天鸣在会议上虚情假意的口头保证，将了王一军。周副主席用诙谐的口吻说：“诸位都听到了王天鸣将军刚才所作的保证，他说，国民党完全没有意思要消灭抗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没有意思进攻人民的子弟兵，那很好，我们欢迎。今后怎样？要看行动。我想，今天在座的人都可以作证。”周副主席讲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们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振奋与高兴。阴险狡猾的美、蒋代表却尴尬地呆坐在一边，脸上哭笑不得。

会后，周副主席不顾持续工作的劳累，抓紧时间又到附近军区各机关、部队去慰问。每到一地，干部和战士们见到了周副主席，纷纷倾诉心中对美、蒋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围困残害我中原解放区军民的罪行和愤怒。周副主席和大家一样端起一碗野菜粥，边吃边和干部、战士们亲切地谈话。他说：“同志们在

敌人的围困进攻和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宣化店，拖住了几十万蒋匪军，毛主席曾经多次表扬过你们。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坚持斗争的意义，有你们在这里，蒋介石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们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在这场斗争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都立了大功。”

干部和战士们听了周副主席的话，心中洋溢着火热的激情，纷纷向他保证：“请副主席转告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有信心粉碎敌人的围歼阴谋，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周副主席高兴地朗声笑了，他勉励同志们：“说得好，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宣化店，与美蒋反动派进行的这一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被围困的中原部队突围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战略大转移的有利条件，并亲自指导了这一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所以暂时坐在谈判桌旁，完全是被迫的，他们不过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部署反人民的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六月，蒋介石在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部署的同时，在中原也做好了围歼人民军队的一切准备。在刘峙的统一指挥下，其具体部署是：四十一军三个师配置在平汉铁路许昌至明港沿线，封锁我中原军区西北方向；七十二军三个师配置在黄安、经扶、麻城一线，封锁我军区东南方向；四十七军两个师配置在罗山、光山、潢川一线，封锁我军区正北方向；四十八军两个师配置在商城、固始、立煌一线，封锁我军区的正东方向；六十六军三个师配置在平汉铁路明港至汉口沿线，封锁我军区西南方向。与此同时，敌十八军两个师，控制黄冈至监利之间长江西岸，防止我军南渡

长江，七十五军两个师控制安陆、天门、京山、钟祥、应山一线；十五军三个师控制河南泌阳、唐县、桐柏一线；六十九军两个师控制四望山区；十军两个师控制随县、枣阳、襄樊、老河口一线。以上共计十个正规军（二十四师），十几个保安团。六月下旬，敌调其十五军接替四十一军信阳至柳林防线的封锁任务，将四十一军^①调到罗山、光山一带，加强对我正北方向的监视，最后完成对我中原解放区部队的军事进攻准备，从六月二十六日起，开始向我发动围攻的前哨战斗。为了争取时机，取得主动，我中原军区早已拟定突围方案：李先念同志率中原局和十二纵队通过柳林火车站，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通过鸡公山，王树声同志率一纵队通过花园，三路同时向西挺进；皮定均同志率一旅向安徽、江苏方向突围东进；张体学同志率独一旅就地坚持战斗。按照事先制定的分路突围方案，六月二十七日黄昏，我军开始突围行动。

一周前，旅部接到了军区关于我军突围的部署。我们在绝对保密情况下，向各团干部传达了军区的突围指示。从当天起，极其隐密地开始进行一系列突围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军区指定的九旅突围的地段内，进行敌情、地形和道路的详细侦察。当即由旅、团分工的领导干部，率领侦察部队，分别化装成商人、农民、樵夫、牧童等，以九里关东山为中心，向平汉铁路柳林至辛店沿线，分头对敌之兵力部署、工事设置、火力配系、通过铁路的大小道路以及铁路以西的前进路线等情况，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大家采取多种侦察手段，除白天观察、询问、现

^①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军进行整编，将原军改称为整编师，原师改为旅。第四十一军和第四十七军整编后，改为四十七师。

地察勘以外，还利用黑夜掩护，派出精干的侦察小分队，深入到铁路以西较远地区侦察各方面的情况，选择越过铁路以后我军的前进道路，并在预选的路线上，找到了一部分夜间也能看清的地物作为部队前进的路标。侦察员们还在铁路以东发现了一条从九里关东山流出的小河，沿河西行，即可顺利到达铁路以西。这条小路，除骡马外，其他人员及迫击炮、重机枪都可以扛在肩上顺利通过，还可利用小河两岸丈余高的土坎和铁路桥洞，避开铁路沿线敌人各据点的火力威胁，隐蔽安全地通过铁路。侦察员们把侦察到的所有情况，都详细地标绘到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重要地段又另行绘制出若干要图。与此同时，我们又派出一部分侦察部队向东活动，调查东进路线以迷惑敌人。

我们三五九旅是中原军区主力的右翼部队。突围前，军事行动保持了高度机密，一切行动与平日一样，坚持生产、练兵。行动前三小时，我们以野外演习为名下达了出发命令。邻近的群众对我们的行动也有所猜测，他们看见我们送还门板，打扫院子，估计我们也要行动了，都舍不得我们离开。房东大嫂惊奇地问：“我们部队不是打了胜仗了吗？为什么事还要走呢？”男房东忧愁地说：“狗日的国民党遭殃军一来，我们穷人又冒得（没有）好日子过了，逼粮交租，苛捐杂税，抓丁派夫，修碉筑堡，不去就硬说你是么子匪。你们真走了，我们也是要跑的。”部队出发了，他们都含泪送我们。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相处几个月的山村，走得很远了，还听到后面房东大嫂喊：“你们么时再回来啊？……”

军区为我三五九旅作的突围部署是：主力于六月二十七日从河南光山县王窑村出发。旅党委决定，由副旅长徐国贤同志率九

团在王窑及周党畷地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突围，待主力安全转移后，坚持到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撤离。突围前，首先控制平汉铁路柳林至辛店东侧的九里关东山，作为突破铁路封锁线的依托。命令八团背靠九里关东山之主阵地，压制柳林、李家砦、辛店敌人的据点，一面掩护前卫七团突破铁路封锁线，打开右翼纵队主力部队突出包围的前进道路，一面掩护主力和后卫九团，安全通过铁路封锁线，最后担任后卫，阻击尾追之敌。命令七团为前卫，在突破铁路封锁后，先以一营兵力攻下铁路东侧的鸡公山，并以一个战斗力最强的连，占领并固守鸡公山顶峰——黄袍山，作为铁路东侧的主阵地，配合九里关东山八团，掩护整个右翼纵队部队安全突围，七团主力则继续向西南打开前进道路，向随县、枣阳地区前进。命令九团为后卫，在突围前接替七、八团原防区的警戒任务。并于二十九日晚尾随主力之后突围。

二十九日，前卫部队进到九里关附近一座大山树林中隐蔽集结。六月的太阳灼热逼人，战士们都敞开衣扣，不住地挥动着自己的帽子。旅副政委李铨同志爬到一块高地上，严肃而坚定地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调了三十万大军包围我们，用人民的血汗构筑了三千多座碉堡封锁我们，企图使我们在封锁围困中粮食恐慌，与民争食，让老百姓和我们对立起来，从而不战自溃。他们的梦做得真美啊！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生产节约的号召下，艰熬苦斗度过了这一难关，我们更团结了！现在老百姓都舍不得我们离开，我们胜利了！反动派知道压不垮、困不死我们，所以他们就用大规模的军事围歼来消灭我们。我们怎么办？为了自卫，为了生存，我们只有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打破反动派的封锁，粉碎反动派的围歼阴谋！”

“同志们！我们不愿打内战，但是，反动派既然首先掀起了全面内战，我们也就决不畏惧，决不后退！我们共产党是在战斗中成长的，我们也将战斗中更加强大起来！为了和平、民主、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不惜一切牺牲，奋斗到底！今晚我们就要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打垮敌人的包围，冲过平汉铁路去。同志们，我们的行动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前进就是生存，后退就是死亡！”

部队开始行动了，象一条汹涌的巨龙，向敌人的封锁线冲去。

傍晚，部队接近平汉铁路，只见敌人碉堡象鬼影般耸立在平原上，从枪眼里透出昏暗的灯光，四周静悄悄的。八团神速秘密地进入敌人封锁线，对北面柳林及南面辛店敌人派出警戒，主力同时将李家砦附近的敌军据点包围，八团趁敌人丝毫没有发觉我们，发起猛攻，占领了三个敌据点，其余敌人惊慌混乱，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盲目地四面放枪壮胆，前卫部队七团迅速冲过了铁路。柳林的敌人发现我们突围，匆忙沿着铁路出动阻击，被我八团打了回去。

我军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段均出于敌人意料之外，因此，鸡公山和黄袍山上的工事，敌人大多没有占领，只派了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担任警戒，也没有配置重火器。我七团迅速消灭了这股敌人，占领了鸡公山和主阵地黄袍山。由于敌情不甚严重，我们决定只留五连占领并控制黄袍山主阵地，配合八团占领的九里关东山主阵地，掩护整个右纵队全部安全地通过了敌平汉铁路封锁线。二营其余分队和团主力一起，按预先选定的路线，向西南平靖关方向迅疾前进，为旅主力开辟前进道路。我三五九旅主力和

军区干部队等，均于三十日三时前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尾随前卫七团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八团掩护整个右纵队通过平汉铁路时，敌各据点和高处碉堡用机枪和火炮连续不断地向我过路部队和八团射击了一整夜。由于敌人盲目射击，我部队伤亡极微。拂晓前，八团有计划地撤出了九里关东山主阵地，顺利地越过铁路到达路西，作为后卫团跟随主力前进。据守黄袍山之七团五连也在拂晓撤出阵地，尾随八团前进。至此，我三五九旅全部按照预定计划，顺利地通过了敌之平汉铁路封锁线，取得了突围的第一个胜利。前卫七团在三十日天亮时占领了平靖关，为主力向随、枣地区前进开辟了道路。

蒋介石获悉他所苦心部署的围歼计划即将遭到彻底失败，顿时震惊失色，慌忙命令刘峙全力追击。刘峙判断我部队将在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区立足，遂于七月一日命令：六十九军和十军调天河口、高城一线，占领有利地区；十一军和七十五军分别取捷径赶到天河口、高城之西北和西南；十五军、四十七军和六十六军，各从现地迅速向天河口、高城追击，妄图在空军配合下，一举围歼我军于天河口、高城地区。但是，我军冲出包围后，长驱直入，继续西进，当敌人尚未到达指定位置时，我们已进到随、枣地区。

鄂北、豫南之间有一片广阔的平原，中间流过湍急的唐河和白河，不易徒涉；南有汉水，北边是敌人的重要据点南阳城。我们预料敌人见我继续西进，必然企图以最快速度再一次调集兵力聚歼我于这一地区。七月正值雨季，大雨连绵，路上泥泞不堪。部队顶风冒雨，不顾疲劳地日夜急行军，争取赶到敌人前面，迅速抢渡唐河、白河，脱离这一危险地带。七月六日，前卫七团首

先到达唐河渡口——程家河，次日抢占了白河渡口——朱家集。当地人民群众知道红军来了，纷纷自动划来许多船只，一船一船，把部队很快送到对岸。当敌人困顿狼狈地追到唐、白河时，我们部队正大踏步地向秦岭山区挺进。

蒋介石眼看前后两次围歼计划都已扑空，不由恼怒交加，严令刘峙督促追兵，务于七月二十日前寻找有利战机，全歼我军。同时，命令胡宗南部星夜赶到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险要山隘荆紫关，防备我军进入陕南。

我们在十一日进到了浙川南面的马蹬附近。这时，王震同志突然出现在部队前面。指战员们看见了自己的老首长，一个个都兴奋得欢呼跳跃起来，他给大家带来了必胜的信心。战士们说：“只要王胡子在，我们什么也不怕！”王震同志集合部队，高兴地对大家说：“我奉李司令员的命令，回来和同志们共同战斗，同甘共苦。今天晚上我们要打下马蹬。同志们，打呀！为了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打垮反动派！”

马蹬战斗在拂晓前打响了。指战员们在王震同志指挥下，打得非常勇猛。堵击之敌在我们的猛烈火力射击下，纷纷弃枪逃走。战士们满山遍野地追击敌人，抓获俘虏。

我军向拿山前进时，敌前卫已进入拿山街，我后卫立即停止前进。随后，我军驱走拿山之敌，通过拿山街，并派出一个营占领了西面的山坡阵地，以掩护部队通过，同时防御敌人向我发起攻击。中原军区的意图是：命三五九旅急行军奔袭浙川县城，旋即抢占荆紫关，以便在伏牛山区建立根据地。由于浙川县城守敌凭借高城堡垒，负隅顽抗，战斗到次日清晨仍未攻下，荆紫关也被敌军先行占领。这时，前堵后追的胡宗南部和刘峙部已向我逼近。我主力于

是改变计划，决定抢渡丹江。命令徐国贤同志率七团强袭淅川县，贺盛桂同志率八团抢占荆紫关。八团前进至离荆紫关五、六里处，侦察员抓到敌五十三师的一个参谋。旅部又派九团赶来，偕八团共同掩护主力渡江。九团占领阵地后加紧修筑工事，八团进行渡江的准备工作。当时丹江山洪暴发，江水汹涌，白浪滔天，又无渡船，万难通过。敌人妄想利用丹江夹击我于淅川、大石桥之间，使我葬身鱼腹。部队中一部分深识水性的共产党员，自告奋勇地参加渡江先遣队。他们在群众帮助下，调查了解河床情况，冒着生命危险跃进滚滚的洪水，经过无数次往返探索，终于找到了勉强可以徒涉的路线。我们将收割的敌人的电线扭成绳索，固定在丹江两岸的大树上。随后部队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条件，进行编组，身体强的挽住身体弱的，结成一条条人的锁链，分批徒涉过去。徒涉中，不幸有十几位同志被巨浪卷走牺牲了；但是，丹江洪水终被我们钢铁般的意志征服了。

刘峙见我军南渡丹江，判断我将绕道进入陕南，慌忙又拟定一个新的围歼计划：命令九十军五十三师和一军一师兼程赶到荆紫关至南化塘大道及其以东一线山梁；十军三师和二十师经马蹬至南化塘及其以东；十五军一三五师东运至郧县、郧西、白河一线，并由南向北推进；一四四师由北向南压缩；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一二四师和四十七军一二五师经淅川紧紧尾追；九十军六十一师进至荆紫关东南地区，并以该师之一部进至白马寺、鸡子岭，迟滞我军行动。企图对我形成前堵后追、左攻右击的态势。将我包围压缩在鲍峪岭、南化塘附近全部歼灭。

我军强渡丹江后，作为前卫部队越过荆紫关至南化塘大道，进入了陕南山区，一眼看去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胡宗南早

已调集兵力在山梁、隘口构筑工事，将我包围。我五连在连长贾书经同志率领下，迅速接近敌人，猛烈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一颗手榴弹在他左近的山岩上爆炸，他头部受伤，鲜血染红了面颊，仍然奋勇向敌人冲去。当冲到敌人阵地前沿时，他又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双臂，战士要背他下去，他坚持不下火线。战士们在他的英雄行动鼓舞下，个个有如出山猛虎，英勇地扑向敌人，追敌退到后面山梁。敌人数倍于我，又有险峻的地形可守，我军虽然反复冲锋，仍未改变被包围的形势。王震同志根据战斗情况，集中力量于敌防御薄弱之点，再次发起猛攻。战士们奋勇迎战，和敌人白刃搏斗，终将敌军打垮，冲出包围。连夜经过相树沟、上下坪地进到贺家庄、王家店一线。

与此同时，中原部队主力由李先念同志率领，在鲍峪岭东南地区与敌人激战，经过一场浴血战斗，他们也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三五九旅终于将八百里秦岭山脉踩在脚下，从甘肃省东南部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地区。我们自一九四四年初冬从延安出发，到一九四六年初冬回到延安，前后整整历时两年，跨越八个省区，行程两万余里，经历一百多次浴血奋战，受到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使我军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钢铁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谱写了一页光辉灿烂的篇章。

从黑暗走向光明

——记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

苏 进

(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

一九三〇年八月,我终于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习生活,回到日夜怀念的祖国。当时,祖国的上空乌云翻滚,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在中原大地上鏖战正酣。我从天津上岸以后,没有停留,便乘火车经北京南下,匆忙赶到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郑州。

翌日,我到总司令部去见冯玉祥先生。他一身戎装,正要出发到兰封前线去。我刚从国外归来,很想尽快了解战争的实际情况,便请求跟他同去,他欣然同意了。

冯玉祥先生的铁甲车停在开封东的罗王车站。我随冯从这里出发到前沿视察部队,指挥作战,夜晚就回到列车上来过夜。

连日大雨,乡村的道路泥泞不堪,低洼地积水过膝,成了一片泽国。当时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是骡马大车,简直没法行走,部队的弹药、粮秣补给都发生了问题。一批批经过简单包扎的伤



图一 苏进同志在董振堂纪念碑前留影

兵，用破旧而肮脏的敞车装着往后方运送。他们身上血迹模糊，在车上既不能躺，又不能坐，乱糟糟地挤作一团，晴天晒得头昏眼花，雨天淋得浑身精湿，也没有人问一问，管一管，有的痛苦地呻吟着，叫唤着，有的用粗野的话发牢骚，骂爹骂娘……看到这些混乱的局面，我的心情不免沉重起来。

这难道就是原来的国民联军吗？我这样惊异地问着自己。

在我的印象里，国民联军特别是国民一军是一支受过大革命影响、纪律较严、士气颇高、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记得一九二五年李大钊同志就派共产党员到冯部工作，在西北军干部学校（学员都是参加过“五卅”运动的大、中学生）发展党的组织。冯玉祥还聘请苏联人任江（中国名）为总顾问，并请了一大批苏联教官。一九二六年的四月至八月，在奉直军阀为主力的讨赤联军的联合进攻下，南口之役失利，部队的士气有些低落。但是，不久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归国，随同他来的还有苏联总顾问乌斯曼

诺夫和共产党员刘伯坚等同志。接着，在绥远省西部的五原举行誓师大会^①，宣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拥护总理遗嘱，拥护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响应北伐战争。同时，成立了国民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任命刘伯坚同志为总政治部部长，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正式脱离北洋军阀体系，改挂孙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取消将校尉军衔，学习苏联红军改为三等十二级；宣布废除肉刑，提倡官兵生活平等，改着苏式军服，头戴八角帽；并把师改为军，提升一些师长为军长，各军还设立了政治处，创办小报，教唱国际歌……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整顿，部队士气大振，面貌焕然一新，人人同仇敌忾，决心打倒军阀，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五原誓师以后，部队越沙漠，过草地，克服种种困难向西移动，经宁夏、平凉，直抵西安，解除了吴佩孚的爪牙刘振华部对西安国民二、三军李虎臣、杨虎城两部长达八个月的围困。

部队进驻西安不久，进行整训。营以上军官每天都到总部来听课；刘伯坚同志负责教政治，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十月革命史，乌斯曼诺夫介绍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和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另有相当于少将的高级参谋讲孙子兵法及师级联合兵种战术等。

刘伯坚同志当时大约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眉目清秀，待人态度和蔼，脸上总挂着微笑，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一点架子。他系四川省平昌县龙岗寺人，家庭并不富裕，高师毕业后，

^①九月十七日，五原誓师的誓词：“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产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死生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图二 刘伯坚同志

于一九一九年冬赴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后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国外学习共有六年多的时间。所以他的学识十分渊博，口才极好，讲话从不拿稿子，很有鼓动性和说服力。他除了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外，还积极开展地方的革命活动，很快把西安的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和学生

联合会等群众组织成立起来。他到处演讲，见到工人讲工人，见到农民讲农民，见到妇女讲妇女，深受群众欢迎。后来我才知道，这时他还秘密建立了党的陕甘区委，领导本地区的革命工作。很快，古城西安掀起了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有次在皇城开大会，连郊区的农民都涌跃前来参加，一时红旗飘扬，红缨挥舞，“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歌声此起彼伏，口号喊得震天响，气氛异常热烈。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遇难，噩耗传来，全军悲痛，五月一日，国民联军在西安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并通知全体官兵佩带黑纱，悼念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先驱战士。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宣誓就职武汉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把所部国民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冯玉祥先生的藏书给我提供了学习的方便条件，象孙中山先生的一些著作、《独秀文存》、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万有文库》中一些有关苏联和其他

比较进步的小册子等，我经常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直至深夜。这些书在我眼前展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对我思想的转变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冯部所属孙连仲部出荆紫关，其余诸军出潼关，进入河南省，配合北伐军进攻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的部队。苏联总顾问乌斯曼诺夫建议用骑兵迂回包围敌人的战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当各步兵军顺着铁路从西向东攻打时，骑兵军连续五次从右翼迂回到敌人后方，切断他们的退路，敌军害怕全军覆没，往往一触即溃。所以不到一个月，冯部就先后占领了南阳、洛阳、郑州、开封、商邱等城市。总司令部遂逐步迁至洛阳和郑州。

郑州会议结束后，冯玉祥立即调动部队，把驻在许昌、漯河一带的已接受武汉政府改编的原直系部队靳云鹗部一个军包围缴械。又收编了刘振华的部队。从此，河南绝大部分都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防地。

不久，蒋介石邀冯玉祥去徐州商讨所谓“北伐大计”，实际上是要冯玉祥跟他一起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冯玉祥从徐州开会回来，果然就提出要“欢送”在冯部工作的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实行“国共分家”的政策。

七月中旬，苏联总顾问乌斯曼诺夫和刘伯坚等共产党员都先后离开部队。

冯玉祥又怀疑同他一块赴苏联考察的译电主任赵亦云思想赤化，恐怕是共产党员，突然把他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我也被调到洛阳军官教导团当队长，不久，报考留日学生，我被录取，从此就离开部队，出国学习去了。

三年来，我远在国外，对冯部（后改为第二集团军）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今天回来，乍一见到前线的一片混乱局面，怎么会不感到意外和吃惊呢？

然而，更使我感到意外和吃惊的事还在后面呢！那是不久以后，我以总司令部参谋的身份来到驻在考城县（今兰考县）的三十八师检查、帮助工作。

我愈是和该师的人员接触，愈觉得他们对师长周永胜的意见很大，有的甚至表示强烈地不满。从旅长、团长、营长到师部的参谋，以至周永胜的传令兵，许多人主动跑来向我反映情况。他们说，周永胜文化不高，水平很低，还强不知以为知，是个大草包。一句很普通的成语：“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却解释成“学如泥水行舟，不进则推”，有人反映他贪生怕死，前面枪炮声一响，他不是沉着指挥，考虑如何打败敌人，而是赶紧吩咐套大车，装行李，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撤退逃跑的架势。有的反映他贪污公款，克扣军饷，心毒手狠，不顾士兵死活。该师有两个旅，一个旅临时拨归别部指挥，所以只剩下一个旅，旅长叫曹金声，他向我反映了周永胜的问题后说：“苏参谋，请你回去务必向总司令反映，我不能再在这里干了，实在呆不下去了！”

一天傍晚，我在师部驻地的村外散步，遇见一个年轻的见习参谋，名叫刘振亚。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看他好象有话要说，便提议一起走走。我问他哪里人，多大了，什么时候到这个部队的，他说他是山东临清人，今年才十九岁，不久前从军官学校毕业后分到这个师的。他说，三十八师有许多怪事，说起来非常可笑，财经不归军需处，却归军法处管，因为军法处长是周永胜的人；副师长、参谋长、有些处长甚至师长的随从参谋经常在一

起发他的牢骚，说他的怪话，当面却噤若寒蝉，一句也不敢提……他最后感叹道：“唉！这样的状况，怎么能带好兵，打好仗呢！”这次交谈，刘振亚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个肯动脑子、嗅觉比较敏锐的青年人，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而且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加入党的。

我在三十八师调查了解了一段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是军心厌战，士气低落。至于师长周永胜，我认为是绝对不宜留在现在的岗位上，这个师如果继续让他指挥，轻则打败仗，重则整个部队会叫他搞垮。

一九三〇年九月，张学良的奉军从东北进关，阎锡山的部队顶不住，放弃北平、天津，退守娘子关，保他的山西老窝去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线也加强了攻势，第二集团军的一个师在新郑以南地区被包围。三十八师被紧急调到郑州以南，加强南线的防御力量。这时，我在总司令部接到新的任务，说三十八师和十三师的接合部有个空隙，叫我去协调解决一下。

我首先来到十三师。十三师的师长董振堂是我的老上级。一九二三年我在学兵团当学兵时，他先是我们连的排长，后当连长，兼任教官，所以我们除了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还有师生之谊。他是河北新河县西李家庄人。一九二二年秋，他从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已二十八岁，到部队开始当见习军官，不会器械体操，便刻苦练习，手上磨起了血泡，血泡变成了茧子，硬是把单、双杠的规定动作学会。他负责讲兵器、炮操和炮兵战术，不仅能讲解兵器构造原理，还能给大家作示范动作。每次轮到他当值星官或卫兵司令，对勤务非常认真，在当卫兵司令时，总是和

卫兵一起站岗、巡逻，卫兵是三班倒，他却一人顶到底，一丝不苟，堪称模范。由于他以身作则，作风踏实，在士兵中威信很高。当排长时，上级打算提他当上尉参谋，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他考虑这样虽然生活舒适些，工作轻松些，但对自己的锻炼不如在连队大，所以还是要求让他继续在基层带兵。这样，他由排、连、营、团、旅一级级地上升，现在已是一个师的主官了。多年不见，我又是刚从国外归来，相见之后，彼此都很兴奋。他一贯艰苦朴素，从无不良嗜好，烟酒都不吃，开中饭时，却摆了好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谈。他忽然停下手中的筷子，长长地嘘了口气，说：

“总司令（指冯玉祥）今天同这个打，明天同那个打，也没有个目标，打到什么时候算完？”

听他这话，我心里一愣：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我们已多年不见，见面不久就说这样的话，难道不怕我回去报告冯总司令吗？

见我默不作声，又问：“苏参谋，你看我这个人有什么毛病？”

我笑笑说：“董师长，分别这么多年，你叫我从何说起呢？”

“过去还是了解的嘛！”

“你是我的老师，你的优点很多，很值得我学习，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缺点。”

“你再想想！”

我看他非常诚恳，便想了一下，想起一九二四年学兵团在北京驻防时，他处理一个人的问题不很恰当，我一直有不同看法，便向他提了出来。他很认真地听着，听完后问：“是不是武断了些？”

“是有点！”我点点头道。

这时，他从军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记下了我的意见。他又问：“日本的情形怎样？”

我说：“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可是怪得很，社会主义的书籍却翻译得很多，出得也很及时。”

“你都看过些什么？”他很有兴趣地问。

“学校的功课太紧，大本子没有时间看，小册子倒看了一些。”

“能不能给我介绍几本？”

“那都是日文的。”我说，“不过，有一本《政治经济学大纲》，是北京大学出的，你可以找来看看。”

他又掏出笔来，在小本子上记下书名。我看着他严肃、认真的神情，心里寻思，他大概是尝够了彷徨歧途的痛苦，急于要寻找新的出路吧！

我在十三师住了两天，有事回到郑州，冯玉祥已到黄河北边去了，只有前线总指挥鹿钟麟及其专列留在郑州，似乎也是随时准备离开的样子。我办完了事，当天就赶到三十八师去。

我骑马离开市区，一轮皓月从东方徐徐升起，我猛然想起今天大概是农历八月十五，不然月亮为什么这样圆又这样亮呢！我让马儿沿着大路徐步朝前走去，就欣赏起皎洁的中秋月色来了。

“苏参谋！苏参谋！”

路旁的庄稼地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喊声。我大吃一惊，赶紧勒住马头，回身一看，三十八师的见习参谋刘振亚快步朝我跑来。我感到非常奇怪，便问：“刘参谋，你怎么在这里？”

他顾不上回答我的问题，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说：“不好了！周

永胜派他的参谋长和敌人接头去了！”

我连忙从马背上跳下来，要他把情况讲详细点。

他说：“今天傍晚，周永胜派三十八师参谋长偷偷地越过前沿，到敌人那里去接头，后来听说你今晚要来，周永胜又命令警卫营长，等你一到，就把你捉起来”。

我听了十分气愤，寻思了一会，说：“现在回总司令部已经来不及了，事不宜迟，咱们赶快到十三师去，到那里再想办法！”

到十三师以后，我把情况向董振堂作了汇报，并建议把三十八师的曹金声旅争取过来。我认为，根据曹金声和周永胜之间的矛盾情况，是完全可能的。董振堂同意我的意见，当即用他和我两人的名义，给曹金声写了一封密信，大意是：周永胜已经叛变，总司令命令你旅从现在起归董振堂师长指挥。同时规定了夜间的联络暗号。信写好以后，立即派传骑送去。我又向董振堂师长介绍刘振亚的情况，他决定把刘振亚留在十三师师部当参谋。

事情非常凑巧，这天的后半夜，前敌总指挥部突然通知所有部队撤到黄河以北去。董振堂马上把北撤命令通知曹金声，曹旅长果然执行了。

从此，曹金声旅就暂归十三师指挥。

部队过了黄河以后，我赶到焦作总司令部，打算向冯玉祥汇报周永胜企图叛变以及我们如何处置的情形，以得到他的认可，取得合法的手续。这时冯玉祥已经离开焦作，前往山西晋城。我就向集团军参谋长李兴中讲了事情的经过，他听了以后叹气说：“唉！叛变了，都叛变了！”

原来，这时第二集团军已经分崩离析，处于解体状态。首先

是石友三擅自把部队撤到黄河以北，过河不久就宣布独立，想通过东北军重新回到蒋介石的怀抱。与此同时，驻在陕西、甘肃的一些非嫡系部队也纷纷倒戈，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剩下的只有宋哲元部和孙连仲所属的十二、十三、十四和十五师，以及孙殿英的残部，退到晋南、豫北狭窄地带，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处境极为窘迫，前线总指挥鹿钟麟宣布下野，去了天津，把在豫北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孙连仲。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兴中听了我的汇报，才发出“都叛变了”这一痛心的感叹。

我在焦作无事，又回到修武十三师师部，把向李兴中汇报的情况告诉了董振堂。我们正在谈着，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穿一件灰布大褂，戴一顶咖啡色呢礼帽，象个教师，又象个商人。经董振堂介绍才知道是十三师的军需处长，名叫宋奇峰，换上便衣是要出差到北京去采购物资，请示师长还有什么事情要办。董振堂吩咐道：给我买一本书，书名叫《政治经济学大纲》。”

“是北京大学出版的。”我补充了一句。

“没有问题，我们宋处长正好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在这方面是行家。”董振堂夸奖地说。

“不敢，不敢。”宋奇峰却有点拘谨。

“你到书铺看看，有合适的，给我多买一些回来。”董振堂想了想，又吩咐道。

宋奇峰点头称是，很快退了出去。

几天后，我便离开十三师，回到新乡，在十四师第一旅（即原手枪旅）当参谋长。

十四师师长季振同，我们也是很早就认识的。他是河北沧州人，他的家庭是个破落的大地主，但仍有两千多亩地。象他这

样一个富家子弟，愿意出来当兵，而且过得惯西北军特有的严格、艰苦的军事生活，是不容易的，加上他人比较聪明，反应快，有魄力，所以深得冯玉祥的器重。在北京南苑时，他在学兵团骑兵连任排长。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部队急剧扩大，季也由排长而连长，一级一级地升到骑兵团长。五原誓师后，他在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当二等级（相当于上校）传令队队长时，我们在一起学习、阅读书刊，讨论问题，共同受到大革命的熏陶。他那时精力充沛，情绪很高，学习、讨论都很积极。到西安不久，他被调到骑兵旅工作，在攻克陕州、洛阳、郑州、开封诸役中，由于他机智勇敢，屡立战功，后又改任手枪旅旅长，十四师就是以手枪旅和炮兵旅的一部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季振同的性格开朗、活跃，好运动，喜打球，在南苑时是学兵团的篮、足球队队长。他的交际面广，接触人多，花钱也大手大脚，一般军官发了饷要养家糊口，他却不够一个人用，有时还从家里要钱来花。他待人热情诚恳，能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所以大家都很愿意跟他接近。

我到十四师报到后，季振同和我谈了一次话。他告诉我，部队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不仅军官、士兵的饷发不下去，而且粮食、冬装都没有着落。黄河以南是蒋介石的部队，北面是张学良的奉军，看来只有接受南京政府改编这一条出路了。他还说，孙连仲已派人前往接洽，孙本人也亲自去了一趟。蒋介石的条件非常苛刻，要部队离开河南，经徐州、兖州到菏泽、济宁一带驻防，尔后再授予番号，进行改编，改编完成之后，才能发放经费。

我听了以后，感到这简直是一种屈辱，但大势所趋，徒唤奈何！

一九三〇年年底，孙连仲终于根据蒋介石的条件，把部队移驻菏泽、济宁一带。蒋介石才给了一个“第二十六路军”的番号，并且强令部队改编，把四个半步兵师缩编为两个师。把重迫击炮、野榴炮团，装甲列车、骑兵师均留长江以北，几乎把该军重装备，特种兵与步兵分割开来，以削减其战斗力。

部队改编时，赵博生担任了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他是河北黄骅



图三 赵博生同志

(原叫盐山)县慈庄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步科毕业生，一九二三年冬天才到西北军工作，当过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大革命失败时，他担任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长，曾写了一首《革命精神歌》，在特种兵教导大队中广为教唱，歌词是这样的：“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尤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这歌词充分表现了他作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献身精神！中原大战失利后，特种兵旅归宋哲元掌握，他毅然率领五百余人的教导大队，号称“三民主义救国军”，出西安，登秦岭，拟入汉中，独树一帜，寻求新的革命出路。但是进山以后不久便失败了，一部被杨虎城收编，他自己带了孙毅、李青云到孙连仲这里来，正逢部队改编，孙让他当了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

部队改编以后，大家以为生活可能有所改善，因为当时许多人已囊空如洗，连理发洗澡的钱都没有了。谁知盼呀盼呀，盼来的并不是薪饷，却是一纸开赴江西剿“匪”的命令！

早在部队刚到济宁不久，蒋介石就派人来，要二十六路军开往江西参加“剿共”。孙连仲起初犹豫不决，既怕蒋介石以调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红军打败，落个“战败法办”的可耻下场。后来，孙连仲征求当时任参议的赵大璞的意见，赵大璞反问他：“总座估计年内时局会不会有大的变动？”

“石汉章（友三）心颇不安，可能有所行动。”孙连仲回答说。

“同情者有谁？”赵大璞又问。

“极少。”孙连仲说。

“倘若我们经济困难时，韩向方（复榘）能援助我们吗？”

赵大璞问。

“不可能，不可能！”孙连仲连连摇头说。

“总座，那你应该奉调去江西。”赵大璞老谋深算地说，“目前是蒋需要部队的时候，现在江西的北方部队有王金钰、郝梦龄、陈调元等，他们都是战败被蒋收编的，我们去后，处境与他们相同，互相结纳，他们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万一蒋要吃掉我们，就同他们一起干。如果不去江西，纵然还能驻在这里，但和韩向方的部队比较，一穷一富，军心也难以久固。假使韩部有人不明大义，暗中勾结我军，挖我们的墙脚，恐怕也有伤总座和韩的友谊吧！”

赵大璞的这一席话说得孙连仲的心活动了。这时蒋介石又派韩复榘等来做说服工作，并把孙连仲请到南京，重金收买，威胁利

诱，他终于下决心去江西参加“剿匪”战争。蒋介石当然正中下怀，很快就发布了南调的命令。

“这是调虎离山！”

“这是借刀杀人！”

部队的广大官兵一齐吵嚷起来。其不满之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上次改编的时候。

二十六路军的军官、士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从未到过南方，对南方情况不了解。自从部队要向南方开拔的消息传开，关于南方如何如何可怕的传说也就蔓延开了。什么“吴牛喘月”啦，什么山高路险水流急啦，什么话不好懂、生活不习惯啦，什么瘴气可以毒死人啦，越说越玄，越传越神。使人们对去南方作战产生许多顾虑和一定的恐惧心理。我从日本回国之前，在日本报纸上曾看到所谓“赤匪”一度攻陷长沙的消息，因此猜想这回是不是要二十六路军去剿所谓“赤匪”呢？我们对共产党的印象很好，对蒋介石的仇恨颇深，所以大家都反对南下“剿匪”。

但是，反对任你反对，不满任你不满，命令还是不得不执行。一九三一年初春，董振堂的七十三旅的一个团（团长叫郭道培），终于登上了第一列南下的火车。出乎人们意外的是，列车开到济宁与兖州之间的孙氏店车站，该团官兵坚决拒绝开差，举行哗变，破坏了铁路、车辆，把部队拉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一方面觉得这个团的举动表达了大家对南下强烈不满的心意，干得好，干得痛快；另一方面又为董振堂耽心，作为旅长，下面一个团随便被拉走了，起码有用人不当、管教不严的责任吧，如果蒋介石追究起来，是够麻烦的，幸亏经过做工作，不久郭道培又带着部队回来了。而这个团的行动，虽然使二十六路军

的南下计划耽擱了几天，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改变蒋介石要驱使它开赴内战战场的罪恶计划，到三月上旬，全军就一支部队跟着一支部队，一趟列车跟着一趟列车地向南方进发了。

二

象一个人钻进了一座深不可测的山洞，开始时还有些光亮，后来越走越暗，越走越黑，伸手不见五指，看不到重见光明的希望，不知什么时候会一头碰在怪石嶙峋的石壁上，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二十六路军官兵到达南方时的心情。

部队到江西以后，在南昌停留了几天。这时蒋介石才发下饷来，但是第一次发饷就没有发足，只平均发了百分之六十五。而和我们紧挨着住的嫡系部队，他们总是按月发十足的饷，装备、供应也比我们强得多了。然而，饷虽不足，打仗却要打头阵。这次发饷后不久，就命令二十六路军分左右两路开赴前线。所以大家忿愤地发牢骚：“发这几个臭钱，要买弟兄们的命哩！”

当时，蒋介石命令二十五师为左路，二十七师为右路，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这次“围剿”由何应钦任总司令，作战方针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作战计划发到团。改编以后，我在七十四旅第一团当中校团副，曾经看到这份计划，当时就不以为然，觉得毛病很多，漏洞百出。根据我过去学的一点战役常识，大凡外线作战，最重要的是各路要“协同一致”，内线作战最重要的是要在利害变换线以外“各个击破”敌人，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有例外，可是这份作战计划却规定某某部队担任进攻（如江西方面），某某部队担任防御（如

福建方面），分得很死，加以山地崎岖，道路稀少，情况不明，互不协调，分明是一副被动挨打的架势。这是单就军事上讲的，若加上双方政治条件那样悬殊，吃败仗几乎是必然的。果然，右路的二十七师前进到中村地区，先头部队突然被红军团团围住，没有部队前往救援，顿时官兵慌作一团，谁也指挥不了谁，乱叫乱喊，无目的地东窜西逃。红军从山上冲下来，一个旅被消灭过半，师部亦遭重创。这是给二十六路军的迎头一棒，使全军本来就低落的士气更加低落了。

左路军二十五师几乎没有打什么仗。七十三旅走在最前头，董振堂本来就不想同红军作战，经常搞一些假情报，说什么地方有红军主力，什么地方出现大批红军，作为自己迟迟不进的理
由。这些情况逐级上报，一直报到南昌总部。后来蒋介石亲自到南昌督阵，发现七十三旅的报告和其他部队反映的情况出入很大，认定是指挥官虚报军情，借故不前，马上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发来了一个电报，怒气冲冲地责骂董振堂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并威吓说：如若不改过自新，将功补过，定按军法论处云云。为此，许多人都为董振堂捏了一把汗。

部队往前开，很快就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记得一天傍晚，部队开到宜黄县城。宿营以后，天已黑了，我发现墙上有红军留下的标语，大多是用石灰水写的，字体大小不一，几乎满街都是。我顾不上休息，拿了手电筒去照着这些标语。由于我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对每一条标语都感到新鲜，感到有意思。它们的内容大概是：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刮民党蒋该死！”

“打土豪，分田地！”

“欢迎白军的弟兄们拖枪来当红军！”

“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

“红军官兵伙生活一样，白军将校尉待遇不同！”

……

我握着电筒，久久地凝视着这些字迹不很工整的标语，暗自思付：“剿匪、剿匪”，开口闭口骂人家是土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土匪”？土匪会有如此鲜明的政治主张，能提出如此响亮的政治口号来？我才不信哩！我又想起在五原誓师后，读过一些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那时国际资产阶级不是也异口同声地诬蔑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为“赤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什么“赤军”或“土匪”吗？看来，这里发生的是一场几乎和苏联十月革命一样的真正的工农武装革命啊！当然，这些都只是自己的内心活动，对任何人也不敢泄露半句的。

江西的梅雨季节，十天半月见不到太阳，经常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有时雨停了，湿漉漉的空气似乎也能拧得出水来。什么东西都发霉，长毛，人们的心上好象也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霉菌，成天愁眉苦脸，打不起一点精神来。就连部队的骡马牲口，也适应不了湿热的南方气候，吃不惯霉烂变质的本地稻草，有不少瘦得皮包骨头而倒毙。我们团长黄中岳那匹出类拔萃的枣红色走马，在二十六路军中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可威风哩，谁见了都喜爱，在南昌时，有人愿意出一千块大洋，高价买这匹马，黄团长舍不得，没有卖。可现在呢，也瘦削下来，看不出当年那英俊的模样了。

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象个输得

急红了眼的赌徒，很快又气急败坏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一个月后，他亲自出任总司令，率领以他的嫡系部队为主力军的三十万人马，长驱直入，气势汹汹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迅猛扑来。他本想一举击破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个空，后来又在多山的革命根据地连吃败仗，不得不暂停进攻。与此同时，二十六路军奉命经黄陂、东韶，进驻宁都县城，途中除遇有少数游击队袭扰外，没有遇到红军的主力部队。

宁都，是一座古老的县城，坐落在赣江支流梅江的西岸。它的东面临水，有两座木桥横跨江面，过江以后就是连绵的群山；城南不远即是山地，只有几户人家；城西地势稍平，但也有几座峰峦拔地而起，其中以翠微峰为最高，山势陡削，只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向山顶，十分险要；最繁华的要数北关，人烟稠密，逶迤数里，一条通往广昌的大路贯穿其中，是本县和外地相联的动脉。宁都是革命根据地内的一个小白点，出城十里之外即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三、四十里以外，就完全是红军控制的天下了。

进驻宁都以后，官兵的厌战情绪继续蔓延着。

有一天，团长黄中岳提议到城外去打猎，散散心。我早已憋闷得慌，希望到空旷的野外呼吸点新鲜空气，所以便欣然赞同。两人骑马出城，走了三、四里，在一片树林边见到一群小鸟，他放了一枪，打落三、四只。可是，等我们去寻拣猎物时，却发现一片新坟，一个个馒头似地挨着，高高低低，大大小小，足有三、四十座。我们大吃一惊，走过去仔细一看，竟是二十六路军病故士兵的墓地。我们两人长久地站在那里，沉默不语，两匹牲口也一动不动地低垂着头，其中一匹突然昂首长嘶，那声音凄厉万分，惨不忍闻，我不禁悚然一惊。

“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诸葛亮的《祭泸水文》中的两句话，油然浮现在我的脑际。

“唉！都是不服水土，发疟子死的！”黄中岳凄然地叹口气，打破了沉默。

“为啥吃药也不管用？”我问道。

“他妈的！发来的那些奎宁丸，好多是假药，怎么治病？坑人的！”黄中岳圆睁着两眼，脸色铁青，气愤地说，“要按老子的性子，把那些买假药喝兵血的家伙一个个都斩了，拿他们的脑袋来祭这些弟兄的亡灵！”

黄中岳是信阳罗山县人，从小在淮河边长大的，浓眉下有一双黑亮的大眼，一副南方人的脸型。他性格豪爽，说话痛快，但不多言，平时喜读《水滸》，好讲梁山故事。他曾在南苑学兵团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他和季振同两人都喜好运动，爱打篮球、踢足球，在南苑学兵团时，季振同当球队队长，他是主力队员，两人还是结盟弟兄，关系一向十分密切。今天，他看到这一片二十六路军士兵的坟丘，感情十分激动，再也无心打猎，两人就闷闷不乐地回城了。

这时，部队里赌风也逐渐盛行。士兵和下级军官们推牌九，营以上军官打麻将。此风一长，军纪越发废弛；夜晚不睡，早晨不起，站岗放哨没精打彩，平时生活吊儿郎当，甚至有的因此互相打架斗殴、寻衅闹事。拿我自己来说，原来是不会打牌的，因为实在无聊，人家打牌，就坐在一旁看热闹，可是看着看着，渐渐也看懂些门道，有时别人临时有事，就替他打一两局，谁知一沾上手，就再也脱不开身了，时常有电话来邀请打牌：“我们这儿三缺一，就缺你了，快来！”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只

得应邀而往。在牌桌旁坐下以后，往往身不由己，坐下容易站起来，经常从早晨打到晚上，又从晚上打到天明，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结果搞得头昏眼花，疲劳不堪，既输钱（赢钱的时候少），又伤身体，后悔莫及。但是休息一两天，体力稍加恢复以后，手又痒痒了，重新精神抖擞地干起来。这样周而复始，好似赌鬼缠身，坠入了邪道。后来，我对两个传令兵说：“咱们约好，今后你们要是发现我再打牌，打一次罚十元钱，我发现你们赌钱，就打棍子，好不好？”两个小家伙一致同意。从这以后，我往往以此为借口，谢绝打牌的邀请，然而即使如此，我还是被传令兵罚了三十元钱。

不久，日寇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它象平地一声惊雷，极大地震动了我们这些困处内战前线的北方军人。它使我们醒悟，它让我们思考：祖国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军人的真正职责是什么？

总指挥部的电台设在我们团部对面，距离很近，我和黄中岳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总指挥部电台去听新闻广播。我们戴上耳机，能听到南京中央台的广播，也能听到日本东京的新闻。日本电台报告每天的战况，昨天占某城，今日取某地，言词狂妄，口气嚣张，我们听了气愤填膺。然而南京方面的广播则更是让人气破了肚子。开始说是日本军队少数人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我们应该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说什么相信公理能够战胜强权；后来蒋介石亲自发表演说，继续叫嚷“攘外必先安内”，“不可轻言抵抗”的烂调，使大片国土沦于侵略者之手。每次听完广播，我们回去都要议论一番。有一天黄中岳激愤地说：“他妈的！与其困倒这里，不如战死在抗日的沙场！”

其实，不仅我们两人有这种想法，部队的广大官兵也都在议论回北方打日本的事。作为二十六路军的总指挥孙连仲，也看出蒋介石利用打红军来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在江西只有死路一条，他很想把部队重新拉回北方去，而当前抵抗日寇入侵当然是回北方的最好理由了。他忽然觉得军心可用，于是就给南昌的蒋介石发去电报，说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回北方打日寇，保卫家乡，保卫祖国，希望获准。他知道蒋介石是不会准许的，所以没有等蒋复电，就命令全军撤离宁都，向北开拔。听说要回北方去，人人喜笑颜开。谁知走到宁都以北六十余里的胡岭嘴，蒋介石的电报来了，对孙连仲大加训斥，并命令部队立即返回原防，不得有误。孙连仲无奈，只得执行。部队在胡岭嘴徘徊了两日，第三天又开回宁都去了。

返回宁都不久，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和总指挥孙连仲借口到后方休养治病，先后离开部队，到南京、上海的花花世界享乐去了。孙连仲临走之前，决定不再兼任二十五师师长，把七十五旅旅长李松崑提为师长，并委以代理总指挥的重任。李松崑不学无术，在同行中威望不高，季振同、黄中岳一向看不起他，他的七十五旅训练最差，减员最多，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远远赶不上七十三、七十四旅。他突然被提为二十五师师长兼代总指挥，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一时议论纷纷，认为全靠私人关系，得以飞黄腾达。有一天，黄中岳告诉我说，那天孙连仲召集二十五师的团以上主官开会，宣布了蒋介石的关于任命李松崑为师长的命令，说什么“希望各位官长本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李师长尽服从之义务”，季振同气得脸色铁青，散会出来走了几十公尺后，跺着脚，破口大骂：“我枪毙不了这个狗日的！我服从他？”后来李松崑设宴请

客，给季振同发来请柬，他也拒不参加。

当时，二十六路军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它确如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种，就会燃烧起冲天的烈焰来。

三

火种在哪里？火种早已深深地埋藏在二十六路军内部了。我后来才知道，由我介绍给董振堂的见习参谋刘振亚（缩编后已升为上尉），当时是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组织有联系的共产党员，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工作，逐渐建立起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并积极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

早在部队驻江西宜黄地区时，刘振亚就拿出自己刚发的薪金给新来找工作的一个地下党员做路费，派他到开封向党组织报告二十六路军的情况，请示今后的工作。自此，二十六路军中开始了党的有组织的活动。

党的发展工作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着。刘振亚介绍李青云入党，后李到七十三旅学兵连当少校连长，而该连又是新发展的地下党员最多的一个单位。据王幼平同志回忆，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七十三旅在崇二都一带度过了凄苦的梅雨季节。在这里，李青云曾与我取过多次联系，规划了今后党的工作的方向。他指示我立即在学兵连开展兵运工作，主要是发展党员，但初期不形成组织，单线领导，个体活动，将来成立士兵支部；规定一般的不做宣传，着重结人缘，交朋友；他强调学兵连工作的重要

(学兵连毕业后都是下级干部)，他自己并打算活动一个能接近学兵连的职务；规定我向他直接联系，而他对我将来在学兵连发展的党员不发生隔层关系。我似乎记得他说二十六路军的党与党中央断关系很久，而是最近(四一六月期间)才接上关系的，他说中央的文件是在一个暖水壶的夹层中间带回来的。七月，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攻开始，二十六路军向宁都进军(不久即进驻宁都)。当时部队深受“四怕”(怕生病，怕吃大米，怕下雨，怕红军)的威胁，士气极为低落，学兵们都是小知识分子，更加苦闷，因此客观形势是好的。从七月到十一月，我先后发展了七名党员。部队进驻宁都后，李青云即兼任学兵连教官，不久又调任学兵连连长，于是学兵连就形成了一个有九名党员的中共支部。……

从上述片断回忆中，人们不难看出，当时二十六路军里的党组织人虽不多，(据说党当时在二十六路军共发展约二十个党员，其中七十三旅除上述九名外，尚有刘振亚、郭如岳、董俊彦等)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是很有战斗力的。九、十月间，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经党中央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党组织在这个部队里已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它时时在散发着光和热，使二十六路军这堆干柴的温度不断升高，最终燃烧起炽烈的火焰来。

一天，有几个人在黄中岳和我住的小楼上打麻将。我们住的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上面有三个房间，东、西两间做了我们两人的卧室，中间一间平时用来吃饭、会客，当然也经常打牌。当时在场的除了黄中岳和我外，还有二十七师的一个团长，名叫李锦亭。他的老家是河南西平县，和我的老家郟城是邻县，我们一向以老乡相称，而且五原誓师后又同过事，所以两人的关

系比较密切。这人热情豪爽，心直口快，往往言多有失，嘴巴不严。记得在包头时，有次冯玉祥批评他说：“李锦亭，你不怕风闪了舌头？”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牌桌上，他咋咋呼呼，数他的话最多，嗓门最大。此外，我们团的两个营长，一个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一营长卢寿椿，另一个是行伍出身的二营长孙士荣，也都在坐。

已经是后半夜了，大家的肚子有些饿，便吃了点饭，喝了点酒，尔后在一起漫无中心地闲扯。当谈到蒋介石不准北上抗日，部队困守宁都，因病减员日益增多，据各城门岗哨统计，开始每天抬出数人，后来增多至十余人，减了员也没法补充（蒋介石只对作战中伤亡减员的部队补充了一部分新兵），大家的情绪就很激动。有人说蒋介石又借口“九·一八”事变，要在原发百分之六十五经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经费，几个人更加不满了。黄中岳突然怒气冲冲地说：

“他妈的！搞不好老子把部队拉到山上当土匪去！”

李锦亭马上接过他的话，笑着说：

“好！你当土匪，我当红军去！”

二营营长孙士荣把两道眉毛一扬，也笑嘻嘻地说：

“锦亭，咱们比赛比赛好不好？”

一营营长卢寿椿笑而不言，没有表态。我见他们是发牢骚开玩笑，而且还有两个勤务兵在一旁收拾碗筷，说话不便，也就没有吭声……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我们团的曾全德书记（据说现改名曾明在罗山邮局工作）从南昌出差回来，我托他修了一只怀表，他给我送表时说：“你听说没有？七十三旅在南昌的留守处被抄了，

还出了一张大布告，骂七十三旅是土匪！”

“真的吗？”我听了非常气愤。

“我亲眼见到布告的，还是蒋总司令签署的哩！”

当天下午，我在宁都街头闲逛，迎面遇见七十三旅的军需处长宋奇峰。他已不是上次去北京采购东西时的商人打扮，而是穿着挺合身的军服。两人寒暄几句以后，我就问他：“怎么最近没有见到董旅长了？”他说：“董旅长病了。”我马上就怀疑他是不是因为南昌留守处被抄的事气病了，于是决定去看他。

我很快来到董振堂的住处。他住的是西屋靠南边的那一间房，里面的陈设十分简单：西墙根放着一张床，床前有两张桌椅，

床上有两条俄国毯子，铺一条，盖一条，他躺卧在那里。

“你怎么啦？”我进去问道。

“打摆子，刚烧过。”

他一边说着，就要起身，我连忙过去按住他，扶他重新躺下，并问：“南昌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他点点头。

“他妈的，太欺负人了！”我气愤地说。



图四 董振堂同志

“我早就料到的，这类事今后

还会有，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他苦笑了一下。

“是啊！”我赞同地说，“前天他们在我那里打牌，有的说，搞不好拉到山上当土匪去，有的说你当土匪我当红军去……”

“都谁讲？都谁讲？”他一面打断我的话问，一面用手撑着

床要起来。

我说：“不要着凉了，躺下吧！”

他硬是不依，霍地从床上坐起，下床穿上鞋子，扣好衣钮，端端正正地坐在我对面的一张竹椅上，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催我把具体情况讲给他听。

我就把那天夜间打牌后，黄中岳等几个人的议论，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他听了十分兴奋，好象什么病也没有了。我接着又说：“我觉得这样发牢骚不解决问题，我们想办法去找刘伯坚同志好不好？”

“到哪里找他呢？”他说。

“去年在河南时，听说他在上海，不晓得现在是否还在那里？”于是，我们议论起当红军的事。

这时，我又想起我在南苑时的同学陈兆凤的山炮营还留在宜黄，便说：“是不是把宜黄的山炮营也调来？”

“那样就不秘密了。”他摇摇头说，“我们要干的话，牺牲喽！”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调炮兵不易保密，会走漏风声，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根据目前情况，事不宜迟，应下决心干，不管代价如何。但是我总舍不得这个山炮营，说：“就说‘守山守城，没炮不成’，这样别人就不会怀疑了。”

“我再想想。”他说。

……

我们谈话后不几天，董振堂突然请病假去了南昌，随同他去的，还有旅部参谋刘振亚。我后来知道，他这次去南昌，看病是假，寻找党组织是真，刘振亚又从南昌去了上海，向党中央汇

报、请示了工作。几乎和这是同一时间，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也在寻找革命出路。该旅政训处长胡××，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后来可能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这时他也突然不见了。我后来才知道，是季振同派他去山西、天津等地，找冯玉祥或鹿钟麟，想通过他们再寻找党的组织，但是直到宁都起义之前，他还没有回来。

不久，七十四旅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军的大事。二团一营的一个建制班，在班长的带领下，集体携械开小差，估计是投奔红军去了。这说明，当上层在思考，酝酿，观望，准备的时候，下面的士兵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已经等待不及，跃跃欲试，有的就付诸行动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季振同碍于军纪，应付上头的追查，不得不把该营营长王子久撤职，后来就叫他到抚州去训练新兵了。

四

七十四旅一团团部设在宁都城內偏西北一条僻静的街上，大门朝东。一天晚饭后，团长黄中岳和我两人没有事，蹲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瞅着街道对面墙壁上红军写的一条标语：“纪念巴黎公社！”这条标语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大，而且写得很工整。

“共产党写标语很讲究！每条标语后面都有标点符号。”他抽着香烟，用一只手指点着说，接着，又侧过头来问：“老苏，巴黎公社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也看看他，见他脸上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笑容，心里想：他是在摸我的底呢，这个狡猾的家伙！一九二六年秋，我在包头看

过《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那本小册子，对巴黎公社有点印象，但又怕讲得过于露骨，会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便含糊地答道：“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工人起义吧！”

他可能看出了我的疑虑，突然把烟蒂往地下一扔，站起身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他的话叫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促使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位朝夕相处的团长。如果他上次说“要上山当土匪”是一时的气话，那末，这两句话却分明表达了他的真实观点，尽管也有一些牢骚的成份在内。

又过了几天，城南出现一支人数不详的红军游击队，并向宁都方向打了一排子弹。守城部队仓促进入阵地，如临大敌，可是红军游击队又悄然逸去，无影无踪，大家虚惊了一场。事后，我和黄中岳回到我们住的小楼上，他突然问道：

“老苏，红军要真的来进攻，你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

“你看呢？”我没有回答，反过来问他。

“我看不一定守得住。”

他坦率地摇摇头。我听了这话，很受感动，因为这表明他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对我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没有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再有什么比一个人把他的心托到你面前而更令人感动呢？我又想，他或许是用这种方法征求我的意见，商量什么事情吧！所以便问他：

“那该怎么办？”

“你说呢？”这回该他反过来问我了。

“我看，你去找季旅长，商量一个办法。”我瞅他一眼，含

蓄地说，“天无绝人之路，守不住有守不住的办法嘛。”

“嗯。”他也会意地笑了。

大概离上次我去七十三旅旅部看望董振堂一个多月，董从南昌回来了。回来以后就搬家，把七十三旅旅部搬到宁都县衙门东侧路北的一幢房子里，和七十四旅旅部仅有一户之隔。

一天下午，我去看他，见他吃胖了，精神也比较好。坐下以后，闲谈几句南昌的见闻，他就对我说：“从南昌回来后，刘振亚要求到学兵连当排长，我答应了。”接着，我就介绍七十四旅最近的情况，把黄中岳和我的两次谈话，以及季振同、黄中岳给我的印象，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他听着听着，突然插嘴说：

“你看，他们那里是不是有什么组织？”

组织？我猛地愣了一下。因为“组织”这个词，在旧军队里一般是不用的，如果想说明这个意思，可以用其他的词语来表达，可是他却脱口说了出来，使我感到惊异，停了一会儿，我才说：

“据我所知，没有什么组织。”

他连忙点点头。

于是，我又把七十四旅的军官情况向他作了进一步的介绍。我说，七十四旅的军官，一部分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一部分是将校团^①的学生，再一部分行伍出身，还有一部分是冯玉祥的军官学校毕业的。后两部分人多半是下级军官，前两部分人大多是中高级军官，互相间有些矛盾，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团结的，季振同和黄中岳就是他们的头头。这两人是拜把兄弟，黄很尊重季，季也很信任黄，所以才把他的老本，前身是手枪旅的第一团交给

^①将校团，是冯玉祥轮训所属团营级军官的场所。冯兼团长，副团长是季振同，实际上日常工作均由季负责主持。

黄中岳。因此，这个旅的实权就操在他们两人的手中。

“你们团几个营长的情况怎么样？”他又问。

“一营长叫卢寿椿，这个人比较稳重，别人说他是共产党嫌疑分子。”

“为什么？”他追问道。

“我是听黄中岳说的。”我说，“大概是一九二九年，手枪旅住华阴时，有天有个共产党员的朋友来找他，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了，后来上级追查，他也说不清这个朋友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了，从此就落了个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

正讲到这里，有人没打招呼便挑开白布门帘，跨进门来笑着说：

“绍仲（董振堂的字），咱们转城墙（即到城墙上散步）去吧！”

我吓了一跳，抬头一看，见进来的不是别人，是军参谋长赵博生。因为我对他的政治面貌不太清楚，感到他来得很突然，同时又怕刚才讲的话被他听去了，于是马上站起身，敷衍几句，便告辞出来了。

两天后，我和黄中岳正在我们俩住的小楼上，赵博生在季振同的陪同下，突然跑上楼来。赵博生从来没有到我们一团来过，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有点蹊跷，使我满腹狐疑，莫不是董振堂在和他转城墙时，把我讲的情况都给他说了，所以他今天亲自来看看个究竟？莫不是……果然，大家坐下以后，没有谈多少闲话，赵博生就把话题引到苏区和红军上来，他说：

“我们这里粮食紧张，吃肉困难，人家红军一个礼拜可以吃到两顿肉。”

“参谋长，你这样讲，那末红军的伙食比我们强多了！”黄中岳狡黠地笑着说。

“苏区还提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赵博生又笑着说。

“苏团副还没有结婚，可到苏区‘自由’一个。”季振同笑着把话锋一转，开了个一语双关的玩笑。

我们四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又说了一阵闲话，他们两个走了。这时黄中岳对我挤挤眼睛说：“你看出来没有？赵参谋长这个人很相信共产党！”

我一笑置之，没有表示可否。

自从这次赵博生来七十四旅后，我发现董振堂和季振同的来往突然多起来了。他们两人虽是同一个师的两位旅长，相识已经很久，但过去因为性格上的差异，交往并不多。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过去密切多了，但是为了不使人注目，又尽量避免公开场合的直接接触，而是利用互相借阅小说，把便条或书信夹在书里，派最可靠的人送去，有时他二人或与赵博生三人相约到城外去打猎。至于他们谈论些什么，外人当然不得而知。但是有一天，季振同突然布置我们，要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出操，上课，还要到野外去打靶。这样一来，牌风不禁自绝。我再看看七十三旅的直属部队，他们也在抓紧训练，好象是有约在先似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次我们团的队伍行进在宁都城内的大街上，走得整整齐齐，精神饱满，和整训前的松松垮垮，萎靡不振，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猛一转脸，发现董振堂站在道旁，神情专注地看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马上跑过去，向他敬了个礼，他一把拉住我的手，凑近我的耳边说：“你们练得差不多了！”

有时，一句话就象一把打开心锁的钥匙，我一下豁然开朗，

全都明白了。看来，经过赵博生从中工作，七十三旅和七十四旅这两只航船，已经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并排搏击着风浪，要一起驶向新的航程了。

我后来才知道，这时，关于起义的酝酿也在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中进行着，那些地下党员起着核心和酵母的作用。如七十三旅学兵连，秘密党支部研究认为，如果能团结起三十个人，就可以有把握地把这个连队拖到红军里去。于是，他们要求每个党员至少要团结三个学兵，并且积极展开活动，在群众中进行鼓动，说二十六路军受排挤打击，永远也吃不开，说二十六路军的前途漆黑一团，到头来死路一条，早晚要喂江西的狗；骂国民党官僚腐败，骂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者，是没有中国人味儿的卖国贼；说红军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作战勇敢……这样大造舆论，为暴动作思想准备。有一天，一个地下党员在厨房里借故发作，大发牢骚，最后大声说：“老子当红军去！”十几个学兵正围着行军锅喝水，听他这样说，一齐叫嚷起来：“谁不去是小舅子！”“你前边走，我后边跟！”你一言他一语，越说越激动。这虽是一个小例子，但它充分反映了当时二十六路军广大士兵群众的思想情绪。

与此同时，个别串连的工作也在秘密地进行着。董振堂就亲自找他的两个传令兵谈话，问他们知道不知道红军是干啥的？两个传令兵虽然也看到红军的标语，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啦，什么“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啦，但是摸不清旅长的意图，谁也不敢乱说，两个小鬼互相看看，摇摇头说：

“不知道，咱们不知道。”

董振堂见他俩有顾虑，又问：

“南方好，还是北方好？”

“当然北方好呗！”

这个他们敢说，而且抢着诉说南方气候热，潮湿，多雨，蚊子厉害，吃不惯大米……一句话，是个要多憋气有多憋气的鬼地方，哪比得上北方呀！

“北方好，可是回不去北方怎么办呢？”董振堂又问。

“我们跟着旅长，旅长到哪我们到哪！”两个机灵的小鬼回答得很“艺术”。

董振堂高兴地笑了，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不晓得红军是干什么的？他们原来都是穷苦百姓，生活不下去，没有活路，才拿起枪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所以他们说自己是为穷人服务的队伍。

这时，一个小鬼还不敢说话，另一个胆子大，说：“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服务，我看就不错。”

董振堂赞许地点点头，再一次启发他们两个：

“我们都是北方人，回不去北方怎么办？”

“我们跟着旅长，旅长到哪我们到哪！”两个传令兵仍是这句话。

“好，好！”董振堂微笑着说，并嘱咐道：“咱们刚才讲的这些话，千万不能对别人讲啊！”

两个小鬼懂事地点点头。

起义的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十二月上旬末，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派人进入革命根据地，与红军接洽，联系暴动的具体事宜。董振堂派的是地下党员郭如岳，季振同派的是“共党嫌疑”卢寿椿，刘振亚派的是袁汉澄；三人分别

作为七十三旅、七十四旅和秘密党组织的代表，一同前往根据地。临走那天早晨，卢寿椿在我们住的小楼上吃早饭。为了遮人耳目，借口说是他父亲从北方来了，已经到了广昌，他要去见见父亲，劝老人家回去，别到兵荒马乱的宁都来。其实，季振同已经个别向他交代了任务，他的那套便衣也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小包里，只要一出县城，就可以穿起来，奔向那令人向往的无限光明的地方。

他们三人在苏区见到了王稼祥、刘伯坚、左权诸同志，把赵、董、季、黄等人的愿望和打算作了详细汇报，王、刘、左诸同志也代表中央军委对起义作了具体指示。两三天后，他们三人从苏区回来，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起义的具体事宜已经联系妥，起义的日子就确定在十二月十三日。由于他们这次见到了大革命时期在国民联军任过总政治部部长的刘伯坚同志，季振同、董振堂等对党更加信任，起义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

五

卢寿椿等三人从革命根据地回来以后，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四人，多次秘密地在一起研究，周密考虑举事的具体方案。他们认为，为了保密，为了动员更多的部队参加进来，在公开场合，暂不以当红军为号召，而是强调要求抗日，绕道打回北方去。他们确定，起义那天，赵博生以总参谋长的身分，宴请全军团长以上主官，这样可以一个不漏地把这些人扣起来，而后用他们的名义下命令调动部队。当然，最大的障碍是那个二十五师师长兼代理总指挥李松崑，他如果不来赴宴，也

不离开他的老窝二十五师师部，那就只有来硬的，坚决把他除掉。

为此，一营长卢寒樁先一天以看望朋友为名，亲自到二十五师师部驻地，进行实地侦察，研究了具体战斗方案。我们一团的部队出早操，或练习紧急集合跑步时，故意全副武装地从二十五师师部的门口经过，以麻痹他们，便于将来突然下手，将他们包围缴械。

为了保障全军起义顺利成功，起义领导人强调必须特别注意保密，并作了相应的规定：任何与执行任务无关的人员，均不得让其知道起义行动的任何消息；对于执行任务的部队，仅告知他们执行任务所必须知道的情况，其他的一概不要涉及。

关于起义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也都估计到了。万事具备，唯欠东风。只等十三日一到，就把革命的红旗在宁都城头上高高地举起！

然而，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有一个消息传来，说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冬衣、十一月份的薪金和经常费已经到了广昌，不日即可运来。怎么办？如果按原计划起义，这些棉衣和薪饷就无法得到，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呢！季振同坚决主张把起义的日子推迟一天，争取给大家发了衣服，发了饷，暖暖和和，高高兴兴地去当红军，赵博生、董振堂最后也同意了。于是，一面派人秘密出城，通知红军更改起义日期，一面派旅部副官李达连夜赶到广昌，催促骡马大队将棉衣和薪饷日夜兼程运回宁都。

十二日，浩浩荡荡的运输大队终于到达。棉衣和薪饷立即分发下去。领了饷的军官和士兵们，纷纷上街买日用品，买纸烟，买吃的东西，宁都的茶楼酒肆，到处挤满了大兵，气氛显得有点紧张。象我们这些心中有事的人，思想上的弦绷得紧紧的，当然没有心思逛大街了。为了防备走漏消息，发生不测情况，几个起

义的主要领导人都暂时隐蔽起来；如董振堂躲在他们旅部对过一家老百姓家里，黄中岳秘密地隐藏在团部住房的天花板上，任何人都看不见，有重要事情只要我去请示他。我们团的部队，除了照常下操外，日夜处于戒备状态，随时都准备紧急集合，执行新的任务。季振同一如既往向他的二十七师的几个老朋友宣传说，今天赵参谋长请客，听说有新由上海运来的好烟、好酒、好菜、好水果吃，请你们一定按时来，我一定奉陪。他就好像平常一样。

起义的另一支骨干力量——七十三旅学兵连，这天也是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清晨，连长李青云（学兵连的支部书记）根据董振堂的指示，宣布要连续举行几天野外演习，命令全连官兵伏立即全副武装，兵不离班，枪不离手，随时准备紧急集合。当下全连装束停当，集合在班里静待了一天。到晚上，上级又传令下来，不准解包袱毯子，大家要衣而卧，枕戈待旦。

这种紧张的气氛一直延续到十四日下午。我老是掏出怀表来看，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过一天象过一年似的。我不得不一再对自己说：“沉住气，沉住气，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出一点破绽来啊！”

十四日下午两点，季振同突然通知在旅部他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黄中岳、我和一团的三个营长，新到职的副旅长临时兼代二团长曹金声、中校团副吴子罕和他们的三个营长。季旅长住的房子本来就很窄小，坐了十一个人，更显得拥挤。大家喝着水，抽着烟，室内烟雾弥漫，热气腾腾。季振同一反平时喜欢说说笑笑的习惯，神情十分严肃，宣布开会以后，就激动地说：

“各位，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窥伺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衷于打内战，置

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不准许，我们就绕道广东，然后再打回北方去。”

他讲得很干脆，很有煽动性。到会的人互相交换一个眼色，或者会心地相视一笑，有的说：“行！没有别的出路，就照旅长讲的办吧！”

接着，他就下达具体任务：第二团负责守城，部队由吴团副指挥，下午四点以前，派部分部队把一团在各城门的岗哨统统换下来；一团通往各城门的电话网不要撤收，暂交二团使用；六点稍前，切断由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出。第一团的部队由苏团副指挥，六点之前集合在县衙的院子里待命；下午四点，由三营派出部分部队去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的警戒。最后，他威严地扫了大家一眼，斩钉截铁地说：“各部必须按时接交完毕，不得有误。大家如果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分头执行吧！”

在这次会上，季振同没有明确宣布要去当红军，是恐怕有人缺乏思想准备，当场提出异议，节外生枝，影响起义计划的执行。至于我们第一团一、三两营的具体任务，早一天就分别下达给这两个营的营长了，而团部特务排、传令排的任务，是当天下午四点以后才布置给有关领导的。为了严格保密，这些都没有在会上讲，二团的几个领导干部当然也无从知晓了。

我怀着兴奋、激动而紧张的心情，匆忙地回到团部，立即通知部队，下午五点半以前，大家穿上大衣，全副武装，集合在县衙门院里的篮球场上看赛球。由于平时进行了多次练习，今天一声令下，部队均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各营报告人数以后，便开始赛球。五点五十分左右，一、三两营及团特务排按照预先下达的号

令开始行动，分头去执行自己的任务了；第二营和团直、迫炮连、机炮连等七个连队作预备队，仍在原地待命。

当时，二十六路军共有八部电台，其中三部（即总指挥部电台、二十五师师部电台和蒋介石的特务电台）每天都按时与南昌通报，其余五部因无任务，没有开设。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当然首先要把这三部电台控制起来。根据事先分工，二十五师师部电台由七十三旅学兵连派人控制，蒋介石的特务电台由总指挥部的上尉执法队员刘向三带人去解决，我们团就负责控制总指挥部电台。我团特务排的一个班长，带着四个传令兵，突然闯进总指挥部电台的住地，把枪一端，命令他们立即关机，停止工作，人员一律离开机器，否则就要不客气。电台台长姓董，是个少校，因为我们过去常到他那里收听新闻广播，是很熟悉的，他慌慌张张跑来找我说：“老苏，怎么回事？你们的人要我们离开机器，不许动！……不许动！”我安慰他说：“没有什么，不关你的事，过些时候你就会明白的，你先回去吧！”他见问不出个名堂，就悻悻地走了。

三营是去总指挥部的。赵博生事先通知总部特务营长，叫他们下午四时把总部警戒交给七十四旅，特务营另有任务，在驻地待命。所以三营很顺利地接替了那里的警戒。因我三营的装备和总部特务营是一样的，哨兵人数又没有增减，外人根本看不出总部换了警戒部队。六时稍前，营长严图阁率三营其余部队（缺机炮连）和平时练习跑步一样，来到总部驻地周围，秘密而又迅速地把总指挥部包围得水泄不通。这时，那些团长、旅长们，身后跟着传令兵，或者骑马，或者步行，神气活现地前来参加总部为他们举行的“盛宴”。因为听说从上海运来了白兰地酒，炮台烟，还有美国的水果，宴会以后还要打麻将，让大家好好乐一乐，所

以今天来的人特别踊跃。严图阁从旁边见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扬地走进总部大门，就象猎人盯着猎物落进了自己埋设的圈套，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在此以前，我们团的柴副官化妆成传令兵模样，带着团部特务排，跟季振同、黄中岳提前来到总指挥部。那些赴宴的军官一到，赵博生招呼他们到楼上去喝酒，柴副官和特务排的人员就在楼下招待那些随同前来的护兵们。入坐时，柴副官他们有意识地插花就坐，两个对付一个，把那些护兵夹在中间。六时稍前，大家刚喝了第一口酒，正在举筷夹菜，柴副官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来擦嘴——这是动手的信号，只听得低沉有力的一声喝：“不许动！”特务排人员的枪口都抵在那些护兵的后腰上，干脆利落地把他们的枪下了。

这时，九连的焦连长带了二十多个人，迅速向楼上冲去。这是一座教会修的砖木结构的西式楼房，二层楼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走廊，木头楼梯架在楼的西力里。他们往上冲时，一个战士由于过分紧张，不小心手里的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子弹飞向空中。这里枪声一响，正在喝酒的军官们立即大乱，忙问：“哪里打枪？哪里打枪？”二十七师的团长李锦亭和另一个团长王天顺，仗着自己年轻力壮，腿脚敏捷，迅速从楼上跳了下去。当然，他们两个跳到院里，也没有逃脱被捉的命运。这次前来赴宴的十多名团长以上军官（包括七十三旅的两个团长），全部被九连捉住。等他们惊魂稍定，逐渐清醒过来，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可是已经不见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等四人，他们早已悄悄离开，到七十四旅旅部去指挥整个部队的起义了。差不多与此同时，董振堂还诱捕了七十三旅几个政治上靠不住的营长。九连的士兵

们把一个个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俘虏押回连里，关了起来，后来令他们交出私章，有的当时还互相埋怨说：“我本不想来，你偏说什么今天有好吃的，可不，真尝到好滋味啦！”

至于那位跳楼的李锦亭团长，就是那次夜间在我团打牌时说“当红军去”的那个人，一看抓他的全是七十四旅的士兵，便大着嗓门说：“我要见你们季旅长、黄团长！”事先焦连长已接到指示：不要捆绑他，把他马上送到七十四旅旅部来。他一见季振同、黄中岳，就大为不满地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为啥对我保密？难道我不干吗？”

季振同连忙给他解释：

“老弟，我们北上不成，只有另找出路，总不能在这里束手待毙呀！”

“那为何不早告诉我？”他仍然大着嗓门说：“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你不信，问黄团长，我不是在他面前说过的吗？你们看不起兄弟，事先不通气，瞧，差点儿把腿跌断了。”

季振同连忙要叫军医来给他看看，他一瘸一拐地走着，摇着手说：

“用不着，用不着，幸亏楼房不高！”

季振同和黄中岳一再给他陪不是，说由于考虑不周，叫他受惊了，并趁机做他的思想工作，晓以大义，希望他和大家站在一起，回去把部队拉过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到凌晨二时，城内的敌对力量已全部解决，就放他出城，回去整理部队，结果他不仅带出了他那个团，还把他们的另一个团（团长已在宴会上被扣）也带了出来。

另一路是由一营长卢寿椿率领，去苏家祠堂二十五师师部捉

拿代总指挥李松崑的。这天，李松崑推说身体不好，没有来参加宴会。也许是听到了总指挥部传来的枪声，师部大门口临时又加了双岗，除了平时门外两个哨兵，门里又添了两个，刺刀上枪，子弹上膛，如临大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卢寿椿带着队伍跑步赶到门口，二话没说，按照原定战斗方案，上去几个人把门外两个哨兵抱住，其余的人正要往里冲，门里的哨兵突然一扣板机，“突突突”，打了一梭子，前头五人应声倒下（两死三伤），后面的人稍一迟疑，那两个哨兵“咯登”一下，把两扇黑漆大门关死了。卢寿椿他们被关在门外，冲不进去，叫里面开门，里面却不应声。双方僵峙着，谁也不打枪。里面不打枪是摸不清底细，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干啥的；外面不打枪是怕惊动了城外的部队，影响整个起义计划的实现，所以只是在围墙外面叫嚷、威胁：

“再不开门要放火烧房子了，要用炸药炸了！”

“快！把煤油桶拿来！”

“把枪交出来，把李松崑交出来，其他人统统没事！”

……

这样对峙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一个结果。忽然，从西边的副官处跑出一个人来，是只有一条胳膊的“独臂将军”——少将副官长赵某，他见是二十六路军自己的部队发生冲突，便说：“好好好，你们两家不要打了，我替你们当说客去。”卢营长遇到这个新情况，不敢擅自作主，便回来一一作了汇报，请示怎么办？我考虑后，同意让赵副官长去当说客，但必须坚持交出全部枪支和李松崑这两个条件。我用电话请示季振同和黄中岳，他们也都同意。于是，卢营长回去对赵副官长说：“行，只要他们缴枪，交出李松崑。我们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赵副官长便去叫门，里面放他

进去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赵副官长才从门里出来，说：

“里面不愿缴枪，说那样太丢人，大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过有个变通的办法，缴枪的撞针。”

卢寿椿不禁笑了，这真是吊死鬼搽粉——死要面子，枪卸去了撞针，不和烧火棍差不多了吗？还不愿缴呢！便说：

“也行。李松崑呢？”

“他们说，你们进去自己找他！”

卢寿椿掏出怀表，见时间已是半夜十二点多，担心拖下去会影响整个起义行动，便点头同意了。

赵副官长又第二次进去。不久，两扇漆黑的大门敞开了，里面派人送出一百多根撞针来。

卢寿椿赶紧带着一些人进去捉李松崑。但搜遍整个院子，不见李松崑的踪影。后来了解，早在双方对峙时，他已吓得屁滚尿流，翻越后墙逃跑了。

下半夜两点多钟，卢营长带着队伍回到县衙门大院，向我汇报了执行任务的经过情况。卫生队长姬鹏飞率领医护人员，忙着抢救那几个伤员。我用电话报告季振同说：“李松崑跑了！”只听得他在电话里十分遗憾地说：“怎么让他跑了呢？那就便宜这家伙了！”

不一会儿，我又接到负责守城的二团吴团副的电话，要我请示季旅长（他的电话不能直通旅部）：“边章五要出城去，行不行？”

边章五是七十五旅的新任参谋长，河北束鹿人，和董振堂是邻县同乡，又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期步科同学。他们一起分配到冯玉祥部队，在学兵团步二连当排长，后边章五一度离开，到张

宗昌部队干事，张宗昌垮台以后，他又找到董振堂，安排他当了教官、中校团副，不久前调七十五旅任参谋长。所以，他们两人有很深的私人交谊。十四日下午，董振堂用电话把他请进城来，给他做工作，动员他参加起义。董振堂极为恳切地说：“你还不相信我吗？我只能带大家走向光明，不会带大家跳火坑的。即使前面有火坑，我先跳，怎么样？”边章五终于同意了。后来董振堂又告诉他：“七十五旅旅长张芳昭和两个团长已被扣住，你带着他们的私章，回去用他们的名义调动部队吧！”所以他才来到北城门，要求出城。

我立即向季振同请示。他好象已经知道此事，很干脆地答复说：“可以，让他出去吧！”我马上转告吴团副，放边章五出城了。

这时，我们团的三个营以及团直全部集合在县衙门的院里待命。我见原来布置的任务均已完成，此时部队没有事做，就给季振同挂电话，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把宁都县的国民党县长捉起来；第二，把宁都县靖卫团的枪缴掉；第三，派出一部分人员去打土豪。季振同同意马上把县长捉起来，对第二、第三条建议还没有表态，不知什么原因就把话筒放下了。于是，我拿出一张名片，叫两个传令兵去请宁都县长到我这里来。县长叫温肇祥，是本地的一个大地主，四十多岁，肥头大耳，正在床上呼噜呼噜地打鼾呢。传令兵跑去叫醒他，他睡眠惺忪地说：“半夜三更有啥事呀！”边钮扣子边走出来，到院里一看，见我们的部队整齐，肃穆地坐在地上，气氛十分紧张，他吓出一身冷汗，一阵阵筛起糠来，没容他再开口询问，我们就把他关押起来了。

我刚处理了宁都县长的事，团部通讯排有人跑来报告，“有

些人自由行动，到街上抢铺子去了。”

原来，我刚才给季旅长打电话请示能不能“打土豪”之事，被旁边的值班传令兵听见，他们又作为特大新闻告诉了旁边的通讯排，通讯排有些人就自作主张地行动起来。他们只听说过红军打土豪，根本不知道打土豪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抢东西，便到大街上砸开了一月洋广货店，拣好东西随便拿。我赶到那里，见七、八个人正在捆捆扎扎，要把东西带走，店里的老板、伙计一个个吓得浑身哆嗦，站在一旁不敢说话。我严厉地问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是革……革命了吗？我……我们打……土豪！”那几个兵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土豪吗？谁叫你们干的！乱弹琴！快把东西放下，统统回去！”经过训斥，他们老老实实地放下东西，回队伍里去了。类似的事件，在我们团再没有发生。

我从大街往县衙门走时，天色已经微明，在朦胧的晨光中，见到副官长（淮水）正在张贴一些大标语：

“打回北方去！”

“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

看见这些标语，我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啊！起义了！漫长的黑暗的道路终于走到尽头了！从今以后，我们和卖国贼蒋介石一刀两断，就要开始新的无限光明的生活了！

十二月十五日早晨，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洒遍了这座梅江河畔的山城。大家一宿没有合眼，但都毫无倦意，晨曦照映着一张张激动而兴奋的笑脸。

黄中岳从旅部回来了。他告诉我：大规模的起义已经成功。

除了驻在宁都以北四十里的石上一个团没有参加外，二十六路军两个师（包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共六个旅，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宁都起义。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互相握手祝贺：“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他又说，七十三旅为前锋，董旅长已经带着部队出发，出东门，过梅江，直接开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各旅挨次跟进，我们团殿后。至于那些被扣的旅长、团长，等我们离开宁都时，就把他们放掉，每人发三百元路费，让他们各奔前程去吧！

他还说，今天早晨，季振同决定让旅部少校参谋潘泽生在宁都负责留守工作，照管伤病员和一部分军械、被服等物资。潘参谋见部队已经开走，宁都成了一座空城，害怕红军打进来，不敢接受任务。季振同非常恼火，当时就要执行军法，把潘参谋拉出去枪毙了，经大家劝解，这个参谋才保住性命，但立即宣布撤去其少校参谋职，降为差遣，勒令其去执行留守任务了。

上午八、九点钟，太阳已经很高，宁都已没有别的部队，我们也该出发了，黄中岳命令掌旗官把国民党发给我们团的军旗扯碎，扔掉了。

我们团的队伍走出东门，穿过梅江上靠南边的一座木桥时，见有一支红军队伍，和我们走着相反的方向，穿过北边另一座木桥，由宁都的水洞门进城。后来知道，这是陈光师长带领的红十二师，根据上级的命令，在宁都城外配合我们这次起义行动的。十分可笑的是，宁都城里的土豪劣绅，害怕我们走后，宁都重新被红军占领，便背着大包小包的细软衣料和贵重物品，跟在我们队伍后尾逃起难来。我们也不管他们，一直走到革命根据地，

这些家伙一个个都被革命群众捉住了。

六

走了整整一天，我们来到革命根据地——固厚。

刘伯坚、左权等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前来迎接我们这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部队。在我们到达固厚之前，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以及七十三旅的广大官兵还受到刘伯坚、左权等中央、军委代表的亲切接见和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左权同志的陪同下，继续向革命根据地纵深前进。

当我们走近固厚时，天已经黑了，只见前面一座黑洞洞的村庄，村头上有人举着火把。走近一看，原来是根据地的儿童团少先队，有一百多人，每人手里举着一面纸做的彩色三角小旗，列队站在大路两旁，喊着欢迎我们的口号。见到这个动人的场面，我的眼睛湿润了。自从来到江西，群众遇见我们，不是躲避唯恐不远，就是投来冰冷、仇视的目光，哪有出来表示欢迎的？我突然觉得，这根据地的山，根据地的水，根据地的一草一木，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对我统统变了，变得不再陌生、疏远，而是那样可爱可亲。

“我们的刘部长接我们来了！”前面突然传来消息。

季振同、黄中岳和我三人赶紧跑到前面去，只见在一支熊熊燃烧的火把下，刘伯坚同志身着灰布军衣，头戴红军帽，满面笑容地站在那里。他帽上的那颗红星，被火光映照得特别鲜艳耀眼。我们快步迎上去，和他打招呼，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地说：“昨晚我一夜没有睡觉，以为你们几个牺牲了，谁晓得

你们搞这样大的规模！列宁讲过，暴动时机成熟了，一分钟都不能迟延的。我真替你们耽心哪！后来才知道，你们把暴动的时间推迟了一天。”

固厚，离宁都城六十里，是个不算很大的村子——是当时澎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当天晚上，部队就在这里宿营。

吃过晚饭，在一家老百姓的堂屋里，点了两盏明亮的马灯，刘伯坚、季振同、黄中岳和我等几个人围桌而坐，热烈地交谈起来。他先要我们讲讲策划起义的主要经过，季振同给他介绍了。他听后笑着说：

“估计你们要流血，要伤好多人，所以我们动员苏区群众抬担架来接你们，结果你们前边的部队一看见老百姓就拉扶，把那些老乡都吓跑了。”

我们听了也都笑起来。季振同说：

“是啊，虽然起义了，但要成为真正的红军，还得有一个过程哩！”

“还有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刘伯坚神情严肃地强调说。

我们闲谈一阵以后，就一起研究宁都起义的宣言书。宣言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们都是穷苦工人、农民和受压迫的出身，原在国民军中服务，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加入国民革命的战线，参加北伐，不久即由于国民党军阀的背叛而失败了。我们从此以后，就卷入了军阀混战的旋涡之中，血战了四年之久，百战余生的我们，得到了什么？热血洒遍了全中国的数百万白军士兵，又得到了什么？

“我们转战南北，奔驰万里，眼见得全国劳苦工农辗转呻吟

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重重压迫之下，眼见得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国民党军阀到处血淋淋的屠杀工农和共产党员，拿血腥来维持它日益崩溃的统治；眼见得重重迭迭不断的灾祸，随着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高度的剥削，降临到全国劳苦工农的头上；眼见得军阀克扣军饷，大喝兵血，去过他们军阀官僚的腐朽生活。

“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但我们同样受着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得不到意志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在今天以前，我们所感受的压迫的深重与全中国工农是一样的，还蒙了反革命军阀部队的恶名，为工农群众所痛恶。我们现在坚决的暴动了，脱离了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从今天起我们加入工农红军，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

宣言通过以后，当晚就由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象漆黑的夜空中一道耀眼的闪电，象沉闷的寰宇间一声震耳的惊雷，它向全中国的人民庄严宣告：原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不堪受国民党军阀头子蒋介石的压迫，终于向热衷于打内战的独夫民贼发出猛烈的一击，具有历史意义的宁都起义胜利了！光荣的红五军团诞生了！

当激昂慷慨的起义宣言向全国广播时，我们几个人仍在这间普通的农家堂屋里，兴致勃勃地畅叙别后之情。大家的话题很自然地回溯到一九二六年九月五原誓师后，我们在绥、甘、陕、豫，特别是在西安的一些往事。我们谈起冯玉祥先生。刘伯坚说，他在西安时秘密建立党的陕甘区委，没有告诉冯先生，冯事后对他还很不满意。他还告诉我们，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先生曾经派人到上海找党中央，要求给他派干部去，党中央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派来的人说：“回去告诉冯先生，请先打起红旗，然后我们再派干部去！”可是不久，中原大战就

以冯阎失败而告终了。

谈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在郑州时，刘伯坚夫妇离开国民联军的情景，便问道：

“王淑振同志好吗？她现在在哪里？”

“她很好，现在在瑞金，我们已经有两个小男孩了！”刘伯坚含笑答道。

那天夜晚，我们都很兴奋，感到有许多许多的话要说，你一言，我一语，谈个没完，直到夜已很深，才各自回去休息。

次日清晨，旭日东升，晴空如洗。部队出发前，集合在一个宽阔的打禾场上。刘伯坚给大家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军委，热烈欢迎原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授予起义部队以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时年31岁）为红五军团的总指挥，董振堂（时年36岁）为红五军团的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时年34岁）为红五军团的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时年30岁）为十五军军长。他最后号召大家紧密团结起来，高举革命的红旗，为解放全中国几万万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为中国的真正独立与统一而英勇战斗！

至此，每一个人才完全明白：我们已经是红军了。

第二天的行军路线都在革命根据地内。沿途受到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送茶送水的，送米送柴送菜的，还有唱歌的，跳舞的，随处都可看到，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出身于贫苦农民或灾民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看到分到土地的农民这样兴高采烈地来欢迎我们，内心很受感动。但是，有一些军官，特别是一些事前不知道要起义当红军的营以上军官，却闷闷

不乐，情绪消沉。在上午行军大休息时，二团二营的刘营长给黄中岳送来一张便条（他和黄是老同学），上写：“本初（黄中岳字）：我想回家。我把马送给你，请你给我一点路费！”我看到这张纸条，心里很不平静，想得很多。的确，正象刘伯坚昨夜讲的，这些人要成为真正的红军战士，这个部队要成为真正的革命队伍，还得有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呢！后来，二团二营刘营长坚决不愿留下，就让他到苏区参观后，离队回家了。与刘营长思想相同的一些军官，在志愿回家的条件下，不久也走了一批。

经过几天行军，部队在瑞金县附近的秋溪、壬田市、九堡、西江市一带住下来。中央军委给五军团派来了大批政工干部，其中有军团政委肖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十三军政委何长工、十四军政委黄火青、十五军政委左权，还有其他几个师的政治委员。每个连都派了指导员。考虑到我们都是北方人，不懂本地话，同驻地群众联系不方便，所以每连又派来一名懂本地话的采买（相当于上士或司务长）。到九堡一带以后，几乎天天有兄弟部队或苏区群众来送粮食，送猪肉，演节目，表示欢迎和慰问，我们的日子过得就象天天过年似地热闹、红火。

十三军驻地九堡北面十几里的一个村庄里。一天，董振堂军长带着部队到九堡来看戏，我见他穿一身灰布军装，帽上缀着红星，脚上穿着草鞋，满面笑容，给人一种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喜悦之感。我后来知道，起义后不久，他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那时有三千多元私人积蓄，起义后，全部交给了党，政委何长工把这事反映给毛主席，毛主席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他却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但是，随着政治工作的加强，思想教育的深入，一些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人，也有向另一方面转化的。如十×军有个连（原二十六路军特务营的一个连队），在少数反动分子的策划下，武装哗变，妄图重投白军，但没有跑出革命根据地，就被追回，为首的被处决，这个连队也被编散了。

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在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提出反对军阀作风的口号后，有些干部情绪波动，怕革命烈火烧到自己头上，提出请假离队的要求。因此，我们决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多做开导、说服的工作。那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战士提出了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如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等等，有些连队指导员往往讲不清楚，因此有次在军团部开会，我就建议肖劲光政委给大家讲讲这些问题，他当时就答应了。两天以后，肖政委给住在九堡的全体连以上干部上课，讲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大家听了感到非常解渴、过瘾。由于从上到下注意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大约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一天上午，季振同、卢寿椿和我三人，在刘伯坚的陪同下，到瑞金东北十五里的叶坪（当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去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军委首长。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的言语不多，但态度十分亲切、和蔼，总是启发我们多讲，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我们，很专心地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问我们到苏区以后有什么感想？部队的情况怎样？你们喜欢看些什么书报？……我说，我最喜欢邵飘萍办的《京报》，特别是《京报》副刊，其他的报也看，如《大公报》等，但《中央日报》最反动。我们初到江西时，见到红军写在墙上的标语，就联想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

沙俄军队做工作的情况，因此不再相信所谓红军是土匪的说法，因为土匪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政治口号来，从而得出国民党的宣传尽是骗人的鬼话的结论；起义前有一段时间，由于没有找到党，想革命又无桥梁，思想上异常苦闷，尽靠打牌来混日子，毛主席笑笑说：“政治上没有出路嘛！”我还说，最近听到士兵们晚上躺在床上聊天，有的讲，说蒋介石是军阀我们相信，说冯玉祥是军阀就想不大通，说自己的连长、排长也是军阀就不大相信。毛主席听了笑道：“把一个小连长也算成军阀，人家怎么能相信呢？”我还对毛主席说，下级干部和战士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和灾民，他们对于打土豪、分田地很感兴趣，对刘伯坚同志的讲话很容易接受，但是有些同志由于不了解这个部队的历史和现状，不了解战士们的心里，把国民军和一般军阀部队一样看待，讲话一般化，收效就不大；建议今后刘伯坚同志多给大家上课、讲话，再就是多给大家演些戏。这时季振同插话说：“毛主席，能不能请贺子珍同志给我们演演戏？”毛主席笑着说：“好，我尽量动员她去。”不久，贺子珍同志果然来到九堡，和季振同、肖劲光三人登台给部队演了一出独幕剧，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后来，有人叫季振同去打篮球，他把衣服一脱，连蹦带跳地走了。我被领到一个祠堂里。这里是中央苏维埃政府的礼堂。在主席台东边的一间空屋里，毛主席又同我个别谈话。他问得很详细，问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经历，甚至问我结婚没有……我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了解这些情况，但都一一如实向他谈了。毛主席很认真地听着，并亲自作了记录。恰巧，当时正在召开全苏区的青年代表大会，不大一会，会场里坐满了人，毛主席站起身来，动员我代表五军团的青年给大家讲讲话，我毫无精神准

备，怕讲不好，有些畏难，刘伯坚却趁我不备，从后面一推，把我推到主席台前，会场里立即鼓起掌来，我没法再推辞，只得硬着头皮讲了，主要是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我们到苏区后的一些感想，讲了二、三十分钟，才走下台来。

同我谈话以后，毛主席又和卢寿椿个别谈了话。季振同因与项英、王观澜一块先出去了，毛主席如何与他个别谈的，那就不清楚了。

下午，我们去看望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的房间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中间地上放着一个炭火盆，床上一条红色的长毛毯子，算是这里唯一的高级用品了。朱总司令热情地接待我们，亲自夹木炭，把火生得旺旺的，让我们围炉喝水。我们向他提了许多问题，请他讲解十大政纲中我们不大了解的部分，并请他谈谈自己的经历，如何从旧军队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很高兴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大家愉快地谈着，不觉红日西沉，天色已晚，我们就住缩在叶坪了。

第二天，季振同因事留在叶坪，刘伯坚、卢寿椿和我三人先回部队。毛主席亲自把我们送到大门外，临时又叫刘伯坚同志稍停一下，说要谈几句话，于是我和卢寿椿两人便牵着马先走了。

早晨的田野里，空气格外清新，绿茵茵的麦苗，衬着远处苍翠的青山，碧蓝的天空，南方山区的风景确实幽美动人。我们慢慢地走着，几乎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卢寿椿忽然说：

“老苏，毛主席和我谈话，为啥问得这样详细？”

“大概毛主席想尽快了解我们，熟悉我们吧！”

我们两人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都为能够得到党和领袖的亲

切关怀而感到无比欣慰。

我们边走边谈，走到离叶坪四、五里的飞机场附近，刘伯坚同志从后面策马赶来。他跳下马背，走到我们跟前，兴匆匆地说：

“毛主席说啦，你们两个可以入党！”

“我够入党的条件吗？”

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是我早就隐藏在心底的愿望，宁都起义以后，这一愿望变得更加迫切、更加强烈了。但是我又觉得共产党无限伟大，共产党员是了不起的人物，象刘伯坚同志那样的共产党员的活榜样，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哪！所以听了刘伯坚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后，才提出我是否够入党条件的疑问。

“你够了。”他肯定地点点头。

“是不是学习一段时间再加入？”我又说。

刘伯坚说：“不一定懂很多理论，只要坚决，你看朱总司令！入党以后，还可以继续学习嘛！”

“好，如果是这样，我就要求入党！”

回到九堡以后，由刘伯坚、左权、高自立三同志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很快就履行了入党手续。八、九个月后才知季振同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党组织的。

入党以后，军政委左权同志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队伍里的一员了，你要始终牢牢记住：‘任何关系都不能超过党的关系！’”他谈完后，又送给我《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国际路线》和《斯大林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度执行情况的报告》四本书，要我很好学习，争取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他的谈话以及送给我的

这些书，对我来说，简直是雪里送炭，使我如获至宝，激动不已。

在这段时间里，部队经过教育、整顿和训练，面貌焕然一新。连队普遍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战士中间秘密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小组、支部，并把一些思想进步、技术熟练的士兵提拔为基层干部……这样，红五军团就基本上消除了旧军队遗留下的痕迹，以崭新的革命姿态，活跃在粉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的战场上了。

* * * *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占有光荣一页的著名的宁都起义，已经过去五十个年头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从未写过关于宁都起义的文章。现在中央决定对含冤而死的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昭雪，并要求“原红五军团的同志撰写纪念文章或革命回忆录，陈述五军团光荣斗争史”。我作为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感到很有必要在我有生之年把这次起义的可歌可泣的史迹如实地记叙下来，以纪念死者，并激励来人。

当时，在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除赵博生同志是新入党的党员，其他三位都是党外人士。董振堂同志任七十三旅的旅长，季振同同志任七十四旅的旅长，黄中岳同志是这个旅的主力团长；这两个旅不仅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也是宁都起义的骨干力量。他们四位都是热爱祖国的军人，对蒋介石独裁卖国，消灭异己，进攻红军的反动行为，非常愤恨。在我地下党积极进行工作的情况下，他们响应号召，以极大的气魄和惊人的胆略，成功地组织了这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十分遗憾的是，他们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赵博生同志一九三三

年初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黄狮渡战役中英勇牺牲，董振堂同志也在一九三七年年初西路军失败时，于一月二十日在甘肃高台壮烈殉职，成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季振同、黄中岳两位同志在一九三二年竟被王明路线统治下的错误的肃反路线所杀害了。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时党中央指定的二十六路军中党的主要负责人、特支书记刘振亚同志，正是他派人与党取得了关系，在二十六路军中发展了党的组织。起义前不久，他还亲自到上海向党中央作过汇报、请示，在起义前几天，又派人往苏区联系了起义的具体事宜，对宁都起义作出了重大贡献。起义后，刘振亚同志任过红五军团的团长、建黎泰军区参谋长，后又担任红五军团的侦察科长。可惜，他于一九三五年牺牲在长征途中。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但是，历史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将继续鼓舞人们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更加奋勇前进！我也谨以此文，作为对亡友的深切悼念！由于当时起义工作是在十分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只能了解自己所接触到的一部分情况，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要请读者原谅并请加以指正的。

（李 翔 整理）

与魔鬼打交道的广大华行

吴雪之

卢绪章

(全国政协常委)

(全国政协委员)

广大华行的性质与任务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和江苏省委在上海物色党的干部，去国民党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秘密任务。

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选派卢绪章同志去重庆，以原有的广大华行为掩护体，并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

党中央对广大华行工作的方针任务，根据各个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地作了部署。

一九四〇年夏，卢绪章同志离开上海去重庆前，刘晓同志按照党中央指示，郑重地嘱咐：到大后方后，要以重庆为中心，做好掩护工作，掩护好去各地执行党的重要任务的同志。卢绪章同志到达重庆以后，与刘晓同志一起见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

按照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谆谆教导卢绪章同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白区工作的方针，做到社会化、职业化。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但要多交朋友，交各方面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参加社会上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使这个机构长期保存下去；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领导上又向卢绪章同志提出：要使广大华行成为党的第三线的工作机构，平时不用，但必须保持极端的秘密，一旦形势更加恶化，党的公开机构撤退，党的第一线和第二线遭到破坏，这个机构仍能保存下来，那时就要求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一九四二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内，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快，做了一些提供与调节党的经费的工作。

重庆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由周副主席亲自领导，并先后委派刘晓、孔原、刘少文、龚饮冰、严朴等同志进行具体领导。党对广大华行党组织一般是单线联系，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任何联系。在重庆期间，每隔一定时间，卢绪章同志去红岩村办事处汇报工作，听取指示，阅读文件。一九四三年，杨延修同志也去办事处阅读文件。一九四四年底，舒自清同志去美国前，会同张平同志去办事处阅读文件时，钱之光、刘少文同志曾设午宴为舒送行并作指示。一九四五年重庆国共谈判期间，卢绪章同志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一九四五年十月，卢回上海前，周副主席指示：广大华行迁往上海后，仍是中央的机构，委托刘晓同志领导，仍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一九四六年初，广大华行总管理处迁上海前，周副主席、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党的领导人，又

在重庆办事处亲切接见并慰问龚饮冰、王一知、张平、杨延修等同志，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与指示，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随着全国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广大华行有过两次转移。一九四五年秋由重庆转移到上海，一九四八年春又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在此期间，广大华行先后在昆明、成都、西安、贵阳、衡阳、桂林、兰州、汉口、天津、香港、广州、台湾、青岛、沈阳和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在印度加尔各答、英国伦敦、日本东京设立联络机构。上海地下党先后派往广大华行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有：卢绪章、吴雪之、杨延修、张平、舒自清、程恩树、张先成、李在耘、吕铁英、朱祖贤等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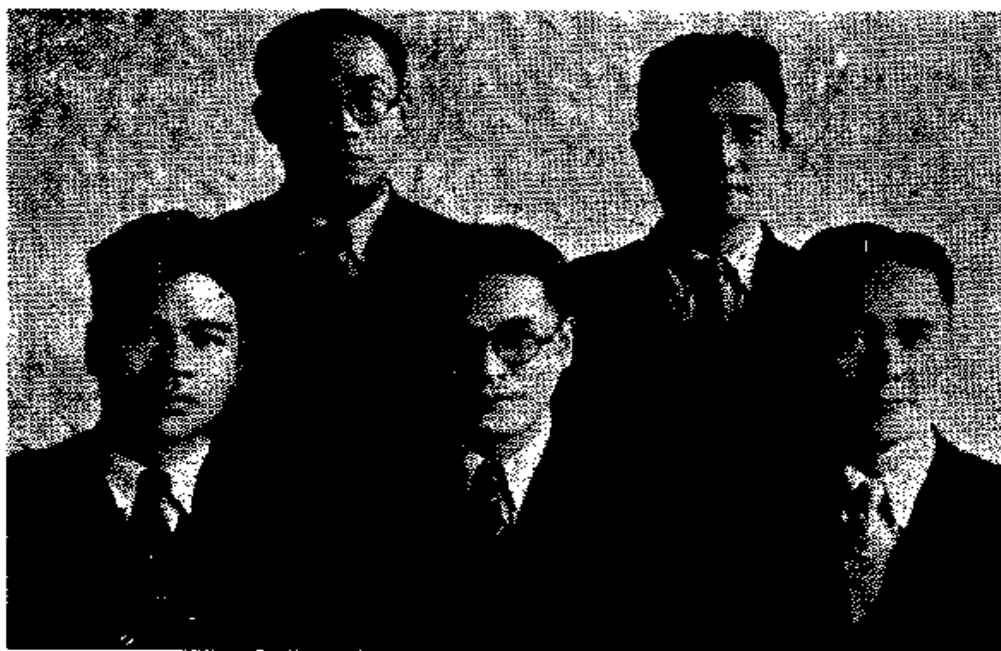
广大华行的党组织，在重庆，由卢绪章同志负责单线联系，转移到上海以后，由卢绪章、吴雪之同志任党支部正、副书记。卢绪章的公开身份是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雪之、杨延修、张平、舒自清同志为副总经理，杨、张、舒三同志还先后分别担任昆明、成都、重庆、上海、台湾、纽约等分行以及附设机构的经理。程恩树、张先成、李在耘、吕铁英、朱祖贤等同志分别担任衡阳、贵阳、汉口、天津分行经理、总行财务部经理以及附属机构的领导。

广大华行在党中央及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遵循党的方针、政策，克服重重困难，顶住多方面敌特的严密侦查，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解放全国的大业已成定局，党中央指示，结束广大华行，主要干部到解放区学习，准备南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密电香港：香港广大华行仍予保留并与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同志领导，广大华行

的党员干部除舒自清、张平同志留在香港工作外，其他同志都回来参加接管工作。总结近十年斗争，其主要战果是：掩护了几位党的领导干部，培养了党的一些经济贸易干部，发展了党的企业，扩大了资金积累，向党提供和调节了一些经费。

掩护体的由来

江苏省委于一九四〇年初选定广大华行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主要是：当时广大华行是一个私营企业，在上海已有多年历史，在昆明已有初步声望，在重庆已建立据点，同时，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同志在广大华行都有了相当的历史。



图五 一九三三年广大华行五位创始人，左起第一人为卢绪章同志

原广大华行，早在一九三三年成立于上海，是经营西药、医疗器械邮售业务的“皮包”公司，由田鸣皋、卢绪章、郑栋林、

杨延修、张平五个职业青年组成，全部资本定为当时币制三百元，先收一半，其中卢、杨、张投资共占百分之五十五。当时开设广大华行，主要是利用这个场所，团结一些要求进步的职业青年，共同学习进步书籍，探讨如何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程恩树以及田鸣皋、郑栋林等青年，都参加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的社会活动和抗日活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又随童子军团参加救护队的工作，因领队的童子军团副团长、国民党党员徐国治思想反动，生活腐化，企图把童子军团带到邪路上去，卢绪章等二十余人同徐进行斗争后，于一九三三年退出了童子军团，另行组织“兰社”，但因没有正确的领导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加以缺乏活动经费，建社不到一年就告结束，当田鸣皋发起组织广大华行时，卢、杨、张等就合伙入了股。

广大华行的邮售业务，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有一些基础，但在同年十月上海沦陷以后，这种业务无法经营下去，田鸣皋、郑栋林为求继续经商谋生，于一九三八年初去香港和昆明活动，不久即在昆明建立分行。卢绪章、程恩树、舒自清、杨延修、张平、张先成等同志，则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分别筹建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华联同乐会与保险业业余联谊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和党的工作。卢绪章同志任上海地下党职员工作委员会所属洋行工作委员会支部书记兼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舒自清、杨延修、张平同志都在华联同乐会党团小组过组织生活，程恩树、张先成同志分别任保险业工作委员会支部书记和委员。吴雪之同志早在一九三一年入团，转党后曾任上海地下党

职员工作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间，领导华联同乐会与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等职工群众组织的党支部和党团工作。

张平、程恩树、杨延修同志，分别于一九三八年底与一九三九年中，由上海地下党调往昆明等大后方工作。

为党的秘密机构奠基

一九四〇年春，党组织决定把广大华行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去国民党大后方执行党的任务。卢绪章同志在上海接受党安排的任务后，考虑到广大华行的领导权还未完全掌握在党员手中，田鸣皋还掌握广大华行实权，党有不能完全支配这个机构的可能，因此，组织了一个备用机构——年丰百货商行，以备万一。一九四〇年夏开办，张先成同志就在这个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

一九四〇年四月，张平同志已由昆明调任重庆分行经理，五月突接上海来电，嘱回沪开董事会，到上海后，卢绪章同志向张平传达了党关于以广大华行为掩护体，以重庆为中心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构的决定。同年七月，卢绪章同志到达重庆，接受周副主席的指示以后，又向杨延修、张平等同志传达周副主席的指示。同年十月，舒自清同志也由上海调来重庆广大华行工作。

为支持和配合卢绪章同志在大后方开展广大华行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初，应卢的要求，刘长胜同志派吴雪之同志进上海广大华行，对该行实行党的领导。一年后，卢已在重庆站住脚跟，吴即调离广大华行去协泰行工作。一九四一年冬，原广大华行总经理田鸣皋退出广大华行后，随即在重庆正式成立广大华行总管理

处，由卢绪章同志任总经理，同时结束了备用机构年丰百货商行。

卢绪章同志到重庆以后，为了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一面把昆明、重庆等地原有广大华行改建为党的机构，并在成都、西安、贵阳等地建立新据点，经营西药、医疗器械、运输等业务，一面广交朋友，吸收各方资金，合股建立企业或投资于其他企业。一九四〇年八、九月间，张平同志由上海返回重庆路过香港时，利用社会关系，在香港设立新中贸易行，由张任经理，该行于一九四二年并入广大华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对西方贸易中断，物价上涨，这时广大华行的业务有一定发展，也积累了一些资金。一九四二年，重庆广大华行向国民党政府登记的企业资金为法币二十万元，这笔资金是由几个党员和外界的新老股本加上历年的积累而凑成的。

一九四二年，杨延修同志利用昆明市长裴存藩，工商医药界著名人士姚蓬心等在昆明合办中和药房，由杨延修任经理，张军光任董事长，该药房于一九四四年并入广大华行。

广大华行虽然已在重庆、昆明、成都、贵阳、西安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业务也有了发展，但它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要求向更高一级发展。一九四三年，通过上海救国会旧友杨经才的关系，与民生轮船公司合作，组织了民安保险公司，代表民生轮船公司方面的董事有四川财界头面人物康心如、吴晋航、何北衡以及卢作孚、魏文翰、童少生等；代表广大华行方面的除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同志外，还有昆明资本家严燮成、周润苍、昆明市长裴存藩、秘书长刘志寰等。由卢作孚任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理，卢绪章原任助理后任总经理，程恩树同志任业务处长，主

持日常工作。这样，广大华行在大后方的地位提高了，经济活动的能力也增强了。在此期间，C.C.头子陈果夫组织一个特效药研究所，正在拉拢重庆药房的一些经理与医药界的负责人为该研究所理事，卢绪章同志也被聘为研究所理事。此时，卢绪章同志经常利用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的关系，借用国民党军事机构的名义，取得运输资财和人员往来的方便。施曾为卢搞到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名义，还介绍卢参加国民党为特别党员，领到的党员证上写的介绍人为吴开先（吴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其实卢当时并不认识他），以上这些，卢都事先向领导上请示并得到领导的批准。关于利用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国民党C.C.头子陈果夫等建立关系的问题。当时刘少文、龚饮冰同志曾向周副主席请示并得到同意。

从一九四三年起，广大华行还同苏联建立了贸易关系，为苏联山道宁（西药名）、鹿茸精的销售代理。此时，广大华行已进入初盛时期，在大后方已有了相当的地位，这一党的秘密工作机构从而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四年末，日寇向西南进攻，有进入川、云、贵之势，蒋介石政府有迁往西康或流亡印度之说，广大华行党组织向领导上建议并经同意，如果日军进入昆明、重庆，杨延修、程恩树同志分别留在原地，卢绪章同志跟随周副主席与蒋介石一起去西康或印度，张平同志去兰州。后日军在独山、都匀等地停止西进，因此，除张平同志去兰州外，其他同志均无变动。

打开对美国的贸易关系

一九四四年，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转入反攻，我国抗日战争

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胜利在望，估计大后方的作用将降低，政治经济重心将转到南京、上海，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广大华行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并经领导同意，决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于是把资金集中于总行，抽出三分之二的资金（二十万美元）派舒自清同志去美国打开国际贸易关系。

舒自清同志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正值德国法西斯投降，欧战结束，即在纽约设立分行，经过多方活动，终于同美国施贵宝药厂建立西药及其原料在中国的销售总代理关系，并陆续打开进口化工、钢铁、五金和出口桐油、肠衣等业务，发展很快。对美国贸易关系的展开，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内贸易特别是施贵宝西药经销业务的发展。

总行转移上海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汇集上海，欧美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卷土重来，上海成为国民党财经金融的中心。一九四五年底，广大华行总行转移到上海，一九四六年在上海设立广大药房，由杨延修同志兼任经理，同年在民安保险公司下成立民益运输公司，由王应麒同志任经理，童少生任董事长。一九四四年底在重庆筹办的民孚企业公司，一九四六年初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个企业与广大华行实际上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企业资金除由广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公司投资外，并吸收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官僚和资本家的投资。民孚企业公司成立后，由美国进口的化工、钢铁、五金和向美国出口的桐油、肠衣等业务都由它经营。民孚企业公司的总理由卢绪章同志担任，副总经理由吴雪之、李在耘同志担任，卢作孚为董事长。

广大华行总行迁到上海后，刘晓同志受党中央、周副主席委托，领导广大华行工作，吴雪之同志调回广大华行协助卢绪章同志主持全面工作。从这时起，广大华行逐渐进入旺盛时期，名声越来越大。树大招风，没有一个“靠山”，是不可能持久的。广大华行党支部经请示刘晓、刘少文、龚饮冰同志同意，并报请党中央、周副主席同意批准，同C.C.头子陈果夫等合办中心制药厂，于一九四七年初筹备，一九四八年四月正式成立，由卢绪章同志任总经理，陈果夫为董事长。一九四八年初，又在台湾与C.C.系合办七星纱管厂，由张平同志兼任经理、厂长，施公猛为董事长，吴开先等为常务董事。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八年，广大华行为发展业务、积累资金以及“交朋友”、应付各方面关系，向其它企业投资的已有数十家，其中有银行、钱庄、药厂、药房、轮船公司、造纸厂、钢铁厂、仪器厂、食品公司、化工原料公司等。这些企业，有的在解放前后已经结束，投资已经收回，有的已由我政府接管，有的已经倒闭。

广大华行的业务发展越快，就越需要有足够的周转资金，否则，一旦周转不灵，签发的支票不能兑现，企业就有破产的危险。这种险情，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发生得更为频繁。一九四七年，蒋介石政府在军事、政治方面接连打了大败仗，后方经济空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采取各种手段搜括民脂民膏，造成通货恶性膨胀，市场极端混乱，许多民族工商业相继破产。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广大华行为支付到期进口结汇和巨额业务费用，资金不敷，周转困难，银行信贷一度高达一百多万美元，加上天天付高额法币利息，处于危机之中。每一次

危机，都是由于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多方调动资金，才使签出去的每一张支票都能得到兑现，从而排除了险情，业务得到顺利进行。从那时起，广大华行已成为一个有实力地位和在国内外有良好信誉的企业。

总行南移香港

经历一九四七年上海财经金融的动乱，看到上海一般的工商企业都难以经营下去，估计解放战争可能还要打一些时候，为了保全企业，上海分局刘晓同志决定把广大华行业务重点南移香港。卢绪章同志于一九四七年秋亲自去香港作准备，在香港筹设南洋商业银行与广业房地产公司等（南洋商业银行于一九四九年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广业房地产公司于一九四九年结束）。总行的大部分资金于一九四八年转到香港。卢绪章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心药厂开幕后去香港。同年六月，突接刘晓同志通知，过去在重庆和上海办事处工作与广大华行有联系的邵平在浙江与其妻一起被捕，而且邵妻已经叛变，经党组织决定，广大华行全部党员干部和资金迅速转移到香港。七月初，杨延修同志奉命去台湾向张平同志面告这个消息并一起去香港。吴雪之、张先成、程恩树、李在耘、吕铁英等同志也于下半年先后到达香港，上级领导龚饮冰、刘晓同志也先后转到香港。

实践证明，这次转移是及时的、正确的。

广大华行转移到香港以后，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一九四八年秋冬，广大华行党组织设想过两个方案：一是保存这个机构，向海外发展，作长期打算，全国解放后在海外隐蔽下来；二是结束这个机构，全部党员去解放区，迎接全国解

放。经刘晓同志请示中央，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除香港外，广大华行所有国内外机构，一律结束。广大华行党支部坚决执行了这个决定。一九四八年底在香港进行清理，外股（包括非党员职工红利入股的股款），经过估算一律发还入股者本人，共计发还约四十万美元。卢绪章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底随同龚饮冰、王一知同志等去西柏坡党中央学习，不久转华东局机关随军南下。吴雪之、程恩树、李在耘同志按照刘晓同志指示，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先后由香港返回上海，做接管官僚资本企业的准备工作，其他同志经天津随军南下，回上海做接管工作。同年三月，按照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电示，香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舒自清、张平同志留港工作。

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为了完成党交给的掩护党的领导干部的任务，广大华行想方设法地打通国民党航空、水陆运输及有关关卡检查机关的关系，先后妥善地掩护刘长胜同志往返于沦陷区和大后方之间，掩护马纯古同志在昆明、重庆等地活动，并为龚饮冰等同志及时购得飞机票、车船票，使他们能够安全在各地进行活动。另外，刘宁一同志为有一个社会职业作掩护，一九四〇、四一年间曾在上海广大华行就业；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八年间，重庆办事处个别同志也曾在重庆和上海广大华行就业作为掩护。

为解决党在财经方面的某些急需，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广大华行曾多次向党提供和调节一些经费。到一九四九年为止，向党提供较大资金共五次，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按照领导指示，提供八万五千元法币给韶关地下党，由卢绪章同志亲自送

交，一九四八至四九年，吴雪之同志先后两次在香港交刘晓同志转给港澳工委许衍新（方方同志）十五万美元、给钱瑛同志领导的湖北和西南地区党的经费二十万元港币；一九四九年初，由张平同志送交刘晓同志美金现钞一百万元，支援东南亚某兄弟党；香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时，上交资金约为二百万美元。

广大华行的资金，在初建时，大部分由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同志自己凑集，也陆续吸收了外界的投资。一九四四年，广大华行的资金达到三十万美元时，卢绪章同志向刘少文同志提出，卢、杨、张、舒等党员的股金全部上交，经刘请示周副主席决定，党员的股金划出百分之三十为党费。一九四九年七月，张平同志由香港回上海联系工作时，在一次有钱之光、卢绪章、吴雪之、杨延修、张平、程恩树、李在耘、吕铁英等同志参加的会上商定，并经刘晓同志同意，党员的股金全部上交给党，为补贴这些同志的家庭开支，分别给予有关同志五千、一万港元。

深刻的体会

广大华行在蒋管区长期斗争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制定的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证明周副主席对广大华行一系列指示是十分英明、正确的。严格遵循党的教导，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一系列指示，团结一致，努力作战，是使党的任务得以胜利完成的根本保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这一段经历，这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宝贵的教育。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以下几点深刻的体会。

一、党的方针政策和一系列指示是胜利完成任务的根本
党中央决定把广大华行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时，周副主

席明确指出，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不与左派人物往来，要多交各方面的朋友，以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这些指示，深深地印入广大华行同志们的心中。实践证明，这是使广大华行的业务不断发展，使党的机构和党的干部在敌特严密侦查下安然成长的根本。广大华行党组织坚决遵循周副主席指示，要求党员坚持社会化、职业化，通过业务和交朋友的活动，同各地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建立了广泛联系，利用这些关系，取得了掩护党的机构与干部、调节资金、开展国内外贸易和交通运输的方便，顶住了敌特侦查，巧妙地保存了自己。这方面事例是很多的。例如，为应重庆办事处调节经费的急需，把巨额现款及时送到刘少文、龚饮冰等同志手中，利用国民党中央银行×××等关系，使广大华行签发的信用支票，能够从中央银行领取现款。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六年，利用飞行电报员顾乐邨、盛棣华，并通过他们拉上机长、站长、电台台长等关系，用飞机运送西药、医疗器械及黄金、美钞、伪法币来往于香港、重庆、昆明、成都、桂林、上海等地，还利用他们的电台给广大华行分支机构传递金融与商品行情等。为适应党的工作的需要，在此期间，张平、张先成同志分别在成都、汉口参加过国际扶轮社，张平同志在兰州参加过国际联青社并被选为副社长，利用施公猛等关系，张平、杨延修等同志还分别取得国民党上校参谋等军衔。这对掩护自己，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及时订购飞机票、汽车票，安全地在各地进行活动，都起到相当作用。舒自清同志就是利用蒋介石妻弟、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生产促进会”的明义去美国的。利用敌特关系以保存自己的事例也不少。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广大华行党组织多次发现蒋介石

政府对广大华行及党员有怀疑，策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敌特分子进行侦查，例如，一九四七年初，杨延修同志得知，上海某警察分局副局长章师按照上级密令，对广大华行进行侦查，接着上海警察总局稽查处电话找卢绪章同志去谈话，说卢经常去苏联领事馆，是共产党，卢镇定自若，严肃地回答：去的不是苏联领事馆，而是苏联商务代表处，广大华行是苏联山道宁、鹿茸精、白报纸的中国总代理，早在重庆就已开始，是贸易委员会沈××和张××介绍的，怎能说是共产党呢？卢还说，如要了解，可向陈果夫、卢作孚等人了解，我和广大华行同他们有事业上的联系。对方无话可说。过后不久，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军统特务符志清到广大华行找张平同志，说广大华行内有共产党，汉口军统机关也派人到张先成同志的住宅进行搜查，抓走汉口广大药房业务主任郑鹤山，上海警察分局长严少白找杨延修同志去严家谈话，出示南京国防部二厅密令原件，说卢绪章去东北进行贸易有资助共产党的嫌疑等等，在敌特多次严密侦查中，广大华行党组织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取得刘晓等同志的指示，认为这些都不是出于内部原因，敌人并没有掌握任何政治方面实质性的材料，而我们可以利用陈果夫、卢作孚以及军统、中统的关系去顶住，因此，对所有这些侦查，经分别利用施公猛、梁若节、严少白以及上海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社会局等敌特关系，特别以敌特的头号人物为挡箭牌，沉着应战，有的给了一些钱而销案，顺利地顶了过去。

二、加强党性锻炼，自觉执行政策，是胜利完成任务的重要条件

广大华行党的干部，对于党的方针、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充分理解，而是在周副主席、刘晓、孔原、刘少文、龚饮冰等同

志的热情关怀和谆谆教导下，通过实践不断加深理解，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分散在各地的党员，平时既不能与地方党往来，又很少看到党的文件，而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作战，认真作到一心为着党，遇到任何困难，想方设法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失，党的机构不受破坏。在敌人严密侦查面前，作到不畏强暴，沉着应战，机智地克敌取胜。在花花世界中，作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在业务经营中，做什么学什么，作到兢兢业业，在动乱中求发展，在费用开支包括“应酬”、“交朋友”等开支方面，坚持该花的花，该少花的少花，不该花的不花，作到花小钱，吊大鱼，保存而壮大自己。同时，对自己严格要求，不借公济私，不营私舞弊。总之，胜利完成任务，自觉执行政策，是与领导同志的亲切教导分不开的。

三、党组织的坚强团结，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在机构分散、身处白区、肩负特殊任务的情况下，广大华行党组织不可能有正常的组织生活会，在重庆、上海，党员往往借用一年一度的董事会和汇报工作的机会，在一起学习、听传达、研究工作。虽然如此，广大华行党组织一开始就结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整个组织形成一个拳头，上级的指示，党的决定，就是作战命令，无不全力以赴。

党组织的坚强团结也是带领职工协力作战的重要条件。广大华行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面目对非党职工是绝对保密的，并按党的指示，任何时候不吸收新党员。为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从各方面关心职工，工作上大胆使用他们，生活上热情照顾他们，切实执行年终分红制度，对企业的骨干和工作较久的职工，年终

分红大部分是分给广大华行的股票，使他们成为企业的股东，这样，把企业的整体利益和职工的个人利益密切结合起来，增强了职工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而企业的实权又始终掌握在党员手中。

四、加强调查研究，积极钻研业务，也是胜利完成任务的重要条件

广大华行的党员，原来都是职业青年，仅有一点商业常识，做大生意，管理企业，搞国际贸易，都是缺乏经验的。但当时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不及时调查研究，掌握情况，熟悉业务，采取对策，是难以取胜的。在党的领导下，同志们抓住形势发展的每一转变，认真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动向，积极钻研业务，提高经营水平与管理才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由不精通业务逐渐变为善于经营国内外贸易的共产党员，从而克服困难，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五、机构应力求精简，党的干部必须严格执行不发生任何“横”的关系，必须彻底摆脱其它进步活动

广大华行有一定的分支机构和附属企业是必要的，但机构和投资过于分散、庞大，这种情况，一旦政治形势发生突然变化，要求收缩而又可能处于“尾大不掉”的局面、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

党的干部不与地方党发生任何“横”的关系，不参与社会上进步活动，这是党组织一再强调的。但在这方面，执行得还不很彻底，广大华行的党组织和党员虽然没有因此受到破坏、打击，但曾发生过一些险情。比如，一九四八年，广大华行的党的干部曾经错误地介绍上海地下党的一个去大别山工作的干部，介绍他路过汉口时去汉口广大分行，这个党员由汉口去大别山的路上被

捕，后来经过斗争、营救而脱险；又如，在一九四六年，上海地下党介绍十名党员来广大华行工作，但他们的组织关系仍在地方而未转来，并在党的外围团体进行活动，后来其中一名党员因在社会上进行活动遭敌特注意，敌特来广大药房捕他，幸亏这个同志比较机警临时脱身，也未波及广大华行的其他党员。这些，都应引为深刻的教训。

广大华行的战斗，距今已有三、四十年，回忆往事，更加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怀念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党中央、周副主席直接领导的党的秘密工作机构污蔑为国民党特务机构，列为“专案”、“要案”，把广大华行党的干部诬蔑为特务、反革命、“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这个罪恶阴谋已被彻底揭穿，真相已经大白。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充当特务、反革命、“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四人帮”他们自己。

三十多年前的战斗，至今已成为历史。在目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重温这一段经历，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将激励我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阔步前进。

（以上史实由吴雪之、卢绪章、杨延修、张平、舒自清、张先成等同志回忆整理，张美祥同志执笔，并经刘晓、孔原同志核阅）

赤水两岸

周 彬

（全国政协委员）

“四渡赤水出奇兵，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激昂高亢的歌声，使我回忆起当年红军在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辗转千里，四渡赤水的生动场面，激起我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怀念。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进行战略性的转移，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在这年的八、九、十三个月中，“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虽然提出了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的问题，但却在指挥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上犯了严重错误。他们一方面作开始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另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这种矛盾的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领导者在战略转变关头中惊慌失措的表现，他们不向指战员作政治动员，使得很多同志对长征的意义和进军的目标不明确，再加上庞大的后方机关和大批辎重，行动非常迟缓。因而，在长征开始的头几个月中，红军处处被动，不能主动地打击敌人。这

样，红军虽然冲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部队从开始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三万多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我军渡过湘江后，错误路线的领导者仍然主张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湖南会合。在此，蒋介石调派了五六倍于我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一线堵拦。同时，命令广西向龙胜、西延一线追击我军。敌薛岳、周浑元部也在后面追击我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集中在兴安、灌阳一带，敌中央军和湖南何键部沿湘江一线布防。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情，主张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鼓舞全军的士气，使部队得到短时间的休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了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在十月间占领了湘南的通道县城后，便一举攻克了贵州的黎平。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改向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红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打败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侯之担部，胜利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拱、镇远、施秉、余庆、黄平、褰安等县城。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红军强渡乌江，分两路攻占了遵义。

我军进到贵州后，蒋介石又调集桂、滇、湘、黔、川的军阀对我形成合围，妄图把我军全部消灭在川黔边地区。这时的红军处在危险时刻，中国革命也处在危险时刻。在这紧要关头，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统治。这次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面临最大问题是，如何摆脱四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保持革命力量，就没

有以后革命的胜利和发展。为了改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红军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老一辈革命家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一个起着决定性的战役。在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高度发挥出打运动仗的特长。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就声东击西，穿插迂回，弄得蒋介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军却四渡赤水，甩开了敌军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长征北上的战略部署，使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计划彻底破产。

红军四渡赤水，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一次出色的实践。

一 渡 赤 水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我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十三团驻在遵义南面的懒板凳。当我们一听到遵义会议的消息，知道毛泽东同志又来领导红军了，大家心里那种忧虑不满的情绪都被一扫而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红十三团是一个具有敢同敌人打硬仗，能攻能守，英勇作战的精神和光荣的战斗传统的团队，它的前身于一九二七年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一九三二年夏到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五师合并为十三团。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高虎脑战斗中，红十三团的指战员，英勇顽强打退了陈诚四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无数次疯狂进攻，敌人伤亡惨重。

红军在遵义会议后进行了休整，甩掉了笨重的辎重，精简了机关，充实了连队。同时，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部队明确了行动的目的和任务。这样，使我军能灵活机动地行动，能打

能走，最充分地发挥出打运动仗的特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和二十日，我军驻在遵义、桐梓、松坎的部队，分别向赤水、习水、仁怀方向前进。准备渡过赤水，再北上渡长江与川陕地区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时，四川军阀刘湘部潘文华（南岸“剿匪”总指挥）率八个旅向黔川边的习水、赤水推进。敌章安平旅的三个团在赤水县城，下迄泸州、江津一带修筑碉堡工事。敌林秀生旅和侯汉佑先后赶到土城、元厚一线。侯之担部集中于温水镇和赤水。伪川军教导师郭勋祺的一个旅由綦江经石壕向温水赶来，其先锋部队已到煤溪河一带。另外，敌郭勋祺师的一个团由良村沿公路向九崖坝赶来，他的另两个团布置在良村通往吼滩的煤台和响洞子一线。敌人在九崖坝到响洞子长五里的大山上布满了兵力。

我军为了保证由吼滩来的大部队能顺利前进，决定在煤溪河给敌人来一个迎头痛击。敌人也想在此侧袭我军，可我军已先在火石埡、沙湾、煤溪一线的高地上作好了战斗准备。双方交战不到两个小时，敌人就伤亡过半，溃退而去。我军乘胜追击，迅速进占东皇殿。然后，我军一部沿大平、长嵌向官渡前进，出合江以包围赤水。大部队向赤水的土城进攻。

经过一场激战，我军很快占领了土城。随即，我军大部分走金沙场和旺隆场，一部分沿河下到元厚场、炳滩旺和复兴场。敌章安平旅的三个团从赤水向土城而来，他的前卫一团在复兴场一带与我军遭遇。我军第三团当即给敌人以猛烈的冲击。由于敌人先一步赶到占领了有利地形。我军则以全力夺取了右翼高地，把敌人压下去了。可是，左翼的敌人占在一个起伏不平的葫芦形口袋式的高地上，他们用猛烈的火力向我军阵地打来。我军十余

次肉搏冲锋，都没有打过去，只好据守山头，与敌相持。但相持的局面，对我军很不利。我军一面从正面向敌人发起猛攻，一面从敌人左后方的凤凰嘴包抄过去。我军的巧妙出击，一下子就击溃了敌人的二个团。敌人伤亡惨重，吓得畏缩不前，只得加修工事，死守阵地。在这同时，敌达风岗旅向我军的鸡公场、黄陂洞高地猛攻，伪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兼程北上，敌郭勋祺师在二十六日赶到了土城，敌潘佐旅的三个团在二十七日进到遵义，敌廖泽三个旅九个团在二十八日也进到土城。敌人的援兵接踵而至，我军又处在葫芦形的隘口中，再加上大量的敌人已在土城一线构成防守工事。看来，我军原定的先消灭郭勋祺师，再占赤水的计划已为敌所阻，战斗又不能速决，军委命令我军撤出战斗。红十三团的任务是包围土城的郭勋祺部，掩护全军撤退。在这次战斗中，我军没有消灭郭勋祺师，就很快撤退了。

我军来到赤水河畔，只见二、三百米宽的河床，水流湍急，惊涛拍岸。我军前是赤水激流，后是敌军重重。红色战士争分夺秒抢架浮桥。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军全部渡过赤水，进入川南地区。当我军摆出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架势，蒋介石就象没头的苍蝇乱了手脚，亲自到重庆坐阵，急令湘、黔、川、桂、滇的军阀倾巢出动。四川军阀刘湘更是害怕我军北渡长江，赶忙在川黔边境布置了七个师八个旅四十六个团的兵力，还加上郭勋祺的六个旅，严密封锁了长江口岸。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从东面围截，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从遵义尾追，云南军阀龙云的三个旅从毕节赶来，广西军阀白崇禧的部队已到贵州的东南面。敌军共用四百一十六个团，四十万兵力，对我军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妄图把我军歼灭在川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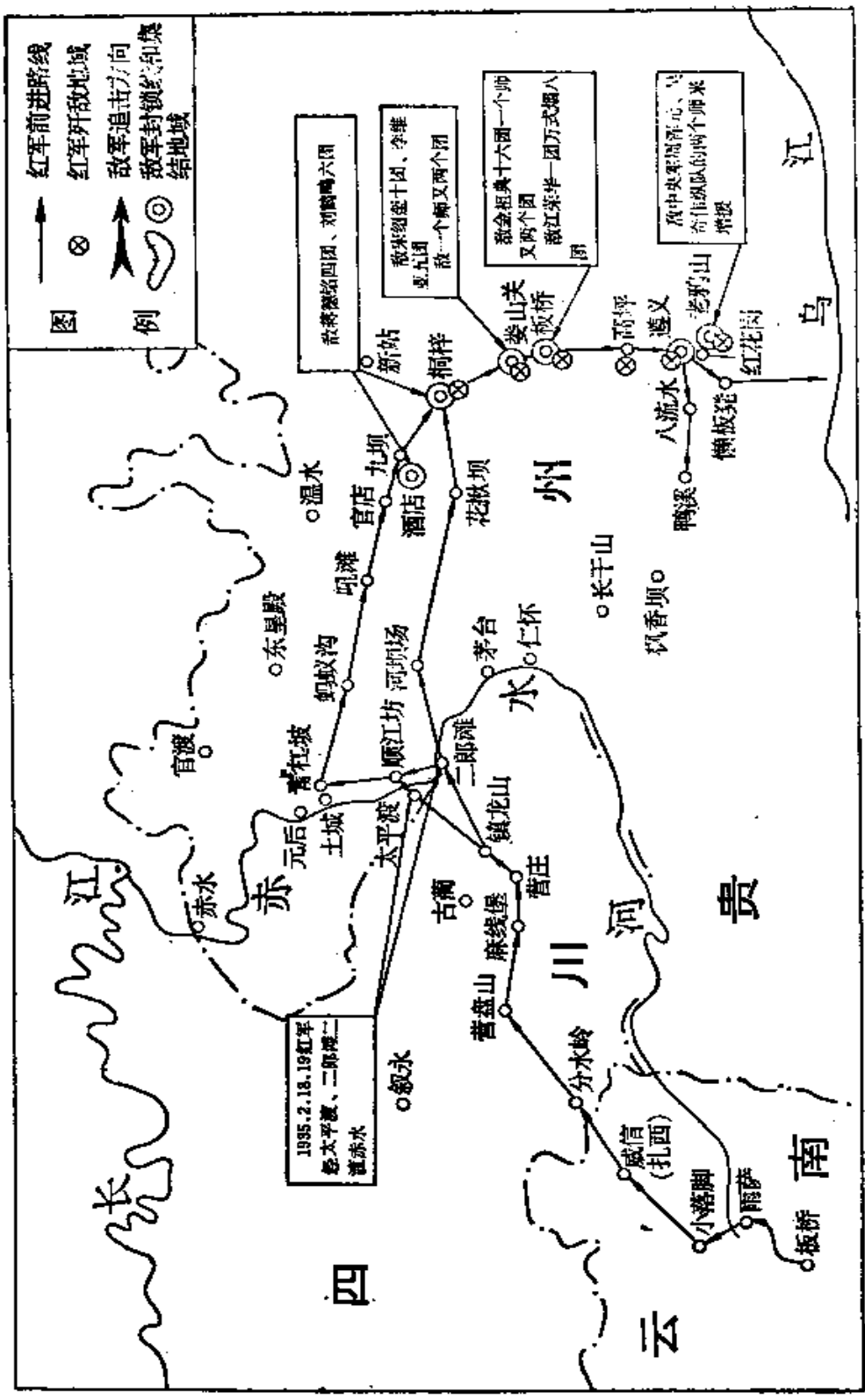
敌情发生了变化，北渡长江对我军极为不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决定暂缓北渡长江，在旧历正月初三，我军由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滇东北的扎西地区集结，待机破敌。红军在此进行了整编，红三军团由原来的三个师缩编成四个团，干部逐级下放，师到团、团到营、营到连，加强基层领导。我军还在这一带地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及其他物资，使我军声威大振。红三军团的每个团就扩大了五、六百名青年参军，为下一个战斗行动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 渡 赤 水

在我军进到扎西后，蒋介石就把重兵往川南调动，贵州境内敌人的力量空虚了。当时，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出敌不意，回师东进，重入贵州，把敌重兵抛在长江两岸。我军在入黔后，要先消灭王家烈在桐梓、娄山、遵义一线的八个团。估计，在战斗打响后，蒋介石要调派部队增援。果然，蒋介石派吴奇伟、周浑元部赶来增援，我军要再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的这支有生力量。正如毛主席所说，敌人就象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

为此，军委和三军团首长命令十二团和十三团为前卫团。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我军二渡赤水，随即向桐梓、娄山、遵义方向前进。我军事前得到情报，敌人企图在二郎滩阻击我军渡河。情况紧急，渡河工具仅有三条小船，每条船只能载三十个人，两岸又尽是高山。我红十三团三营先渡过河，抢占了有利地形。这时，对岸传来了枪声，我地方游击队同来阻击我军的敌一个团接触上了。三营的红色战士立即迎敌出战，三步并成二步地

红军二渡赤水河水示意图



登上山去，同敌人展开战斗。据守在工事里的敌人，与我军还隔着两个山头，看见我军打过来了，吓得掉头就跑。我红色战士奋勇追击，敌人跌死摔伤的遍地皆是，敌人的枪枝弹药衣物都成了我军的胜利品了。后据俘虏说，他们是侯之担的两个团，是个副师长带他们来的。二郎滩战斗一结束，担任前卫的红十三团便急行军，经回龙场、花揪坝、石门坎等地，直抵桐梓。

在我军向桐梓前进时，贵州军阀王家烈亲自到遵义督战。他命令原守桐梓城的第四团蒋德铭部，向酒店一线防守，命令第六团刘鹤鸣部守桐梓，第十团的宋绍奎部守娄山关，第十六团金祖典部守板桥。

二十五日，我红十三团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击溃桐梓城的守敌，占领了桐梓城，残敌向松坎方向逃走。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十三团担任攻打娄山关，夺取遵义的前卫团。红十三团的团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同志向全体红色战士传达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红十三团向娄山关开进。红色战士一路上精神饱满，飞奔向前。有的说：“过去那个陈诚都不在话下，王家烈又算老几？”有的说：“大烟鬼子碰脚踏嘛！”大家边说边笑，回忆起在中央苏区英勇顽强的战斗历程，兴奋地说：“冲垮了四道封锁线，突破了乌江，还过不了一个娄山关？我们飞也要飞过去。”有的还风趣地说：“捉到王家烈，我要缴他三支枪（水烟枪、鸦片烟枪、步枪）。”同志们还提出“多捉俘虏，多缴枪，立功的机会到了”等有力的口号。红色战士你一言，我一语，洋溢着战斗豪情，显示出我军必胜的信念。

在离娄山关十余里的地方，遇到从娄山关方向来的几个老

乡，我们问：“娄山关有没有王家兵？”老乡说：“有！从遵义到板桥都住满了。听说还有一个师长。”彭、张首长了解到这个情况，估计要在娄山关的外围与敌遭遇。当即命令三营担任前卫，七连为前卫连。下达战斗任务后，部队急速前进。

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之中，是桐梓通向遵义的必经关口。当地的群众说：“桐梓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大门易进，二门难开。”情形确实如此，周围的山峰如剑，直插云霄，远远望去，山穿云，云盖山，奇险而壮观。山是险山，关是险关，两侧的山峰夹着一条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起伏不平的公路，大有“一夫当道，万夫莫开”之势。娄山关上只有两间茅草房，一块石碑，石碑上刻有“娄山关”三个大字。敌人王家烈的一个师又两个团守在娄山关。把守关口的敌人是王家烈的钢铁第十团宋绍奎部。另外守在娄山的金祖典部和守在板桥的敌一个师部又两个团是遥相呼应的。从整个情况来看，我军要突破娄山关，不是轻而易举的。

我军进抵娄山关，首先和敌第六团刘鹤鸣部遭遇。敌人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赶忙退回娄山关两侧的工事里，用火力的封锁了马路和左翼的山口。关口被封锁，山高又无路，但有些地方仍可攀壁上爬。我军由左翼巧妙迂回到敌人的右翼后面，包抄敌人出其不意，占领制高点——点金山。

点金山，高大尖陡，难以攀登，但它是我军在娄山关取胜的一个必争的制高点。于是，我军先派三营七连顽强而机动地迂回到娄山关守敌的左侧背后全力夺取点金山。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七连的战士迅速钻到敌人的左侧翼，发出冲锋信号。我红色战士突然以猛虎下山之势，向敌人的阵地冲杀过去，敌人前后

受击，招架不住，便纷纷倒下，死伤成堆。我军很快占领了制高点——点金山。

登上点金山顶，可纵观娄山全景。俯视娄山关，只见敌人东一堆，西一堆的在各个要点修筑工事。敌人依险守固，看来，敌人还要反夺点金山。果然不出我军所料，王家烈急派他的最精锐的策五团李维亚部来反夺点金山。敌人凭着优良的装备，强大的火力，用集团似的冲锋，向我红十三团一营的前沿阵地猛烈攻击，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敌人冲上来被我一营打下去了。敌人又冲上来同我军展开了白刃战。红十三团的彭、张首长急令三营增援上去。一营见三营赶来增援，更加增添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力量。我三营七连的红色战士一进阵地就象雄狮一样，刀枪并举地同敌人反复冲杀六次。正是阴历正月寒风刺骨的日子，但战士们英勇作战，汗透戎装，打得敌人失魂逃命。我军紧咬着敌人的脚后跟追杀，敌人成了我军的刀下鬼，躺下了一大片，血如水流，敌人的一个精锐团被我军全部打垮了。战斗结束后，我们从俘虏的口中得知，单王家烈部的刘鹤鸣团就伤亡五、六百人。

从战役的发展来看，要消灭顽敌，必须从侧翼包围娄山关和板桥的守敌，而第一步必须先歼灭板桥守敌，孤立娄山关之敌。于是军团首长命令十二团接替十三团，令十三团的一营和三营与红十团配合，消灭在板桥的守敌金祖典部。

我红十团和红十三团分别从左右两侧迂回，切断了娄山关和板桥敌人的退路及遵义来增援敌人的来路。敌人处于我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王家烈闻讯后，急忙把他最精锐的第一团江荣华部和第八团万式烟部调到板桥一带阻击。我军追敌到泗渡站、高坪时，便与敌一、八两个团相遇交战。我红十团迅速从右侧，红

十三团从左侧分两路包抄过去，把敌人打垮，敌旅长杜少华和敌团长江荣华均负重伤，残敌向遵义逃去。

板桥的敌人被消灭后，我红十二团的英雄们开始向娄山关守敌进攻。敌人见我军来势凶猛，无可阻挡，又处在挡不住，退不走的境地，只好象鸭子下山似的，呼哈哈滚下山，敌人是各取捷径，各自逃命。我军则分路出击，狠追猛打敌人，敌人死伤无数，其余都作了俘虏，整个守关之敌，全被我军歼灭，我军占领了娄山关。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两夜，翻了两座大山，两天只吃了两顿饭，但战斗的豪情使大家忘了疲劳不知饿，痛痛快快地打了个漂亮仗，把王家烈的残部一直追到遵义城，为我占领遵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义分新城和旧城，我军只用二、三个小时，就消灭了新城守敌刘鹤鸣团的全部，占领了新城。在新城与旧城之间隔条小河，旧城守敌第五团李维亚部把桥切断了，死闭城门，继续顽抗。军委和军团首长决定当晚攻城，让十二团，十三团各派一个营担任主攻的突击队。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带领营团干部在河岸的小土堆里观察地形，选择攻城突破口。突然，敌人向这里开枪，邓萍同志不幸中弹牺牲。邓萍是湖南平江人，参加过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是一位作战勇敢，能沉着思考问题的优秀指挥员。他的牺牲，使我军失去了一位好指挥员。全体指战员发誓要为邓萍同志报仇，将敌人彻底消灭。

黄昏时，担任主攻的红十三团三营接近城下。那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红色战士乘着夜色很快攻上城去。敌人不知我军到底有多少部队，不敢作大的抵抗。战斗了两小时，我军全歼守城之敌，遵义城又一次被我军全部占领了。

在我军进占遵义的同时，蒋介石急调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在两天内赶到遵义。军委指示部队准备打周浑元、吴奇伟。红色战士听到要打周浑元、吴奇伟的消息，就象听到喜讯一样，几天几夜作战的疲劳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飞走了。同志们一边擦枪，一边笑着说：“吴奇伟这小子给我们送好枪来啦！”“我们要给这小子点厉害瞧瞧。”这时，中央干部团和红一军团也赶到遵义。二十八日晨，中央军委命令一、三军团各派一个团，分两路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敌人。军委在命令中规定：途中遇敌后，即采取宽大正面的运动防御战术节节抗击、消耗、疲劳敌人。待把敌人引到遵义城外时，两个团并肩修筑工事，抓住敌人不放，以利我一、三军团从左、右两翼突击歼灭敌人。红色战士听到命令后，立即分四路纵队前进。

红三军团首长命令红十团迅速占领遵义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并要坚守老鸦山。红一军团的第三团向懒板凳方向迎击敌人。红三军团的第十一团向鸭溪方向迎击敌人。红十一团出发不久，就得到消息，敌人来了两个师，红三团已同敌人接触上了。我红十一团立即离开马路，向鸭溪的大路急进，到达红花岗的左侧，占领了主要阵地。敌人仗着优势兵力，向红十一团阵地猛扑，企图夺取红十一团的全部高地，进而夺取老鸦山，以最后达到夺取遵义的目的，但数次进攻都被红十一团打下去了。当敌人以更猛烈的炮火向红十一团三营阵地攻击时，红十一团二营的全体战士从敌人侧翼包抄过去，配合三营作战，狠狠地回击了敌人。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但敌人是不甘心的，在他们的后续部队赶到的时候，又向我军反扑过来。

王家烈把进攻的兵力从一个多团增加到三个多团，用步兵攻

不动，就用火炮轰，在侧面攻不动，就转到正面攻。进攻一次比一次凶狠，战斗也越来越紧张。敌人用集团冲锋，我军则采用近战歼敌，又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冲锋。

在这同时，吴奇伟命令唐云山师从蓝家堡、羊角脑向红花岗侧面红十团老鸦山的阵地进攻，王家烈的第八团万式烟、十团宋绍奎向红花岗的正面攻击，头两次进攻都失败了。于是，敌人象发疯似地用火炮向我阵地狂轰滥炸，步兵也蜂拥而上，但我红色战士沉着而战，只要敌人一攻到前沿阵地，就用猛烈的火力，把敌人打下去，敌人的援兵不断开来，进攻也越来越猛。我军在弹药不多的情况下，战士们就举起石头，向进攻的敌人狠狠砸去。滚滚而下的石头砸得敌人抱头鼠窜，焦头烂额，敌人还是攻不上来。我红十团从上午坚持到下午三、四点钟。敌人见红十团仍然控制着老鸦山的主峰又用猛烈地炮火打得山石乱飞、树木折断，炮声、枪声、手榴弹声和冲杀声连成一片，从遵义到贵阳的公路两侧二、三十里的地方都是一片战火。下午，敌人把主攻方向转向坚守老鸦山的红十团的正面，他们恶狼似的进行反扑，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我们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红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同志亲自率领战士们战斗在老鸦山的主峰上，他在向敌人投手榴弹时，壮烈牺牲了。钟伟剑同志是位优秀的青年指挥员，他的牺牲，使大家的心情很沉痛，也更加激发了战士们与敌血战到底的决心。激战到下午三点多钟，敌人占领了老鸦山。在红花岗、老鸦山，敌人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王家烈的四个团的兵力。这样，敌人不但居高临下地威胁我们，更重要的是威胁着遵义的安全。

军委命令红十三团、十二团和中央干部团急速转向红花岗、

老鸦山，红十二团和十三团从两侧向敌人猛烈攻击，干部团从正面向敌人攻击。红十团见我军主力来了，就立即和主力配合，对敌人来个两面夹击，全歼了这批敌人，我军的红旗又插上了老鸦山的主峰。

太阳还未下山，我军就展开了全线反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两三个小时，敌人就全线崩溃了，其主力被我歼灭于遵义城外一带，其余残敌分两路逃跑。吴奇伟本人则带着两个团的残兵败将，经懒板凳向乌江方向逃命。当我红一军团追到乌江时，吴奇伟不等败兵全部过江，就下令砍断乌江浮桥，把一千多名败兵甩在乌江北岸，全成了我军的俘虏。

这次，我军在遵义地区打了个痛快仗、漂亮仗，消灭了吴奇伟两个师的大部和王家烈的八个团，加上娄山关战斗，共歼敌二十个团，缴获敌军的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资不计其数，红军部队也换上了好的武器装备。战士们喜气洋洋地说：“还是打中央军过瘾，有好枪。吴奇伟这小子送来的礼物，我们全收下！”

三 渡 赤 水

我军在遵义地区一连串的胜利捷报震撼人心，震破敌胆，迫使敌人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轻举妄动了。为了在运动中歼灭围追堵截之敌，我军突然于三月十一日西进，在茅台一带三渡赤水。

三月十一日，我军经八流水、鸭溪、枫香坝、长干山分两路向仁怀、茅台进军。敌周浑元的第五师和第九十九师在鲁班场构筑了堡垒封锁线。当日，我左路军在白杨大坡击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紧接着彻底摧毁了敌人在王家坟小亚口、马道子的堡垒阵地。敌人又企图在杨家坳防地顽抗，但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

一个团长被我打死。树倒猢狲散，敌人象退潮一样溃败下去。

在此同时，我右路部队在茅坪向敌人坚守的碉堡阵地发起进攻。因敌人居高临下，于我军不利。我军便佯装撤退，由茅坪转到柴山坪高地待敌。当敌人向我军靠近时，我军就集中火力，给敌人以猛烈地打击，敌人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躺下了一大片尸体，只好匆匆后退。于是我军紧紧追击，一直把敌人追到园标寺。敌人赶紧躲进早先修好的工事里，依此来抗击我军。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我军一时难以摧毁敌人的碉堡工事，就改变进攻的策略，我军一部分向敌人正面佯攻，另一部分从敌侧后攻击，敌人见前后受击，就赶忙向茅坝撤退。我军激战一天，全部突破敌人在鲁班场的封锁线，迅速向仁怀挺进。

我军围攻鲁班场的部队，在我军主力过河后，即停止向敌人的攻击，于三月十八日继续前进，由观音寺到茅台渡河与我军主力会合。在我军向古蔺地区前进时，蒋介石又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进入川陕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亲自从重庆飞到贵阳督战，并制定了聚歼红军于古蔺一线的军事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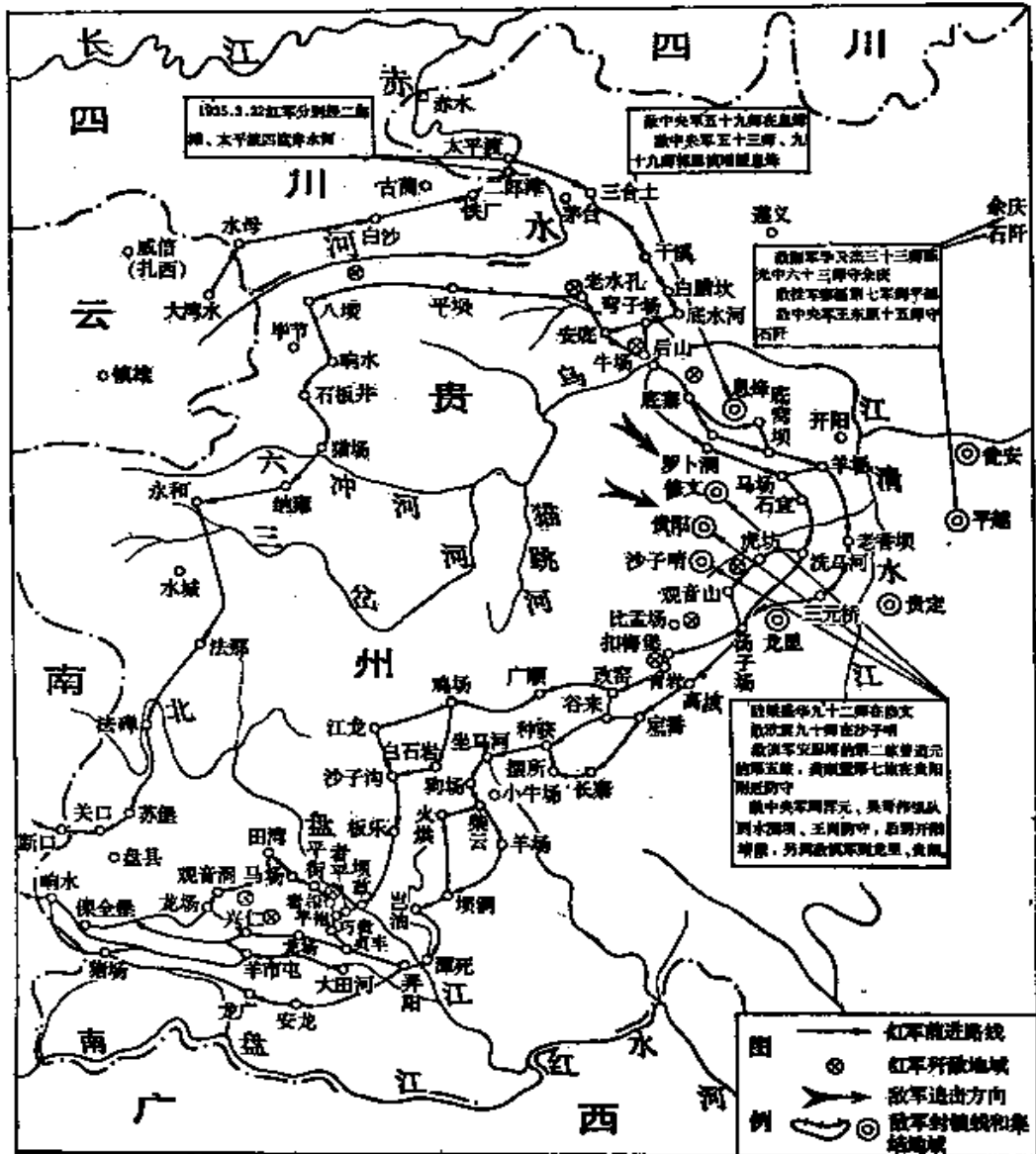
蒋介石调动了二十二个师和相当于师的旅近三十万敌军，在仁怀到赤水的广阔战线上围歼红军。但是，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红军的军事行动，又完全打乱了敌人聚歼我军的计划。在我军三渡赤水，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川南、黔北一带以后，又突然掉头东进，从川南重返贵州，使蒋介石在川南扑了个空，碉堡工事都成了无用之物。

四 渡 赤 水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军的右路纵队由太平渡、马场

渡过赤水河，左路纵队由二郎滩渡过赤水河。我军四渡赤水后，便把红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一线牵制敌军，以掩护红军主力南渡乌江。

红军四渡赤水河示意图



我军在乌江渡口歼灭守敌，渡过乌江。接着，我军的左路纵队就直下牛场、王家坪，佯攻息烽县城，迷惑敌人，我军在息烽城

北构筑碉堡工事，围攻与威胁城内的敌人，使住在城内的敌中央军五十九师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敢出来阻扰我军行动。待我军主力过后，这支部队又转向东进。我军的中路纵队，也从牛场下到王家坪。我左右两路纵队穿过公路，经硬寨、翻过鸡岭山，进入开阳，向双流前进。

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贵阳城里守备空虚。我军沿公路直下，威胁贵阳，使蒋介石惊恐万状，以为我军要攻打贵阳，急忙调敌中央军五十三师李璜珩部和九十九师郭思演部赶到息烽增援，九十二师梁盛华部到修文，九十师欧震部到沙子哨防堵。同时，又调滇军第二旅安思博部，第五旅曾道源部，第七旅龚顺壁部到贵阳附近防守。

当各路敌军纠集时，我军出敌不意，不走公路趋贵阳，而是跨过公路，绕过贵阳，进入开阳境内。蒋介石估计红军要东进湖南与红二方面军会合，便调动湘军三十三师李云杰部和六十三师李光中部守余庆，桂军第七军廖磊部到平越，敌中央军十五师王东原部到石阡防守。当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已迫使敌军变更了部署，便命令我军加强佯攻，摆开东进的阵势，促使敌人向东移动。我军左路纵队从腊炸去王姑趋向贵阳，右路纵队从羊昌到百宜。蒋介石见我军攻占羊昌，进逼贵阳，又调吴奇伟纵队到水田坝、王岗一线构筑工事。这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军仍按原计划东进宋家渡，继续前进。我军过河后就进入龙里、巴江一带，在清河及清水江上游搭浮桥，做出渡江的姿态。敌军更加以为红军将东进湖南，便不在水田坝构筑工事，而把部队开赴开阳，以堵截我军。此时，我军左路纵队又从白马场再转东羊场、红高寨又转回扛寨从顺岩河（南明河下游）过河，进到老香坝。我军在老香

坝一带集结后，则快速转向贵阳急进。我军左、中、右三路纵队到王关会合后，就从老香坝转向龙里。

我军行动神速，完全出于敌人意料之外。蒋介石见我军进到羊宜，大有进逼贵阳之势，急得象屁股上按了钉子似的坐卧不安，慌忙向各路敌军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滇军火速开到贵阳一线防守。其实，我军既不攻打贵阳，又不回师湖南，而是要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布置这次军事行动时就说：“只要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乖乖听从我们的调遣，把主力部队和云南军阀都调到贵阳和龙里一线。从而，敌人自动地为我军西进云南放开了道路。

我军西进云南，必过北盘江。军团首长决定由关岑以南的贞丰、白层渡河，以红十一团为前卫。

我军攻克定番后，后续部队的两个团跟进威远，于当晚进占长寨城，次日进入紫云县的小牛场，尔后占领了紫云城。我军在四月十二、十三日连占三城，形成对西进云南的有利条件。

我军所经过的长顺、紫云、镇宁、贞丰、安龙等地带，绝大多数是布依族寨子，以往由于汉族的反动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民族矛盾很深，甚至发展到武装冲突。我军纪律严明，自觉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拉夫，不派粮款，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打人，不骂人，尊重布依族的风俗习惯，保护布依族的群众利益，使布依族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为国为民的军队，从而积极为我军带路、送消息，使我军顺利通过了布依族地区。

四月十二日，我军南下入紫云县境内转入百岩。十五、十六日抵贞丰县境内的坝草，即沿江下到百层控制渡河点。我军左、中、右三路纵队集合在北盘江的者平渡口。渡口的守敌是国民党

保安司令王海平部队的数百人，他连做梦都没想到我军行动神速，几天内就穿过有名的火烘、花山、六马等数百里荒凉险峻的地区，进抵北盘江岸。

我军在山顶破门寨，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把扼守渡口的保安团打了下去。渡江后，一直把敌人追到二十里外才停止追击。我军的后续部队陆续搭好浮桥准备过江。

我军先头团的一个营沿河南下至孔明坟，黄昏时，我军占领了百层对岸的攀枝花、垭口高地，控制了百层街。守在百层的敌人，不敢出来对抗，只派一个人过来，要求我军给他们一条出路。我军不费吹灰之力，占了百层。十五日黎明，我军全部渡过北盘江，并控制了主要渡口。我军从坝草涉水过河的两个营，在坪街的下游击溃了敌人的两个营，占领了坪街，切断了敌人从兴仁到贞丰之间的联络。我军主力部队向坪街推进，大部分经丰贞、狗场入兴仁县内。原驻兴仁的敌吴创平师及师部，早在两天前撤离兴仁，只留下宋醒几个连的兵力。十七日，敌人见我军浩浩荡荡开过来了，吓得撒腿就跑，我军占领了兴仁县城。在此同时，我军打垮了从安南匆匆赶来的敌中央军梁盛华全部和欧震师一部。我军经铁索桥、双桥和狗场营入马家桥，胜利跨入云南境内。

我军两路纵队直入云南后，蒋介石又慌了神，以为我军要打昆明，赶忙到昆明督战，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部队赶到昆明一线。敌军向昆明集中，就为我军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极好的机会。我军不打昆明，却扬长北上，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使蒋介石又打错了算盘，枉费了一番心机。

我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甩开敌军几十万挥师北上，跨过金沙江，继续谱写红军长征的胜利篇章。

不动干戈的战斗

——参加和平解放绥远的回忆

何 树 声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丽的古都北京和平解放了。预兆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曙光，穿过严寒，照耀着祖国的大地。

当时我在中共绥远省委工作。消息传来，我心潮澎湃，在那个塞上小城——丰镇，向着还蒙在寒冷的雾气里的我的故乡的山峦和原野眺望。古老的都城迎来了新生，绥远呵，归绥呵，你的解放也不远了吧？傅作义将军选择一条光明之路，他在归绥城里的部属董其武将军将走什么道路呢？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兴奋又忧虑；既想为早日解放故乡做些工作，又不知会不会有这种机缘。

很快，党中央根据董其武同傅作义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我军向全国迅猛进军，绥远人民解放军这时已挺进到旗下营，离归绥城只有四十公里，对绥远国民党部队已造成四面八方强弩齐开、楚歌四起的形势，决定采取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毛主席在对傅作义的一次谈话中说：“绥远问题可以采取绥远方式解

决。”并指出，“所谓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先作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把贸易搞起来，然后董其武将军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

根据这一决策，党中央和华北局在三月间派出李井泉、潘纪文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阎又文在北京饭店商谈了绥远和平解放的问题。五月末，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与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派到北平来的代表康保安，于北平西交民巷东口的银行俱乐部签署了有名的《绥远和平协议》。随后，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将军。参加接见的有：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和陶铸同志。被接见的还有：傅作义方面的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毛主席说：“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些条款进行吧。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能有这样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我们叫做绥远方式。”毛主席所说的“绥远方式”，就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以便我们集中力量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时间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把这部分军队改编成人民解放军。

签字仪式后，华北局即责成绥远省委组织进驻归绥的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经省委研究决定，由潘纪文、鲁志浩、李贵、张露、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浪觉民和我等三十余人组成，加上电台通讯、警卫工作人员，共五十余人。潘纪文任处长，鲁志浩任主任。他们两人抗战初期，曾先后被党派往傅作义部队做政治工作，有着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我参加这顶工作，心情是高兴的，感到肩负着这神圣的使命，是“入虎穴、探

虎子”，在为驱散我的故乡归绥城上空的迷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后来事实证明，和平解放绥远虽然没动干戈，但实实在在是一场战斗。我们为它经历了许多磨难，我们的一位战友竟为它喋血于那座古城的街头。

按照双方协议，我方联络处准备于六月十五日进驻归绥。可是在日期迫近的时刻，却不见董其武方面有任何行动。我方曾派人送信联络，也无回音。为了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使协议付诸实现，联络处决定派鲁志浩、董文玉和我去归绥敦促董其武将军。我们到达旗下营后，为了稳妥，又决定由我和北平傅作义方面派来的工作人员肖如芝（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务处上校课长）先去联系。

汽车向前行驶，气氛逐渐紧张。进董部统治区后，见到的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沿路很少看到老百姓，来往的都是身着黄军装，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一片白色恐怖。这又是一个征兆：和平解放谈何容易呵！车到白塔附近豪沁营子村，国民党十一师师部驻地停了下来。师长不在，由参谋长出面迎接。寒暄过后，肖如芝很快同董其武将军通了电话。他向董报告说，中共联络处代表准备进城。董问来多少人，肖回答，联络处有五十多人，现在何树声代表先来联系。董在电话中沉默了好一会，大概是内部情况复杂吧。当时他确也有难处，因为华北地区的大部分已经解放，很多特务、顽固分子都麇集归绥，他们是不会老老实实呆在那里的。他告诉肖，他派人来接。当我们到达归绥新城东门时，董所派的代表康保安、张国林等人已在那里等候，在互相介绍时，我发现国民党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也在其中。他当时是反对和平解放绥远的。后来还得知，我们发出的要求进驻归绥的

信件，是被他扣了下来，未能呈交董其武将军。我表明了来意，康保安显得十分尴尬，他深表歉意地说，准备工作没作好，请求延缓进驻日期。他并奉董将军之命，和我同回旗下营，与我方再次商谈。随后，董其武又派原绥远所谓戡乱肃奸委员会主任寿跃南等人到丰镇与潘纪文同志磋商。几经周折，直到六月二十日，我方联络处才进驻归绥。

联络处人员住在西落凤街六号，这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官宅，有三幢一共二十多间房子。稍作安顿之后，我们便与董其武将军作了第一次谈判，这次谈判，主要是研究如何贯彻绥远和平协议的具体措施，并着手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遥邮通电，恢复商业贸易往来，确定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工作。董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委派康保安、张国林等人与我们经常联系。

当时的绥远情况很复杂，北平、天津、察哈尔、晋北等先后解放，这些地方的特务都聚集到绥远。华北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北平窜到绥远在包头坐镇指挥。同我们展开了一场听不到枪声的战斗。他们使出鬼蜮伎俩，用种种办法蛊惑人心。如有的特务带着电台潜伏在董其武部队内部，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相勾结，破坏我们的工作。还有一批所谓“东归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战役战败后逃到绥远来的，他们肆意诬蔑我党，说什么共产党说话不算话，骂傅作义出卖了他们等等。加上董内部的一些顽固分子，象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骑兵师长鄂友三、骑兵旅长乔汉魁等，在暗中形成一股《绥远和平协议》的反对派。他们疯狂地叫嚷：“蒋介石有美国支持，决不会完蛋”。“和共产党讲和平，靠不住”。“绥远要坚持到底，等待时局转变。”对傅作义方面派去的工作人员也施加压力，投寄匿

名信。说他们在北平把傅作义出卖了，现在又来出卖董其武，小心狗命云云。有的甚至叫嚣：“宁跳黄河一死，也不跟共产党走。”这些顽固分子对董其武将军施加压力说：“绝不让共产党代表到归绥，如果他们来，我们就要动武，当着你的面把他们打死。”与此同时，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停发军饷迫令董的部队西撤，并以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的办法来分裂这支部队，以达到他们破坏绥远和平解放的目的。绥远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张遐民秉其主子的意图，在部队里煽起一股西撤的妖风，他们说什么“后套粮多，补给容易，如不早撤，一旦共产党切断归绥到包头的交通线，就无法撤离了。”

不用说，我们的联络处自然成了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们时时刻刻都想拔掉这个“钉子”。他们有的向我们投寄恫吓的匿名信，有的公开制造磨擦。还有些上层的顽固分子，利用我们对上层人士做工作的机会，公开向我们挑衅。例如有这样一个家伙，有一天我和曹文玉同志正在联络处研究工作的时候，他走了进来，自称是和林县的县长，没说上几句话就嚣张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凉城县县长就是我打死的。”我曾在绥远做过敌工工作，对敌人团县以上人物的底细知道得很清楚。因此我回敬他说：“你过去做了些什么，我们知道，绥远人民更知道。”接着我告诉他，“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向全国胜利进军，绥远不多时就要全部解放，你应好好考虑今后该作什么了。”几句话，打掉了他的反动气焰，不得不灰溜溜地走掉。

困难和恫吓没有吓倒我们，联络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象一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善于在惊涛骇浪中腾跃。我们一面同敌顽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一面抓住每一个时机向绥远国民党的军政人员

讲解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当时，鲁志浩、曹文玉和我还经常去一些上层人物家中访问。绥远上层军政人员迫于大势所趋，在我党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量才采用”的政策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和平解放绥远的道路。省参议长张钦在拒绝国民党特务头子的拉拢和收买时，明确地说：“八年抗战，人民颠沛流离，胜利后，本应休养生息，但年来战火仍频，民不聊生。国事如此，何以慰孙总理在天之灵。本人年事已高，愿借此有限年光，斡旋和平，以期对绥远父老有所建树，再不能与人民为敌。”

联络处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也积极开展工作。向他们讲解和宣传和平解放协议精神，鼓励他们为和平解放绥远多做贡献。一些学校的老师、进步的知识分子、报社的记者等，都利用不同的形式，例如：读书会、演讲会学习革命理论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并在社会上积极宣传，广布影响，促进绥远当局贯彻协议。一些进步记者在《绥远晚报》成立了理事会，利用报纸这块阵地，发表进步文章和一些讽刺当局弊端的小品及版画。一时间，教育界、文艺界、青年界、妇女界的进步力量，在联络处和地下党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了。如教育界办起了一所民生小学，以办学为名，组织进步力量，每星期一、六集中到民生小学活动；青年界成立了青年学习会，他们勇敢、活跃，到处奔走，成为进步力量的先锋；医务界的积极分子则借助病房作为活动场地，学习、宣传我党文件和方针政策；妇女界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出墙报、搞联欢晚会，对各界影响很大。其中象蒙族女教师云华、云英两姐妹，无论在妇女界或者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当中，都是优秀的代表。云华是我在师范学校时的同学，学生时代就思想进步，有

高度的爱国热忱，才貌出众，勇于进取。她曾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而坐过监狱。现在又在我们党的影响下，积极起来参加妇女界为和平解放绥远的斗争。解放后，云华一直在学校教书，热忱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着她的才智。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各民族团结的缩影吧！但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个好的同志，后来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折磨致死。

由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和平解放绥远的声浪越来越高。这是历史潮流，这是人民的志向，这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得了的。绥远当局一些有见识、有眼力的军政人员和地方开明绅士，对和平解放绥远的态度，很快变得明朗而坚决起来。应该说，董其武将军是看到了这股不可逆转的洪流，而坚定他弃暗投明决心的。

我们在工作，敌人也在作最后的挣扎。他们看见进步力量在发展，也相应地把他们的太太、小姐、公子哥儿、反动记者、文痞和一些乌七八糟的特务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什么妇女会、青年会，嚣张地同进步力量唱对台戏，特务头子张庆恩亲自在包头出马，游说军政上层人物，组织顽固分子，煽动起一些不明真相、受蒙蔽的人在包头大街游行示威，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鼓噪什么：“傅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为了互相呼应，龟缩在归绥城里的国民党二五八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又亲自组织一伙凶手，于一个夜晚把拥护和平解放绥远的《奋斗日报》砸毁了；门窗、机器、家具多被毁坏，有的工作人员还被打伤。而这些顽固分子之最者，要算是鄂友三了。

鄂是董部的一个骑兵师师长，本是育婴堂收容的私生子，萨县天主教鄂牧师看他聪明伶俐，倍加照顾，后来考入黄浦军校，开始

了他的反革命生涯。此人一爱嫖，二爱杀人。凶残成性，人称“鄂毛驴”。大青山的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话：“不怕跳得欢，就怕遇上鄂友三。二尺麻绳脖子拴（指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把人勒死），不高兴时栽旗杆（指把人立在坑里活埋）”。他曾在武川的一个山村里，一次活埋了十七个人。我军在归绥北山上坝口子村一次战役中，打垮了他的部队，他靠着狡诈作了漏网之鱼。

这样一个欠着人民累累血债的顽固反革命分子，在今天这场光明与黑暗决战的时刻，不能不跳出来作最后的表演。有一次，我和曹文玉到董其武处商洽工作，正逢他在那里。董把我们介绍给他时，他把头一扬傲慢而嚣张地说：“我，是鄂友三。咱们在大青山打过交道。”针锋相对，我们立刻进行了回击，一面抖了他一些底，一面正告他，走和平解放绥远之路，是他唯一的出路，谁要想螳臂挡车，那只能粉身碎骨。董见我们唇枪舌剑，有些惊悚，便把话岔开了。鄂友三落得个灰溜溜的。

反动分子的阴谋挑衅、破坏，到七月份，当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司令王叔铭飞来绥远时，达到了高潮。

国民党反动政府始终密切注视绥远的动向。北平一解放，他们就命驻绥远部队西撤。七月下旬徐永昌、王叔铭接踵而来。他们的机轮在绥西陕坝一落地，就被派去接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人。两下见面后，徐、王急不可待地施展伎俩劝董其武率兵西撤，并许诺他们加官进爵。徐、王回广州后不久，国民党政府便宣布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

当徐永昌、王叔铭在陕坝活动期间，绥远顽固分子加紧了对联络处的挑衅活动。他们由一般的反革命恫吓、鼓噪，发展到公然在

大街上冲击和劫掠我联络处工作人员。这是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归绥新、旧城之间的大马路上，一群身着便衣、持有手枪、冲锋枪、手榴弹的特务和凶手，把我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和另外几名同志团团围住。开始他们推揉谩骂王士鑫等同志，王士鑫等同志据理力争，揭露他们的阴谋，他们便开枪并拉响手榴弹。王士鑫同志当即倒在血泊中。我们闻讯赶到现场，将王士鑫同志急速送往医院，但因伤势过重，王士鑫为绥远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是一起多么野蛮的事件。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杀使者”，而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顽固分子，竟然在接受和平协议的地区，杀害了负有和平使命的革命者！这不能不激起广大绥远人民的愤怒，不能不叫我联络处人员义愤填膺。我们即把董其武和王克俊（国民党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长，傅作义派来帮助董其武工作者）找到联络处，向他们严正指出这是反动派破坏绥远和平解放而制造的严重事件，绥远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求绥远当局立即追查并严惩凶手。董其武和王克俊当即表示歉意，并答应立即追办。后查明，杀害王士鑫烈士的主谋者是刘万春部下师政工处长赵元德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解放后被我镇压。

考虑到形势的变化，我联络处认为董其武暂时无法驾驭局势了，为了减少牺牲和更有利地斗争，我们向董其武提出联络处暂时撤出归绥。董看出了事态发展的极端的严重性，如果联络处撤走，他将被顽固分子所挟持，和谈必将决裂。那后果对他是凄惨的。他驰电北平请示傅作义，然后到我联络处来，请求联络处继续留住，并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我一切工作人员的安全。

我们慎重地进行了研究。认为造成的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使和平解放绥远不能实现。如果我们全撤走，正好中了他们的诡计。因此，决定留下部分人员，继续坚持斗争。我们将董其武请到联络处来，潘纪文同志代表联络处严正地告诉他，我党对绥远和平解放的方针不变，绥远的解放是注定了的。一小撮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和平解放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我们决定留下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三人继续工作。董诚恳表示：“这太好了，我一定采取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坚决贯彻北平协议”。接着我们三人当着董其武先生的面，严正谴责了反动分子的破坏罪行，表示我们留下来是为了绥远的和平解放，我们是不怕反动分子的任何挑衅的。

王士鑫同志的牺牲，得到党中央的关注。毛主席、周副主席接见了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可电告董其武多加注意。傅先生偕邓宝珊先生可以去绥远走一趟，绥远的解放，用绥远的方式是不变的。绥远省将不用军管，由傅先生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待起义通电发出后，即行组织”。并面令薄一波同志对傅作义去绥远做好准备工作。

这期间，联络处的大部人员已撤离归绥，董其武为确保留下人员的安全，将联络处办公地址由新城西落凤街搬迁到建设厅街德王府院内，并派出他的部队进行警卫。

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一严重事件，震动了绥远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阶层。一些愿意走和平道路的军政人员感到愤懑和不安，广大人民则怒火胸中烧，他们担心着绥远和平解放中途夭折。但我们留下人员已下定决心不辜负人民的期盼，要誓死贯彻中央提出的绥远和平解放的方针。当时，电台人员撤走了，在暂时

与上级中断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三人同三名警卫人员，与顽固分子继续展开了斗争。记得有一次，康保安来联络处说，大门外边见到一些特务在活动，告诉我们最好不要外出，并希望我们的警卫员能在我们住房窗前设岗，以防万一。我们立刻告诉他，没这必要，保证安全是你们的事，只要大家有诚意执行绥远和平解放协议，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好的。敌特暗害活动不但没有吓倒我们，为了扩大影响，安定民心，使绥远广大人民知道联络处人员并未完全撤走，仍在为绥远的和平解放继续斗争，我们有意识地、针锋相对地在社会上开展各种活动。如参观工厂、学校，召开各种类型，各种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我们去过归绥一中、女子师范、土默特旗中学、毛纺厂等。为了加强青年和妇女工作，后来绥远省委又从丰镇派来金毅（女）、刘志远等同志，协同我们工作。董其武将军也常去联络处和我们商谈各种事宜。一次，他告诉我们，北平傅作义先生来电指示他，北平正在研究绥远的局势，要他采取措施保护共产党方面人员的安全。这给我们很大温暖和鼓舞，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党的力量的显示，是党的关怀的结果。所以，我们虽然身在虎穴，危险仍然很大，困难仍然很多，但我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为了胜利，我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在联络处大部分人撤走以后不久，反动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在归绥又组织了一部分国民党士兵，在街上搞武装游行，还贴出极端恶毒的反动标语。真是猖狂至极！面对这种险恶的局面，是前进还是后退？我们想到有党作我们的靠山，有人民作我们的后盾，有解放战争正在全国胜利进展的大好形势，我们更增强了信念和力量。我们决心与敌人针锋相对，斗争到底。我和曹文玉商量决定，也到街上去，以显示我们的气派。我们把要上街的事

通知了董其武将军，第二天就走上了大南街。董将军怕出问题，命令武装警察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实行了严密的警戒。当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走一段，都有两名武装侦缉队人员来敬礼报告，说什么“奉命前来警卫”。我们昂首阔步地前行，后面是不断增加的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和数不清的欢迎我们的人民群众。这些群众看见我们，兴高彩烈地议论说：“共产党没有走，共产党真行！”还有的借机会挖苦那些反动分子：“不是说共产党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么？看这两个多带劲！又年轻、又端正、又和气、有胆有识。”人越来越多，我们不时地同他们打招呼，不时地宣传我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方针。应该说，这是最好的最自然的游行示威了，它显示了共产党人的胆略和气魄，鼓舞了人民的斗争勇气，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反革命气焰，它告诉敌人，任何倒行逆施，与民心相背的行为都吓不倒革命者，都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想到即将来到的胜利，忆起死难的王士鑫烈士，我不由得吟哦了一位知名烈士的两句诗：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我们就是这样，在党中央的关注、华北局和绥远省委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和进步力量，顶着斗争的惊涛骇浪，奋力前行，终于排除重重险阻，迎来了著名的“绥远九·一九”起义，实现了党中央的决策——和平解放绥远。

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绥远方式时曾说：“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

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以后，事实正是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发展的。董其武将军起义后，很快成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傅作义（原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担任，副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原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孙兰峰（原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秘书长王克俊，副秘书长潘纪文；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副主席杨植霖、奎壁、孙兰峰，秘书长李维中，副秘书长康保安（原国民党绥远省干部训练团团长）。绥远部队改编为二十三兵团，一九五二年由董其武将军率领参加了抗美援朝，对祖国作出了贡献。原绥远省国民党政府人员全部留用，他们中大多数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给人民作了许多好事和有益的贡献。但是，也有一些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一开始就是搞的假起义，妄图“借水养鱼”，伺机蠢动；当我们按照党中央“以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的指示派出大批军干人员改造绥远部队时，他们竟乘机策动叛变，杀害我一百多名干部。这种倒行逆施，当然受到了人民的惩罚，包括那个杀害王士鑫烈士的凶手，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岁月匆匆又流去三十余年，不管历史怎样迂回曲折，但任什么也湮没不了它的真象的。千古功过，人民自有论断。干过好事，人民不会忘记，反过来，想借助历史的烟雾，把自己打扮成菩萨的，也属枉然。因此我写下这篇小文，是想和经历那段岁月和没经历那段岁月的同志、朋友，共同回首一下，以便我们不要淡忘了烈士的血和我们的宗旨。

新开岭全歼“千里驹”

彭 嘉 庆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部队顾问）

一九四六年，我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在东北的营口、盘山、本溪、海城、鞍山等地作战后，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主动放弃了城市，于六月进入本溪东南地区，组织防御。除以一部分兵力在南芬、连山关、摩天岭一线与敌对峙，以小部分兵力剿匪和开展群众工作外，主力抓紧时机搞了四个月的整训。总结前一时期的作战经验，澄清了部队内部的一些问题，树立了长期作战的思想，进行了运动战方针的学习和战术、技术训练。这段整训，为新开岭战役的胜利和以后坚持南满的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十月，东北蒋军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无力同时向南北进攻，乃改用“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妄图先破南满我军，后转进攻北满，占领全东北。敌以一部兵力打通沈（阳）吉（林）线后，即调集其东北主力八个师约十万余人，分三路向我南满大举

进攻。北路以新一军新三十师、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沿新宾、柳河向通化、临江进犯，企图阻止我南满三纵、四纵两大主力会合，切断我南北满之联系，捣毁我南满后方。南路以新六军十四师、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军一八四师沿海城、大石桥、岫岩向庄河、大孤山进犯，企图切断我安东（今丹东）与大连之联系，从侧翼配合中路之敌占领我辽东军区所在地安东。中路两个师分两股直犯安东，其右股第五十二军二师和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由正面沿安（东）奉（沈阳）线东进，其左股二十五师（欠七十五团）于北侧沿小市、赛马向宽甸进犯，想迂回到我辽东军区侧后，断我退路。三路敌人相配合。妄图将我主力压缩、歼灭于安东、凤城、宽甸地区，侵占安东市和南满解放区。

我四纵在中路进攻之敌的正面进行防御。当时，四纵领导人和部队都很分散，三个师分三个方向作战，相距一百多公里。第十师和十一师三十二团由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率领，已于十月十一日由草河口开往新宾地区配合三纵作战，打击北路进犯之敌。第十一师（欠三十二团）及军区警卫团主力，为保障十师侧后安全，策应三纵作战，于十月十八日攻占了小市。第十二师在安奉线之南芬、连山关、摩天岭、牛蹄崖地区进行宽大正面防御。纵队司令员胡奇才、副政委欧阳文（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李福泽同志在通远堡指挥部。我是纵队政委，有事正在安东。当时留在安东主持军区和辽东省委工作的江华同志，找到军区司令部作战室谈情况，商讨问题。军区机关同志将当前敌我情况介绍后，江华同志说：我们怎样粉碎敌人的进攻？安东是守还是放？在座的同志都说安东守不住。鉴于四纵将近一年的作战经验

教训和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我讲了三点意见：一是根据中央关于“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指示，建议军区放弃安东，机关和有关人员要马上转移后撤，让敌人背上安东这个“包袱”，敌人占的地方越多，兵力就越分散，就越被动，而我们的主动权也就越大。二是为了掩护军区、后方以及群众转移，各部队这次作战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分兵把口，要贯彻毛主席关于运动战的指导思想，“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就是歼灭敌一个团或一个营，也比击溃一个师要好。三是四纵的作战，除留少数部队在正面牵制敌人外，主力应撤至安奉线以东地区集结，寻机歼敌，因为这一带群众基础较好，地形对我有利，便于我迂回运动。军区采纳了我们这些意见。随后，我又打电话回通远堡，将以上意见跟胡奇才同志商量。他说，他刚从小市回到那里，他们在家的几位同志的想法与军区讨论的意见一致，司令部已搞了一个部队转移集结方案，指挥部将转移至赛马。他还请我快回去。我将情况向江华同志汇报后，他就叫我马上赶回四纵指挥作战。为了争取时间，军区调了一辆火车头，专送我和有关人员连夜离开了安东。

二

我坐火车先到灌水，后转乘汽车去赛马。沿途我找了当时在安奉线两侧开展群众工作的领导同志，了解了情况，要求他们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并且想办法坚持敌后斗争。我到赛马后，第二天早晨，胡奇才等同志也赶到了。在那里，我们与部分师领导干部开会，一起研究了迟滞敌人、掩护军区和后方转移的具体措施，

确定了十一师、十二师主力荫蔽集结的部署。同时，我们领导干部也作了分工，胡奇才、李福泽同志和我带一个精干指挥机构，随两个师行动，指挥作战；欧阳文同志负责后方指挥所的工作。

我们前方指挥所几位同志，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在新开岭组织一次战役，而是首先考虑怎么样做，才能达到既掩护好军区撤退，又能将主力荫蔽集结。为达到此目的，我们当时是这样组织的。十月十九日，中路之敌发起进攻后，其左股第二十五师（欠七十五团）向我小市第十一师攻击。估计该敌可能沿田师付、碱厂、赛马、宽甸迂回安东，因此，我们决心集中兵力看准时机击其一部，抓一把，以拖住敌人。于是即令十一师主力是日昼夜撤回赛马附近地区集结待机，留三十一团在分水岭（赛马东北十五公里）地区阻击敌人，掩护安奉线翼侧安全和十一师、十二师主力集结。该团阻敌，战至二十三日，歼敌三百余人，完成了任务，才撤出分水岭归建。右股敌人第二师及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十九日发起进攻后，被我十二师阻于牛蹄崖、南芬一线，二十日下午突破我牛蹄崖阵地，向摩天岭主阵地攻击。为了集中兵力打击左股敌二十五师，我们根据上级电示，命令十二师留三十五团继续沿安奉线实行运动，坚决阻击，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掩护后方转移，师主力迅速撤至赛马附近地区与十一师会合。当时，有的干部反映，敌已逼近摩天岭阵地，难于摆脱敌人，不好撤出。我们做了许多思想工作，讲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道理，要求他们马上撤下来，主力尽快脱离敌人。同时，我们组织炮火对敌进行拦阻射击，掩护十二师撤退。部队撤下时，连饭都未吃上，就急忙转移了。两个师主力集结后，我于二十三日主动放弃了赛马，敌二十五师当日黄昏占领了该地。

三

敌二十五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半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自吹“能征惯战”，有蒋军“千里驹”之称。自一九四五年冬作为蒋军先遣部队踏进东北后，耀武扬威，横冲直撞，曾多次对我四纵作战。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的营口战斗中，我虽给该师以沉重打击，全歼一个加强营，但他们并不服输，仍向我进犯。这次占领赛马后，得意忘形，认为我军“不堪一击”。由于敌对我十二师主力转移集结未察觉，又因我三十五团在安奉线顽强作战，节节阻击，给敌造成错觉，误认为我军主力企图在凤城、凤凰山一带阻其右翼进犯安东。因此，只留下小部兵力（约两个营）守赛马，师主力则放弃向宽甸东犯之企图，二十四日改向凤城急进，寻我决战。我们见敌此举气焰嚣张，南进甚速，若与右股第二师会合，将增大我三十五团的压力，对安东威胁更大。因此，我们决定寻机击其弱部，乱其部署，以调其主力回援，不让左右两股敌人速进会合，争取时间让军区机关安全转移。于是，我趁敌主力南下之机，二十四日下午，以第十一师两个团、十二师一个团及军区警卫团两个营的兵力，从东、东南两面向赛马立足未稳之守敌突然发起攻击。战至二十五日拂晓，将敌击溃，歼敌二百多人，余敌向小市方向山区逃窜。我收复了赛马。这一胜利，大大振奋和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我收复赛马后，为了拖住敌人，遂派部队继续尾追南下之敌。敌二十五师南进时，因山高水多，道路不良，又沿途遭我敌后武装工作队的袭击袭扰，人马十分疲惫，进至松树嘴子（凤城东北

三十公里)地区后,闻我攻打赛马,感到后路不保,即慌忙调头回援。

四

我们获悉敌调头北上后,判断该师七十五团仍在安奉线作战,回援之敌不足两个团。加上敌自十九日以来连日行军作战,不能休息,士气沮丧,战斗力大减。因此,决心趁敌仓惶回援之机,在运动中歼灭之。当敌二十七日上午返至双岭子地区(赛马西南十五公里)。我即当日下午以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此时已归建)、十二师(欠二十五团)共五个团兵力,发起攻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但战至黄昏,攻击仍未奏效。晚上,派部队进行威力侦察,发现敌火力越来越猛。我们越觉得情况不对,指示部队捉俘虏,进一步查明情况。到了凌晨两点钟,才从敌七十五团的俘虏口供中,获知七十五团已与师会合归建,师主力回头不单是为了增援,而主要是寻我主力作战。鉴于敌情变化,我兵力不足,恋战不利,我当即决定停止攻击,寻机再战。

部队撤出不打,往何处撤呢?撤出后下一着棋该怎么办?当时,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在山上的指挥所开小会,分析研究了这些问题。认为双岭子这一仗,我虽未能达到歼敌之目的,但也不吃亏,而且从中进一步摸清了敌情,心里有了底。我与敌打了十天“蘑菇战”,敌竟不顾劳师费时、损耗兵力,仍寻我作战,这次我撤出以后,敌肯定还会缠住不放。我们要利用这一机会将这股敌人吃掉。我经十天作战,错乱了敌人部署,争取了时间,掩护了军区机关、后方和群众转移,现已具备了吃掉敌人的有利条件和

主动权。究竟如何吃掉这股敌人呢？大家主张，利用敌人狂妄骄横、求战心切的特点，把敌诱进对我有利的新开岭地区，相机围歼。以上就是我们纵队领导同志开始形成新开岭战役的思想和决心。当时研究的初步方案：一是既然敌人叫嚣要“咬住”我十一师“吃掉”，我便将计就计，留十一师部分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将敌诱向新开岭以东地区的预设阵地。二是十二师（欠三十五团）在天亮以前撤出战斗，秘密转移至新开岭东北的邵家堡子地区隐蔽集结。三是请示军区肖华司令员同意，请韩先楚同志率十师从新宾地区兼程赶回，按纵队指定计划，迅速到新开岭以东地区集结待命。

部队战至二十八日晨，歼敌八百余人，始按照计划撤出战斗。部队撤出时，非常疲劳，早晨还遭到敌炮火射击和飞机轰炸。但我们毫不犹豫，命令部队迅速撤。为了掩护十二师隐蔽集结，纵指率十一师沿公路边打边撤，有意暴露，让十二师在公路两侧秘密转移。我们要求十二师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拼命赶路，及时摆脱敌人。该师按指定路线前进，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封锁道路，搞好保密，隐蔽待机，积极做好一切歼敌的准备工作。

五

我自双岭子转移后，敌二十五师再次占领了赛马。敌对我十二师隐蔽集结毫无察觉，也没料到我会调回十师作战，错误判断我在赛马附近地区只有十一师作战，妄图“咬住”十一师，一口吞掉。见十一师沿赛（马）宽（甸）公路撤退时，敌于三十日

早分兵两路，贸然向宽甸进犯。敌由于狂妄骄横，求战甚切，在我十一师的节节阻诱下，当日晚进入我预定的新开岭以东、暖阳边门以西地区。这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十几公里长的袋形谷地，两边都是几百米高的高山，暖阳河和赛宽公路从中间穿过。只要我控制了周围制高点，敌窜进来就出不去。

敌冒失就范，我部署也基本就绪。十一师和纵直警卫营，已占领暖阳边门一带公路两侧高地，进行阻击，关上了敌东犯之大门；十师经过十七小时的强行军，已由碱厂赶回暖阳边门以北的高丽墓子、柏林川地区；十二师主力仍在新开岭东北的邵家堡子地区集结待命，其三十五团已奉命转至凤城东北的石头城地区，准备阻击北援之敌。部署就绪后，我们还慎重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从编制上看我八个团围打一个师，从兵力上看我才两倍于敌，装备还比敌人差。但是，我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而敌遭受连续打击和消耗，冒入我预设战场，孤军突出，距他路敌人较远，难于相互支援。我们应不失此有利战机，歼敌于此地。于是最后决定：十师担任主攻，从东北面沿老爷岭、黄家堡子方向，攻敌翼侧；十一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在暖阳河以南向西方向发展进攻；十二师从西北方向发起攻击，占领新开岭以东公路两侧高地，断敌退路，对敌形成合围；纵队炮团在暖阳边门以东的车轮泡地区占领发射阵地，主要支援十师战斗。为防止敌人打开东犯大门，摆脱不利态势，我定于三十一日五时发起总攻。

可是，因当时我们没有考虑到十师临时才赶回来，驻地分散，各团三十一日三时才接到攻击命令，加上当时下小雨，山高路滑，行军艰难，部队不能按时到位。后来，又改为十时才发起总攻。

由于总攻时间推迟，被敌抢先了一步，出现了各种连锁反应。敌当时仍以为我只有一个师作战，早晨还保持向东进攻态势，突破了我十一师部分防御阵地，八时左右攻占了老爷岭和公路南侧的制高点四〇四高地。我十时发起总攻后，十师当即受到老爷岭守敌阻击，不能前进。攻击了一天，十师、十一师的进展不大，没有达到目的，只有十二师完成了预定任务，控制了公路北侧制高点，初步形成了对敌三面包围的态势。

十一月一日，各师总结了前一天从正面攻击未能奏效的经验教训，改为向敌翼侧迂回攻击，进展很快。十一师夺回了四〇四高地，占领了暖阳河南岸各要点，卡死了敌向宽甸东突之道路。十二师越过赛宽公路。攻占了路南侧各高地，切断了敌逃窜之退路，并乘胜向东发展进攻，缩小了对敌包围圈。只有十师方向，仍在老爷岭进攻受阻。老爷岭是整个战区中最有价值的制高点，山顶有日寇遗留的碉堡和工事、堑壕。敌知道我主攻方向后，一日将主力收缩于老爷岭、黄家堡子一带，固守顽抗，等待支援。我十师攻击时，都因山势险峻和敌火猛烈，加上这一天下小雪，不利于运动接敌，攻击了多次，伤亡很大，仍未奏效。老爷岭成了敌我争夺的焦点。

六

由于老爷岭没有迅速攻下，战场形成僵局。此时各路援敌相继赶来。南面敌第二师占领凤城、安东后，正向宽甸进犯，从东面包围我军；北路之敌已占领了通化、桓仁，正向我后方逼进；西面敌新二十二师正向双岭子方向开来，逼近新开岭。战役出现了

艰难复杂的局面。

在伤亡增大和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下一步该怎么办？是继续打下去还是撤出来？一日晚，在小边沟指挥所一个独立小棚子里召开了纵队党委紧急会议，发扬军事民主，分析我敌利弊情况。经过研究，一致认为，我虽有困难，但敌人处境更困难，全师被我八个团紧紧围住，前后出路被我切断，战场大部制高点被我控制，包围圈正在紧缩，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为我掌握；我伤亡虽大，但敌伤亡更惨重，且四面楚歌，士气惶惶，战斗力大减；敌虽有四方支援，但尚需十几小时才能赶到新开岭地区；且指挥不统一，互相观望，都想保存势力，远水救不了近火。相比之下，总的形势我比敌有利，我若撤出不打，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也摆不脱目前困境。一旦四方援敌乘势围上，气焰更加嚣张，对我四纵和整个后方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况且，战场已成胶状，敌我都“咬”在一起，部队和伤病员都撤不下来，只要我一松劲，被围困之敌就会硬起来，不是道高一尺就是魔高一丈。权衡利弊，大家都主张，要树立信心，咬紧牙关，坚决打下去，把骄横的敌人彻底消灭！打下去的关键问题是集中兵力、争取时间迅速拿下老爷岭，才能使全局皆活。因此，党委会决定，在此关键时刻，预备队和全纵队所有人员都加入战斗；加强炮火支援，掩护十师强攻老爷岭；十一师、十二师从侧后全力攻击，积极配合。为不给敌喘息机会，总围歼时间定于二日拂晓，争取一天结束战斗。当时，我们将会议研究的情况，用电话向各师领导干部作了传达，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团结一致，加强政治思想鼓动，开展对敌宣传瓦解工作，再接再厉，坚持到最后胜利！为加强组织指挥，我们几位领导也作了分工，胡奇才同志和我到十师方向；韩

先楚同志仍回炮团、纵直警卫营方向，组织炮火支援，并卡死敌东进大门；李福泽同志留在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分头连夜赶到部队去。

二日拂晓，各方向按计划向敌发起总围歼。十一师主力渡过了暖阳河，进至北岸，从侧后向老爷岭守敌卷击；十二师攻占了老爷岭以西各高地，孤立了老爷岭守敌。我和胡奇才同志赶到十师时，太阳刚出山，看见师长、政委正在老爷岭山下紧张地组织各团攻击，二十八团仍从正面攻击，各级干部身先士卒，团长、政委带领连队冲锋，参谋长率尖兵排突击。纵队预备队三十团从西北和北面加入战斗后，各级干部带领部队向老爷岭进行多层次的连续不断的冲击，战斗非常激烈。敌企图靠飞机支援和接济，作最后垂死挣扎，抵抗得很厉害。在这关键时刻，十师作战科副科长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带领部队冲击。战士们在干部英勇行为鼓动下，不怕敌火扫射和飞机轰炸，勇猛地向老爷岭反复冲击。这时师炮兵也赶到，对敌进行直瞄射击，掩护步兵攻击。守敌因经不起我几面夹击，终于垮下去。我们到了十师不久，老爷岭主阵地就被我部队占领了。这时敌机还不断地向阵地空投武器弹药和食品。战士们在阵地上高喊：“不打收条的运输队长，你们来得太晚了！”“东西投得太少了！”

敌人丢了老爷岭，全线混乱，迅速崩溃，统统压挤在黄家堡子附近，没有回旋余地。这时我们集中炮火向敌师部指挥所黄家堡子猛轰，炸得汽车、装甲车起火，硝烟满天，使敌失去指挥。混乱的敌人开始向南面突围，被我十一师截回，后来转向西面突围，又被我十二师堵住。这时，敌机还向地面毫无目标轰炸、扫射，敌人无处可跑，被炸死不少。我十师不顾敌机轰炸扫射，如

猛虎下山，乘胜追击。到了中午，我三个师将敌压缩、全歼于黄家堡子以西河套内。

从十月十九日开始到十一月二日止，此役共毙、伤敌团长以下约三千人，俘敌师长李正谊以下八千余名，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至此，蒋军踏入东北后第一个与我四纵交战的第二十五师，全军覆没。

战斗结束时，因四方援敌已逼近，我军不能停留。我们即向各师明确了任务，马上打扫战场，下午即开始撤出，向太平哨、集安方向转移。

我军在新开岭地区全歼敌二十五师，完全是全体指战员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运动战方针，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的结果；是我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实行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的开端。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的作战士气，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敌人对南满的作战计划，使进攻南满之敌不得不由急进改为缓进。事后获知，称号“虎师”的敌新二十二师为增援二十五师，已进至距新开岭十五公里处，但听到二十五师被歼如此之快，极为惊愕，呆在那里徘徊两天多，不敢前进。

此战是笔者所参与组织的一次比较艰险的战役，过去曾有些记录，因“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东西荡然无存。现手头无具体素材，事隔三十多年，单凭记忆，可能有误，文中有不恰当之处，请战役参与者指正。

（一九八〇年十月）

红军与蔡廷锴、陈济棠之间几件往事

邹 毕 兆

（全国政协委员）

在中央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曾与福建的蒋光鼐、蔡廷锴、广东的陈济棠订过联合协议，这对我发展根据地是很有用的，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这些协议大都告吹了，我当时曾在中央翻译来往电报，有些见闻，现回忆如下，作为历史的证明。

（一）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从福建派代表徐鸣鸿到中央根据地瑞金来谈判。由于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对十九路军反对蒋介石并不重视，而是看做是军阀、反革命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因此，不是采取联合十九路军来共同打倒蒋介石的方针，而是坐山观虎斗，任凭他们去争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对福建的全权代表徐鸣鸿的接待是比较冷淡的。但毛主席就不一样，毛泽东主席在接待徐鸣鸿时，待之如贵宾，徐对此非常满意。与福建达成协定后，中央军委派张云逸同志

为驻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用电台联络。在电报中记起的几件事：

在根据地和福建的划界中，对有异议的地方，十九路军上层的态度，一般是照顾我方的方案，但我方则是寸土不让，显得十九路军为反对蒋介石不计较几个村子，而我方是认真的。特别对十九路军的存与亡并不怎么重视。

在蒋介石大批军队占领延平，福州处在危急时，我方给福建人民政府的电报，是要他们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坚守福州城。也就是要福建人民政府照搬我根据地的一套，即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实行的“寸土必争”那一套。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邀请了福建派来求援的尹时中参加开幕式。在大会上，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凯丰同志当着尹时中在场骂福建人民政府。大意是说，现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阵营非常清楚，要么就是革命，要么就是反革命，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福建人民政府想走第三条道路，喊着革命口号搞反革命，欺骗人民，模糊群众对革命的认识，比公开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反革命还要坏。我参加大会旁听，看到既邀请福建派来的代表参加大会，又当着面痛骂他，也觉得不以为然。这些人正如毛主席批判的那样：“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总之，当时我们没有把蔡廷锴、蒋光鼐反对蒋介石当做一件大好事，并且联合蔡廷锴去打蒋介石，更没有看到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对我们也是个损失，因此不能真正地联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已经是“安定”的福建方面，变成了由蒋介石嫡系向中央根据地进攻的激烈战场。

(二)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不久，一九三四年八一节以前，我党又与广东陈济棠谈判、达成了妥协，并建立了电台联络。来往电报中，陈济棠要求我方在筠门岭方面把不好守的山头放弃几个，让他占领，并说明为的是他应付蒋介石，好向蒋介石报战功。我方没有答复。

在长征开始时，电告了陈济棠。陈济棠来电说，他们了解江口镇的盐和布匹都不缺，可以供应我方的需要。当蒋介石下令对我根据地封锁盐、布匹等必需品后，江口是陈济棠让我方去进行贸易活动的地方。陈还力劝我们务必不要离开根据地，离开根据地是很危险的。陈济棠为了自己在广东的生存，是不希望蒋介石消灭红军的。

长征开始，红军途经重石、版石，打掉了踞守的广东部队，把俘虏送回去时告诉了陈济棠，陈回电中用了谁是谁非？对我方把他的官兵称俘虏当敌人很不满意。经这以后，陈济棠再没有和我方通报了。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长沙)

新四军的战歌

陈文熙

“我们是江南的新四军，江南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大家来救中国，我们要大家来保家乡，只有那抗战一齐来，我们是不分他什么党。敌人的毒计不要中，我们的弟兄不投降，不投降，不分党，救中国，保家乡，联合那友军保家乡，要把那鬼子赶回东洋，要把那鬼子赶回东洋，——嗨。”

一九四〇年年末，正值抗日战争极为艰苦困难时期，我当时在新四军“江抗”二支队当战士，当时虽然环境艰苦，但革命队伍里时时保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传统和革命作风，在行军、作战的空隙时间里，总是歌声嘹亮，充满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记得那时凡识一点字的同志，都有一个“宝贝”，那就是抄了许多革命歌曲或民谣等等的小日记本，我的那个“宝贝”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不慎失落了，使我心痛了好几天，以后就搜集不到那么多的歌曲了，幸好我们部队差不多在每晚行军前，总要以连队为单位互相“拉”歌、“赛”歌，所以还记起好几支以前唱过的歌曲，有的比较出名，如《新四军之歌》、

《黄水谣》、《黄河颂》和《黄桥烧饼歌》等等，都已由音乐出版部门出过集子，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在这篇稿子里所记的歌词，则是在歌曲集子中很少见到的，由于我的记忆力关系，对音乐又是外行，故有的歌词作者是谁我说不清楚，有的则是有头无尾，只记得其中的一、二段。

一九四〇年底，我参军时，正是陈毅同志所率的江南指挥部的几千部队，挺进苏北，在苏北黄桥一仗，以少胜多，击溃了顽军韩得勤部数万人，开辟了苏北根据地之后，留在苏南的谭震林等同志，以很少的一些人员为基础，重新把“江南抗日义勇军”扩大为三、四个支队（团），谭震林当时对外称“林司令”，何克希同志对外称“王司令”，文章开头那支名为《我们是江南的新四军》的歌，就是我一开始当兵唱的第一支歌子。

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指挥顾祝同等顽固派头子，以七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正在转移中的新四军军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当时在部队里唱过一支名为《打倒何应钦》的歌：

“天上有颗扫帚星，重庆有一个何应钦，手下白养几万兵呀，只会欺侮老百姓呀。

“多少鬼子不去打，反共摩擦是专家，克扣军饷发洋财呀，准备投降就是他呀！

“春天一到杨柳青，何应钦正好大调兵，破坏抗战帮鬼子呀，拚命进攻新四军呀！

“全国人民要安宁，只有打倒何应钦，坚持抗战反摩擦呀！打走鬼子享太平呀！”（因为当时我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尚未彻底破裂，故不指蒋介石的名字，只提打倒国民党的军事部长何

应钦。)

“皖南事变”后，我党不顾蒋介石顽固派的所谓解散新四军的叫嚣，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新四军成立七个师，我苏南部队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是谭震林同志。一九四一年四月，在江阴县祝塘镇街上，开了一个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成立的庆祝大会，由“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江渭清同志任十八旅旅长，在那次会上，江渭清号召我们“要建立一个铁的十八旅”，我所在的“江抗”二支队，改称为五十二团，团长是陈挺同志。

我们部队当时活动的地区比较大，东至上海附近的太仓、昆山，西至常州北边一带，在抗日游击根据地里，各连队都派出了一些战士去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性抗日组织，还实行了减租减息，使贫雇农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当时对地主，只要他和我们一起抗日，并不分掉他的田产房屋，还让有的开明士绅参加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对于汉奸特务分子，一经查明，则坚决地予以镇压，对于敢于破坏团结抗战，猖狂地向我挑衅进攻的顽固派军队，我军本着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给以迎头痛击，使其不得不每次大败而逃，当时部队里唱过一支《保卫我们东路》的歌，曲调是仿《保卫马德里》的曲子：

“举起暴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投降派（有唱“对准杀人放火的胡肇汗”的，胡是顽固派“忠救军”的头子），起来，起来！全东路的人民，为了争取我们的自由和解放，快展开热烈的反内战的斗争，起来，起来！向无耻的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保卫我们的东路，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

那时还常常唱一支名为《反扫荡和反‘反共’》的歌：

“反扫荡，反扫荡，延陵大捷血战繁昌，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壮烈殉国的吴副团长，他们的鲜血，喷满了敌人的胸膛，他们的战绩，发扬了民族的荣光，粉碎敌人的分进攻击，夺取敌人的精锐武装，这是我们空前的胜利，回答了顽固分子无耻的诽谤，同志们，我们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反扫荡、反扫荡。

“反‘反共’，反‘反共’，坚持团结才能生存，和平妥协就是死路，反共就是汉奸的阴谋，三年的教训，提高了民众的认识，谁要反共，他就是民族的敌人，粉碎和平妥协的阴谋，加强抗日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斗争的路线，粉碎了顽固分子无耻的阴谋，同志们，我们要拥护坚决抗战的共产党，反‘反共’，反‘反共’。”

我参军不久，就被吸收为青年队队员（相当于现在的共青团），青年队员大多是搞文艺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那时有一支叫《青年突击队员》的歌：

“我们是青年突击队员，我们是青年突击队员，我们要发扬优良传统，我们要提高学习精神，战场是我们的学校，群众是我们的导师，射击、刺杀、努力操演，识字读报去学习，遵守军事纪律，遵守青年队章，努力吧，努力吧，努力吧！青年的突击队员，前进吧，前进吧，前进吧，青年的突击队员。”

还有一支名为《战备整训》的歌：

“抗战的炮火响连天，胜利的曙光在面前，我们要赶，赶上去迎接最艰巨的斗争，迎接伟大的胜利，个个都奋勇争先，在猛烈的炮火下，在胜利的曙光前，我们要更努力学习，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在战斗准备中来整训，在整训中来提高作战能力，要克服更大的困难，肩负起未来的重担。”

为了加强部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激发同志们的战斗热情，我们很喜爱唱民族英雄岳飞所作的《满江红》，以及《热血》、《黄水谣》、《黄河颂》等歌，还唱过词句稍有些更动的《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原野掩埋着志士的鲜血，为了保卫这秀丽的河山，他们曾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无耻的内奸丧尽了良心，汪精卫、何应钦疯狂的反共，磕头求拜卑鄙的投降，出卖了自己更出卖了祖国。

“今年的五月再不是退让，全国人民已团结了力量，铁锤刀枪已紧握在手里，顽强的争取那最后的胜利。”

为了壮大抗日力量，连队有时也要派人出去搞扩军工作。那时有一支强调扩军工作重要性的《扩大歌》：

“抗战到了新阶段，呀呀啵呀呀，呀呀呀啵呀呀，革命力量要扩大，呀呀啵呀呀，呀呀呀啵呀呀，我们扩大什么人？坏家伙不能要，工农分子呱呱叫，扩大路线要正确、不欺骗，不拉伕，时时解释和说服，我们力量扩大了，呀呀啵呀呀，呀呀呀啵呀呀，中华民族得解放，呀呀啵呀呀，呀呀呀啵呀呀。”

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成立后，队伍不断扩大，东路地区许多重要的市镇，如荡口、甘露、祝塘、黄土塘、北国镇，都为我军控制。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日寇抽出了较多的兵力，对东路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和清乡，由于我军装备较差，大部分部队突出重围去江北，我五十二团二营，由副团长胡品山等同志带领，跨过京（南京）沪铁路，到无锡南三乡一带开展斗争，当时部队里唱过一支名为《清乡谣》的歌，显示出我军战士高昂的战斗情绪。

“汪精卫清乡篱笆千里长呀，清乡队员牛皮吹得响，东亚和平

呀抢钱又抢粮，老百姓气死汉奸喜洋洋，鬼子兵清乡碉堡梅花椿呀，皇军老爷做事真漂亮，三光政策呀烧光杀光又抢光，鸡子牛羊还要花姑娘。汉奸呀、鬼子呀！你清乡吧，是你的血债要用鲜血来还偿，竹篱笆千里一把野火烧精光，清乡队员送他见阎王，烧光了家乡手里有短枪，同心协力、同心协力，把鬼子赶出鸭绿江。”

那时还有一首大约是从苏北传过来的有关反扫荡、反清乡内容的歌，名称已想不起来，记住的有下边两段：

“囤上的稻子黄又黄，黄又黄，大家小户喜洋洋，喜洋洋，鬼子、二黄（指汪伪军）心肠黑，偏要下乡来扫荡，得啷得儿啷，度命粮食被抢走，一年辛苦为谁忙，没得吃来没处借，怎不饿死在路旁，得啷得啷得啷得儿啷。”

“要防鬼子防二黄，防二黄，人联人来庄联庄，庄联庄，莫笑我们粗大汉，义气赛过刘、关、张，得啷得儿啷，老鼠难钻没缝墙，野狗难上太平庄，鬼子有什么了不起，看见民兵也着慌，得啷当望啷得儿啷。”

因为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间的“塘马战斗”中，三千多日寇伪军向我十六旅旅部残酷扫荡，旅长罗忠毅，旅政委廖海涛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部队的伤亡较重，我被编在四十七团五连当“小鬼班”班长，部队经常以连为单位单独活动，战斗频繁，环境艰苦，有一次我们连队住在溧阳县境内的一个村子里，村子两边相距二、三里路外的两条大路上，好几百日本鬼子向北开过，我们放在村外的哨兵三、四个小时都不敢去替换，等到鬼子走完了，才去换下来吃饭，那时部队的组织纪律观念相当好，哨兵回来一点没有抱怨或叫苦，那时部队唱一支名为《冲破黎明前的黑

暗》的歌，

“英勇的同志们向前进攻，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看，敌人将要败亡，它用全力作最后的挣扎，黎明前的困难更大，敌后的斗争也还残酷，我们是中共领导下的战士，有坚决顽强的作风，克服困难重重，我们是人民群众的武装、军民团结成铁的力量，争取祖国的解放，向前进攻、向前进攻、向前进攻，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听，黎明前的号声响了，我们要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到明天，新中国的胜利就在眼前。”

还唱过一支名为《战斗歌》的歌：

“我们涉过急流的水，越过延绵重叠的山头，在那风雪的黑夜里，在那炎炎的白昼，象钢铁样，不息的战斗，不息的奔走，奔走，解放的热血融和着自由，我们向大地，伸出了他健壮的手。”

一九四二年二月，由于部队里知识分子比较少，领导竟决定叫我这个仅仅只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到四十七团三连去当文化教员，那时的文化教员还是比较好当的，因为主要任务是教唱歌以及教一部分文盲战士识几个字，我不会识简谱，平时就到营部文教那里去“贩”一点来教大家唱，记得当时唱过一支《十月的明光》歌：因为新四军成立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份。

“敌后五年，战斗万千，新四军辟敌心胆，百战百胜。广大战场，敌后前线，唤起了广大的人民，壮大了革命雄军。反摩擦，粉碎了反共的阴谋。反扫荡，树立了全国的威名。空前的投降危机，正待我们去克服。看十月明光，辉耀着无限的光明。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坚决勇敢向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坚决勇敢向前进。”

蒋介石消极抗战，经常指挥一些军队向我挑衅进攻，为了分

化瓦解敌人，我们还唱过名为《我们本是一家人》的歌：

“秋风起、树叶黄、弟兄们杀敌在战场。我们本是一家人，祖宗世代共一庄，日落西山一块儿把牛放，鬼子杀来一起把兵当。当兵原为保家乡，决不能自己互杀伤，是鬼子烧了你家乡，是鬼子杀了我的娘，自相残杀鬼子笑，热血同胞痛心伤。大仇不报，愧为男儿汉。握紧枪杆，刺向敌胸膛，我们要团结，我们要抗战，谁要分裂，谁要投降，谁就是自取灭亡。”

还有一首向国民党军队宣传国共合作重要性的歌，名为《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

“今天大家都来想一想，大革命时代中国的情形是怎样，‘五卅’运动掀起了大浪潮，北伐军队涌进到长江，帝国主义吓得缩紧头，军阀官僚一扫光，不平等条约取消，收回租界汉口和九江，四万万同胞快得到解放，中华民族好风光，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调到四十七团一连当支部书记（当时就是副指导员），国民党顽固派派了好几个师向我十六旅部队猖狂进攻，忠救军一个团，进占溧水县方山、茅峰山后边我旅部常住的村子北经巷村，企图把我十六旅部队全部消灭，要争取什么“第二个皖南的胜利”，我四十八团部队，连夜出击，一举消灭了这个团，以后在郎溪、广德一带的反顽自卫战斗中，又歼灭了几千名国民党反动军，并缴获了较新的美式枪支“汤姆枪”和“卡宾枪”，当时文工团的同志，创作了一首名为《卡尔宾》的歌，这是一首抒情歌曲：

“卡尔宾，卡尔宾，身子轻轻只有三斤，打起点放得力又好听，美国朋友真热心，用飞机，装到重庆，指望你，打死鬼子

兵。

“卡尔宾，卡尔宾，长得漂亮真苦命，重庆把你发给反动军，见了鬼子就逃命，不要脸，反共反人民，拿了你来打新四军。

“卡尔宾，卡尔宾，不要急来不要恨，我们的同志早已下决心，山地战斗加把劲，消灭那反动军、缴了你、去打死鬼子兵。”

有一首名为《我们的英雄》的歌，是赞美人民英雄的：

“我们的英雄年轻又力壮，他好象钢人铁马，每次战斗总是由他来开路，让后续部队胜利跟进。

“身上挂满了枪弹象铁拳，碰到了蒋匪豺狼们，就象火山一样爆发，让蒋匪尸体满天飞散。

“他们不是钢铁打的人，但为了战争的胜利，才把他们练成钢铁英雄，在战斗中显示英雄。

“啊——人民的英雄，在战斗，在战斗，在战斗，在战斗，战斗到胜利的明天。”

还有一支根据苏联歌曲配的歌词，名称好象记得是《游击兵团之歌》：

“沿着高山沿着平原，游击兵团在前进中，为了战胜日本强盗，打到敌人后方。

“想起来好比常山赵子龙，能够退却更会进攻，黑夜里是我们的世界，白天里也在冲锋。

“司令长官亲自上火线，弟兄们跟着冲上前，我们的马儿高声叫喊，枪尖的刺刀闪着光。

“高高举起抗日大旗，时时都在那光荣里，英勇抗战全国展开，最后的胜利在前面。”

还有一首名为《当兵把仇报》的歌，是为了动员更多的同志

来参加新四军，共同打击日寇：

“人心有血，黄海有潮，潮涨浪涛高，血战志气豪，日本强盗进了门，烧你的房子割你的稻，屋子烧光，家破人亡，海样深仇怎么报？嗨，亲爱的同胞们，掂起钢枪，插起刺刀，当兵把仇报，打了胜仗父母妻儿都还乡，打了胜仗父母妻儿都还乡。”

有一支名为《游击乐》的歌：

“肩上挎着枪，手榴弹挂胸膛，挺着个胸脯儿前进前进，草帽儿挎在肩梁上，爬过了万重山，渡过了大小川，搜索着敌人前进前进，好也似猛虎下山岗，见敌人，莫惊慌，急忙队在大路旁，找目标、瞄准放、乒乒、乒乒乒，打得敌人发了慌，丢下子弹和军粮。你拿枪，我拿粮，唱只歌儿进村庄，汗淌淌，乐洋洋，唱只歌儿进村庄。”

我十六旅部队，在一九四三年九月间的一次战斗中，于郎溪、广德地区一举消灭日寇二百多人，缴获了一门九二式步兵炮，象这样的炮，行军携带很不方便，我们把它暂时埋在一个山沟里，日本鬼子为了找回这门炮，挑了一担汪伪钞票，向老乡们说：“只要你们那个说出藏炮的地点，就把这担钞票送给这个人。”但是老乡们狠透了这些日本鬼子，知道了也不肯说，找了十多天，也没有把炮找到。以后，我军在打浙江长兴县合溪镇据点时，我们把这门炮用上了。伪军一个营长守的那个碉堡，一见到我军把炮口对准碉堡要轰，就大叫“不要打啦，我们缴枪”，一炮未打，缴获了一营伪军的人枪。

在抗日游击根据地，广大民兵的配合作战也是十分重要的，象反清乡时，烧敌人的竹篱笆，侦察敌人据点里的情况，很多都是民兵同志来担任的，因此许多地方，常开民兵英雄代表会，予

以表扬鼓励，在有次民兵英雄会上，文工团的同志唱了一支名为《张家姑娘要陪送（苏北话的意思是张家姑娘要找对象）》的歌：

“张家姑娘要陪送呀，爹爹送她个大马桶，马桶漆得红又红呀，马桶盖，包的铜、马桶箍，箍的铜，哎呀呀得儿喂，张家姑娘看不中，哎呀嗨。

“张家姑娘要陪送呀，哥哥送她一个自鸣钟，两个小孩儿搬不动呀，左盘弄、右盘弄，会唱戏响叮咚，哎呀呀得儿喂，张家的姑娘看不中，哎呀嗨。

“张家姑娘要陪送呀，红漆马桶看不中，也不想要自鸣钟，张姑娘，爱英雄，说出来又怕脸红，哎呀呀得儿喂，一心想嫁给民兵英雄，哎呀嗨。”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们进军浙江天目山，又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以及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九四五年八月份，我们集中许多兵力，分别对溧水、高淳县的东坝、漆桥等许多敌伪军据点展开猛烈攻击，一夜间，消灭敌人几千名，正在这时，听到了日寇投降的好消息，随即解放了句容、舍坛、溧阳、溧水等几个县城，由于日寇按蒋介石的反动命令，不向我军缴枪，所以像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在一九四五年没能得到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表示我党的和平诚意，我江南新四军部队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奉命北撤，以后在苏北参加了解放战争，下面就以《新四军万岁》这首歌，作为这篇回忆录的结尾：

“辽阔的东方，古老大地上，解放的烽火燃遍了城市、乡镇、田庄。皮鞭激起了切齿的愤怒，创痕迸发出血的反抗，像初

升的太阳，翻滚起汹涌的狂澜，爆出革命的花朵，千万双劳动者的拳头，交织成一只钢铁的拳头。多少叛乱的凶手，在我们刺刀下毁灭，多少敌寇，在我们刺刀下尸骸成山，不断的战斗，不断的战斗，战斗，战斗，在战斗中生长，在战斗中生长壮大，今天啊，新四军的战旗飘扬在大江两岸，新四军的武装是华中的栋梁，新四军的名字深刻在人民的心上，人民向他欢唱，新四军万岁，新四军万岁，人民的武装永远不会灭亡，钢铁的力量越打越坚强。新四军万岁，新四军万岁，新四军万岁万岁万万岁，新四军万岁，新四军万岁，新四军万岁万岁万万岁，新四军永远照耀在祖国的大地上。”

神兵夜袭阳明堡

汪 乃 贵

（全国政协委员、原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一二九师除一部分脱离建制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七六九团、教导团、骑兵营等单位共九千一百六十余人，在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副师长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下，开赴正太路南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九月三十日我们师由陕西富平县的庄里镇地区出师抗日。在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经山西候马，师先头部队七六九团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进抵太原。此时，经雁门关南犯的敌人已占领了代县、原平，正向忻口进犯；经保定南犯的敌人已占领了石家庄，正向娘子关进犯，这时太原已处于晋北、晋南两路敌人的钳击之中，形势非常危急，晋察冀边区已为敌后。

师奉命指令我七六九团向原平东北地区挺进，执行以侧击南犯敌后的任务。出发前，师首长命令我们先破坏敌人的公路，截断敌人的交通。由于事先没有发现和掌握敌人情况，当我们团到达指定的地区后，发现代县、阳明堡、崞县等处都驻有日本军队，并以阳明堡机场为其前进机场，集中大批飞机轮番出动，对忻口

国民党作战。并严重威胁着太原。根据这一新情况，团长（陈锡联）、参谋长（范朝利）和我（当时是副团长）等同志经过研究，认为不把此敌消灭是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的，因此决心扫除这一障碍，拔掉这颗钉子，袭击敌飞机场。我和团长、参谋长等人于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到阳明堡机场的滹沱河边我方一侧进行现地侦察，从望远镜中把飞机场周围的地形、机场情况看得很清楚，经过周密研究果断地决定，于当天夜晚突然袭击阳明堡飞机场。随即制定了战斗布署，由我指挥三营袭击机场，一营钳制崞县增援的敌人，二营（欠七连）为预备队，并以第八连破坏王董堡的桥梁，保证第三营后方的安全。

吃过中午饭后，我带第三营营长赵崇德、教导员潘寿才和各连连长、指导员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协助下，化装成老百姓混在修飞机场的民工中，对敌人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和群众一起徒步，从寒冷刺骨的滹沱河中过去，到离机场很近的地方进行现场侦察。这时机场全景就在我们眼前，二十四架飞机停放为三列横队，每列八架，驾驶员下飞机后就坐上汽车送到阳明堡去了，沿机场边沿跑道有一条很深的地下战壕，内有二百余名守敌，在停机坪处敌人警戒松懈，在崞县进入机场的公路要塞门口，敌人警戒检查很严，是不易进入的。

我们回到营驻地已下午三点左右了，马上召开了营连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情况，及我部队的思想情绪，并召开了党的会议，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树立敢打必胜的决心，提出了要为抗日打好第一仗，要为中国人民和工农红军争光的战斗口号，随后各连进行了战前动员，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分析了我们能够完成此次任务的有利条件，从而大大提高了

战胜敌人的决心。但我们没有打飞机的经验，我们发动全营指战员对如何完成这次袭击敌机场，动脑筋，想办法，个个出谋划策，集思广益。在军事民主会上有的说把柴搬进机场用火烧，有的说弄点汽油往飞机上一泼，用火一点就烧掉了，有的说干脆用机枪打，有的说用手榴弹炸，一条条具体建议提出来了，最后决定用五个手榴弹一捆，放进飞机肚子里爆炸。经过反复细致的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总的指导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敌人要害部位，在战术上要灵活果断，沉着勇敢，以猛烈的火力突然向敌发起进攻，以达到机毁人亡的目的。具体部署机枪连用两个排在机场战壕的两个出口，压制壕内出来的敌人，一个排封锁停机坪敌必经之道，以保证爆破连的安全，一个连封锁明阳堡增援之敌。两个步兵连由营长赵崇德同志率领，用手榴弹炸掉敌二十四架飞机，这两个连分四个组，每组八小组，分别对敌机三横列八架，一大组作预备队。

十月十九日晚十一点左右，当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正是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特点的难得时机。我令三营长赵崇德率全体英勇善战的指战员从周家庄出发，偷渡滹沱河，秘密进入敌机场。由于这批驻敌在那里从来没有受到过威胁，因此站岗放哨的很麻痹，守备很松懈，当官的和当兵的在寒冷的深夜早就钻进被窝里睡大觉去了。我们的先遣小组，进入机场后，把敌哨兵非常巧妙的就搞掉了。部队进入机场后，敌人还没有发现。这时机枪连迅速抢占位置，封锁战壕出口处，赵崇德率领的两个爆破连冲入飞机停放位置，立即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肚子，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敌人从睡梦中惊醒，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正是

他们的末日来临。我们的战士面对凶恶、残忍的敌人，毫无惧色，打得非常勇敢，守备的二百余名敌人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白刃格斗。激战一小时左右，炸毁敌机二十四架，歼敌守备部队一百余人。这时敌人的一个装甲车队紧急增援阳明堡机场，而我营已完成预定的任务，我立即命令迅速撤出战斗，转移到指定位置待令，在转移中，营长赵崇德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部队，而光荣牺牲，年仅二十三岁。我伤亡三十余人。以机动果敢闻名全国的夜袭阳明堡敌机场的战斗是我们师奔赴抗日前线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我们八路军第一次炸毁敌机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使猖狂进攻急欲夺取忻口的日本鬼子，丧失了空中突击力量，打乱了敌人进攻太原的部署，使其不得不以相当兵力加强其后方的守备。这样就大大牵制了进攻太原、忻口的敌人。这一伟大胜利是与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在晋北的积极作战相配合的，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全国军队对敌后游击战争重要性的认识，鼓舞了全国抗日的民心士气，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望，打掉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气焰，为全面抗战打开了局面，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一定能够胜利！

赵崇德同志是河南商城余店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就缺衣少吃，受尽地主的欺负压迫，过着牛马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藏着仇恨的种子。

一九三一年工农红军来到了他家乡，这次他看见来他家的兵与他心里想的“兵”不一样，他看他们帮穷人扫地，挑水，不抢粮，不偷鸡，和穷人说话，当官当兵都围在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慢慢的他才知道这就是专门给穷人打鬼子，给穷人整狗财主、为

穷人求生路的，是朱毛领导的工农红军。他二话没说，坚决要求当红军，入伍后，他刻苦练习打枪、站岗、甩手榴弹、刺杀等本领，在行军中不怕苦，不掉队，打仗不怕死，处处要求打头阵，因此到部队很快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学会了不少的军事技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一九三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

从他当班长到营长期间，他虽然很年轻，但他善于勤奋学习，勇于吃苦，不管在日常工作中还是指挥打仗都有一套，他和干部战士团结得很好，他爱护下级，下级很尊重他，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苦，共患难，部队到哪里他就和那里的地方群众、干部打成一片，马上和地方政府开展工作，他经常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因此，群众很信任他，有什么心里话，有什么重要消息都很快告诉他。

他谦虚谨慎，尊重上级，重大问题，都要请示报告，互相商量，他心中时刻装着党，平时他对党、对人民忠诚坦白，战时他愿把生命献给党。他作风正派，从不搞拉拉扯扯，对于党的事业有害的思想行为他坚持真理，进行斗争。在每次战斗中他都反复周密的审批每个作战计划，尽量使部队少受损失，多杀敌人，他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特别是这次夜袭敌机场战斗中，他深知这次战斗意义重大，要完成这次任务的光荣和艰巨，所以从每一个战士的鞋带记得紧不紧，到每个手榴弹捆得好不好都一件一件检查。在战斗中，他带领爆破连冲在最前头，爬上飞机打坏玻璃窗，把炸弹丢进机舱，炸了一架又一架，直到二十四架全部炸毁了他才转移，后撤。就在转移的危险关头，干部战士

坚决要他走，但他坚持掩护，直到部队转移到了安全地方，他才停止了心脏的跳动，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曾举林整理 一九八〇年八月一日）

和邹子侃、何觉人同志 一起坐牢的日子

庄 启 东

子侃和觉人是当年我们在国民党杭州陆军监狱坐牢时的战友，他们牺牲已经四十八年了，但他们的形象和风貌，却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一)

大革命失败后，尽管蒋介石实行了白色恐怖，但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爱国青年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灰心，相反地更激起了他们的反抗。爱国学生眼看敌人的屠杀，书再也读不下去了，都想去参加革命，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邹子侃同志就是在这个浪潮中参加革命的青年。

子侃同志是杭州一个中学的初中生，为了革命，他毅然抛弃了比较舒适的家庭，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不久，他就加入了共青团，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他被捕后被关在国民党杭州陆军监狱的时候，还只有十六、七岁。他高高的个子，沉默寡言，他那带有腭腭的脸上显得坚定。在杭州监狱中，有许多

烈士英勇就义，特别是张秋人同志和胡公达（徐玮）同志的牺牲，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秋人同志是当时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他知道自己被判死刑时，却更加勤奋学习。他常说，他活一天要学一天，好好宣传共产主义。他就义前，在敌人的法堂上，曾一手拿起堂上砚台向法官打去，最后又高呼口号，英勇就义。胡公达同志是浙江省共青团书记，牺牲时还从容地高喊：“灰色马的铃已经响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显然，他生前读过库布林的《灰色马》。这是我们当时都看过的俄国小说。这些烈士牺牲了，使我们更懂得活着的人要加倍努力，继承革命的遗志，才活得有意义。

当时子侃同志和我们一样，思想上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真正的革命目的是什么？怎样进行革命？为了解决这些革命真理问题，我们一起认真读起书来。这些书先由子侃的妹妹帮助，送些公开的社会科学书籍来。以后设法买通看守（当时这些看守都是旧社会的牢头禁子，只认得钱）偷偷送进来报纸和一些马列主义著作、苏联小说等书籍。

当然，这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子侃他们先用很高的报酬，叫看守偷偷买点酒。看守认为，犯人喝醉酒最多发点酒疯，自己担不了多大风险，何况还能赚点钱呢。这步做到以后，又进一步叫他买纸烟和火柴。虽然狱中不准带火柴，但他既然已违法买酒，也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了，好在赚钱更多。再接着就要他买报纸，这是带政治性的事了，当然价钱更高，一份《申报》或《新闻报》要一块钱。从此，就转到送各种“违禁”书刊和帮助与外面的朋友取得联系了。这在当时大家学哲学中，认为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好例子。

(二)

子侃同志革命热情很高，但他比其他青年冷静，他看社会科学书籍多于看文艺书籍。因此，他似乎比我们同年的人，甚至比
他年长的人都要显得老成，这一点，和他的年龄相比似乎有点不相称。

子侃同志在我们年青人中间有很高的威信。平时说话不多，该说话时很简练、并显得有份量，他渐渐成为我们中的一个领导者。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际，我们到了特别反省院（陆军监狱范围很大，四面高墙，里面有三个监狱，即：陆军监狱，特别反省院和以后设立的“东监”。政治犯牺牲时，也是在里面刑场执行的）。子侃同志和谢芬、徐天仁（洁生）同志等一起提出，蕴酿成立党的秘密组织，使狱中有个核心的领导，把大家组织起来，稳定大家的革命情绪，以便更好的与敌人斗争。

当时党组织主要抓对读书的领导。组织生活也主要是读书。规定上午读社会科学，下午看文艺书或学外文。有几本书是每人必读的，记得其中有列宁的四本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晚上还组织座谈。

这些书的来源，除了通过上述途径外，还通过合法途径。当时特别反省院允许看一些他们规定的书，但买书要由监狱负责人批准（盖公章）。我们就利用这一点，用铅笔开一个当局允许买的书单，待批准回来，把原书名用橡皮擦掉，再用钢笔写上真正

要买的书名，看守们看到经过批准的图章，就准许拿进来了。后来当局不许用铅笔开书单，我们又设法只写一半书名，如先写《叛徒考茨基》，批准后，前面再添上《无产阶级革命与》几字。当然，“马克思”、“列宁”的字样是绝不能写的。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比较容易批准，于是河上肇的《社会革命和社会组织》（商务版）也就买进来了。

上海当时有一个书报流通社，可能里面有我们的党员，他们经常把新出版的图书目录寄给我们，使我们及时知道外面新出版的书。有些书不写列宁著，只写乌里扬诺夫著，就较易被批准买进来。这个书报流通社可以代我们购书报，也可以稍用点押金给我们借书。我们那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开始只懂得一点，还有许多看不懂，但还是硬看下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始时看蔡和森同志的节译本《社会进化史》）比较通俗，差不多大家都看过。大家特别感兴趣的是看苏联小说，《一周间》、《铁流》、《毁灭》、《十月》等。当时，由于我们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和苏联小说，非常向往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中的邵林书（崔晓立）同志和后来入狱的王日清（张崇文）同志是从苏联回来的，他们带来的《杜娘歌》等，我们差不多人人会唱。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杜娘是什么样的人，只是对苏联的崇拜，感到苏联人可爱罢了。还有一本奥格涅夫的《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日记》，其中有一段说到一位女共青团员向往中国，她想偷越西伯利亚到中国来参加革命。这使我们对这位从来不曾见面却又感到熟悉的苏联姑娘十分敬爱。同时也使我们感到自己直接参加了中国革命是多么的光荣！

那时学习外语的人很多。多数人学英语或日语，个别有学德语的，也有学世界语的。我曾经和薛雨霖（薛暮桥）同志、徐梅君（徐雪寒）同志和杨成同志等学习过世界语。我们有一个学习世界语小组，薛雨霖同志是我们的组长。我们参加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学习，这个学校定期寄给我们讲义，每周都有练习题，我们每人都做练习，最后集中在薛雨霖同志那里，由他选择、修改成一份标准的答案寄出去。毕业时，还有一次考试测验，薛暮桥的作文《牢狱生活中的一页》受到函授学校好评，曾在世界语学会的《绿光》杂志发表。我记得还让把一篇德国著名作家梅里美短篇小说《火銃》（世界语译文）译成中文，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对我们的学习成绩是有很好的评价的。

特别反省院分东、西、中三弄，轮流放风。轮到放风那弄的人，可以走到另外两弄的弄口，隔着铁门和里边的人交谈，但不允许走到外面的操场去。只有当外面有人来探监时，才可以走出外面的铁门去会见探监者。

虽然狱中很艰苦，但是充满了乐观主义。有一次，我们自己组织一个娱乐演出。在东笼门口搭一个台，大厅里坐满人，各人自报节目。连老年人唐公宪、徐白民（大革命时的共产党员，曾任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都来参加观看。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大兴同志唱兰溪高腔。陈敬森同志演得最卖力气，他把所有的拿手好戏都拿出来了，引得观众哄堂大笑。

（三）

由于狱中生活环境恶劣，许多同志患了轻重不等的脚气病。

东弄有一个鲍照光同志脚气冲心，病死了。这使我们大家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要关到什么时候才能出狱？自己会不会也死在狱中？大家就自动绝食了。邹子侃同志他们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研究并经大家讨论同意，向典狱长提出三条要求：（一）要求宣布刑期（当时在特别反省院的囚犯，都没有公开宣布过刑期）；（二）有病的允许保出监外治疗；（三）改善监牢生活。这是我们第一次绝食，并取得了胜利。敌人很快作了答复，除第一条要向上级请示外，其他两条都同意。这样，我们三弄同志都可以到大厅长桌上吃饭，也可以在外面生起炉子做点菜。有的病人也曾保出去，到外面治疗。

典狱长是一个老奸巨滑的老政客，他对第一条始终不作具体答覆。而且对政治犯的歧视、迫害越来越厉害。于是，我们组织上就决定第二次绝食。这次绝食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子侃他们先在我们内部作充分的思想酝酿。子侃指出，敌人迫害越来越严重，照此下去，敌人就随时可以找借口杀害我们，因此，必须斗争。而我们唯一的斗争武器就是绝食。

为了保证绝食的胜利，绝食前，组织上动员大家秘密地储备了一些杂粮。这工作很细，既要公开买东西（或者叫家里送东西），又不能暴露。我们笼子里准备的炒面，牛肉干就是分开陆续地买来肉和面，利用放风时间分工在炉子上做成的。子侃对这项工作还作了细心检查。组织上还宣布了绝对保密等几条纪律。

在准备工作进行的同时，就寻找发动绝食的时机。一天，一个犯人从稀饭里吃出了一条蜈蚣，于是组织上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要当局保障我们生命安全，反对迫害，追查迫害者；进一步改善生活，要求在操场上作操，锻炼身体。并且要立即答复我们

提出的要求。当局迟迟不予答复，于是我们宣布绝食了。整个监狱寂静无声，好象空庙一样。瘦矮个子，脸上长着青筋的李士青和一个长着麻脸的高个子汤浩两个看守一起来了，这是两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他们又是谩骂又是嘲笑。但是我们根本没有人理这两条走狗。他们觉得没趣，叫了一阵就夹起尾巴走了。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依然这样寂静。大部分人都只喝点水。一个长着日本式胡子的朝鲜医生来了，他出于自己的职责，劝我们一面吃饭，一面谈判。他是有些同情我们的，我们向他说明绝食的原因，并对他的劝说婉言拒绝。外号叫“滩簧”的典狱长终于亲自出马了（“滩簧”是浙江一种民间曲调，由于典狱长的声音像唱滩簧的，我们就奉送给他一个“滩簧”的雅号）。

“滩簧来了！滩簧来了！”有人悄悄地通知大家。但他只来回走了一遍就回去了。

第三天绝食继续进行，典狱长忍不住了，只好同意追查凶手，笼子可以整天开放，并允许到外面操场作体操活动，由一个体育教员教体操。其他的问题等上面批示以后再解决。绝食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子侃他们同意结束绝食。

（四）

绝食结束以后，子侃分析，敌人答应的条件是缓兵之计。大的斗争还在后面。果然，敌人很快把认为能闹事的子侃、杨成、徐梅君（徐雪寒）等几十位同志移解到别处去了，同时把特别反省院的人全集中到中弄关押，规定不许和外面通信、接见。除了我们事先藏在地板下的书籍外，其他书籍也被抄走了。但我们斗争

并没有停止。我们又重新组成支部。继续抓紧学习。晚上，在暗淡的灯光下，由李政（骆耕漠）同志讲政治经济学，方在（方土人）同志讲辩证法。另外我们也继续锻炼身体，每天早晨操“八段锦”，操完“八段锦”就唱国际歌。然后吃早饭、看书。这时看书已成非法，要有人放哨。后来又想出办法，把一块破碎的镜子片放在送饭小洞口上，监视看守的行动，然后从地板下拿出书来看。有时候看守突然来抄笼子，我们就能发现，马上把违禁的东西藏起来。使看守毫无所得。

敌人进一步压迫我们，把朱深（朱楚辛）、方在（方土人）、徐士彬和我四个人解到模范监狱的禁闭室去。我被禁闭在一个像大棺材一样的木笼中，没等全身站立起来，头已碰到顶板，站不直只能曲着身子躺着。门上有递饭的小洞口，从这个小洞口透进来的微光中，看到木板墙上有许多字迹：有“不到此地非好汉！”也有写着“某某人某月某日到此一游”等，显然这是许多曾经在这里囚禁过的人写的。我也摸到一根小钉子，在壁上刻下“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字样，一天，我从送饭的人的动作中，估计离我不远还关着人，就在小洞口叫起来：“喂！喂！我在这里呀！”结果是朱深和我答上了话。我俩在这里谈起话来，真是天大的乐趣。原来，朱深也和我一样被囚在另一个像大棺材一样的禁闭室中。而方在、徐士彬则被禁闭在另一种只能坐、不能站的禁闭室中。大约一星期后，我们四个人才从禁闭室中放了出来，又被解到特别反省院。

不久，子侃、徐梅君、李政等也从别地解了回来，关在特别反省院的东弄。难友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原来他们被解到吉祥岭普通反省院关了一个时期。在那里与其他“囚犯”间，都互相

隔离开，什么书籍都不准看，唯一有文字的东西是“无敌牌”牙粉壳子上的广告。

子侃他们分析：“滩簧”用他的职权把我们解来解去，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可能还有更大的阴谋，后面的斗争将更复杂。事实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有一天吃晚饭，有人从稀饭里吃出碎玻璃，东弄的同志放下饭碗又准备绝食了。晚上十时左右，“滩簧”紧急命令，把普通反省院一部分人（有些人是应该很快就出狱的）和特别反省院一部分人（主要是东弄）都解押到陆军监狱。子侃、梅君、李政等又被解走了。我和朱深等仍暂押特别反省院。

镇压更严重了。在陆军监狱敌人开始用肉刑，把我们的同志提到大厅，用藤条鞭打，各党的同志抗议愈厉害，他们就打的愈凶。接着，敌人使出最后的手段，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敌人枪杀了我们十九位同志。刑场就在陆军监狱内，我们在特别反省院也听得非常清楚，高昂的口号声，随着一阵阵枪声，我们根据声音一个个计算着牺牲的战友人数，烈士鼓舞着我们继续战斗。

（五）

不久，敌人将特别反省院取消了。大约在一九三〇年九、十月间，朱深和我被解到陆军监狱。一到陆军监狱，子侃找我和叶厥骞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不久，敌人又设立“东监”，把狱中党支部书记徐建三（徐迈进）同志和王日清（张崇文）同志等押解到“东监”去。徐建三同志等走后，邹子侃同志担任陆军监狱中共支部的支部书记，何觉人任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张庆祥

任军事工作委员，叶樟树任群众工作委员。

子侃做的工作很多，他既做军事犯的工作，又做工犯（在监狱里做工的犯人，可以在监狱中来往）和看守的工作。他时常在放风时，钻到军事犯的笼子里去，有时为了做政治思想工作，就在那里过夜，让军事犯换一个人到他的笼子去住。看守晚上点人数，仍然一个不差。他曾经介绍一些军事犯入党。记得有一个年青的军事犯叫谭纪中，释放后就为我党工作，以后又进陆军监狱，已变成政治犯了。我们也同样做军事犯和其他盗匪犯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人渴望学文化，我们就教他们文化课。我曾经教过一位大赌徒学文化。他有这样的本领：每一付牌，只要他玩过四、五次，他就能从牌的背面纹路上认出这些牌。他不认字，但记忆力特别强，我教他一课书，只教一遍，就都记住了。还有一些年青的逃兵，思想上也都比较容易转变。

（六）

有一天，子侃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支委会上提出要越狱。讨论中有两种意见。子侃是很民主的，他让大家充分讨论发表意见。张庆祥、叶樟树和我认为应该越狱，但是现在条件不成熟。特别是张庆祥同志从军事观点上分析，要打出这个监狱，有几道大门。如果没有大量军事犯协作，争取看守中立和卫兵的同情，是打不出去的。打出去后，没有外面党的接应，也是不能成功的。子侃和觉人则强调别的地方监狱都越狱成功了，特别指出福建越狱的成功（当时报上都登载了）。他们认为现在军事犯争取得差不多了，也有一定数量的看守同情我们、工犯大多能帮助我

们工作，卫兵工作虽然还刚刚开始，但也不能样样都做好了才能动手。至于打出去后，外面党有指示，向浙西跑。二种意见争论很激烈，最后没有结论，说要向“外祖母”（外面党组织的代号）请示后再决定。据说原来支部也一样有两种意见。原支部书记徐建三（徐迈进）同志和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其他也有同意子侃他们的意见的。因此，子侃还是要继续干。我们同意加紧做军事犯、工犯工作，并设法到卫兵中去工作。子侃和觉人都亲自秘密地干着。

意外的事发生了，工犯姚金宝（是‘军事犯’当‘工犯’）向当局告了密，将子侃一封密写的信（用代号写的信）交给了“滩簧”，子侃马上被从甲监调到丙监。为此，支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估计密信的内容，“滩簧”不可能明白，但我们应立即和子侃脱离接触，同时设法告诉外面子侃的妹妹。这样对他和支部都有利。不料子侃还有些事情托觉人办理，觉人设法到丙监子侃窗口去找他当面谈，被一个看守看到，又告诉了“滩簧”，结果觉人也被禁闭起来了。敌人虽知道中间有什么事，但始终查不出真实证据，不知子侃、觉人要干什么。“滩簧”亲自审问子侃，子侃出其不意将“滩簧”脖子掐住，而敌人已经红了眼，宁可错杀，决不轻放。子侃和觉人终于在一九三一年秋牺牲了。当时他俩还只二十来岁。牺牲前，态度从容，子侃还学秋人烈士，抓起审判官桌上的砚台向审判官打去。他们响亮地喊着“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一阵枪声把他们的口号声掩盖下去了。他们没有死，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囚 日

尚 钱

一九二八年的春节，根据豫南特委的决定，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河南省罗山县，准备在那里搞一次暴动，以支持河南的革命主力。我的爱人和三个孩子也都住在这里。国民党驻罗山县的是杂牌军任应岐的部队。

县城里有一些想霸占我家财产的亲戚，他们看我从外边回来了，就想陷害我，所以，我刚回到家乡，他们就勾结了任应岐的人，把我逮捕了。

因为我在豫南特委宣传部和罗山县委组织部担任工作，所以，国民党省党部知道我被捕以后，就给县党部发来“就地枪决”的电报。但是，电报局张局长是我父亲生前的朋友，他看到电报之后，马上通知了我的伯父。我的伯父尚衡浦是县里的大绅士，又是医生，还是罗山县红十字会会长。他让张局长先将电报压住，待他将我活动出来以后，再将电报交给县党部，于是他花了二千多块钱设宴请客。请来了旅长赵青山和营长等一些重要人物。在酒席进行当中，我伯父向赵要求，让我回去。把我带去，赵青山当众把我训斥一顿，说我年轻的搞什么共产党。当时我一口

咬定，我没参加什么共产党。赵将我训斥之后，让我坐在旁边。酒席散后，就让伯父把我领走了。

在出来的路上，伯父摸出二十元银洋给我，要我当夜离开罗山县，因电报局的张局长已把电报拖了一天一夜，不能再拖了，估计电报一到县党部，当夜就又会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银洋暂避到一个远房妹妹家，她的哥哥也是地下党员，还是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的支队长。我在她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就挑起水桶，妹妹拿着筐子，装做去洗衣服，送我出了东城门。我走后，妹妹又装做洗完衣服挑水回家的样子，去通知我的爱人。因为我的爱人陈幼清同志也是地下党员，我的家就是个秘密联络点。

我出城后，顺着万羊店方向，到我爱人娘家去了。在她家只住了二三天。一天，她哥哥从潘辛店回来，说：“有个绅士问起你在不在这里”。估计敌人已经知道了我到这里的消息，我必须赶快离开。第二天早上，我爱人的弟弟老三和老五送我越出了河南边境，在湖北的花园车站上了去汉口的火车。后来，我又换船到了上海。

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当时出版了我参加革命之前写的两本书，《病》和《斧背》。他们还约我写东西，并预支稿费给我。这一年，我患了肺病。于是，我决定到杭州养病，并给河南省委写了密信，请他们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来。我在杭州边养病，边等组织关系，同时为泰东图书公司写书。

由于我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在家信中暴露了我的地址，被家乡的敌人告密。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杭州国民党军警突然闯进我的住所，说是他们的什么头头请我谈谈。就这样，我又

被捕了。

我被关进杭州国民党公安局的拘留所，那里已关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他面色青黄，有些浮肿，显然是一个积劳成疾者。他先是一言不发的看着我。到了中午，看守们休息吃饭去了，他忽然问我：“你是什么案？”我答：“不知道。”他又说：“不必问，是政治犯。”我警惕地回答：“我不知道。”他沉吟了一下，然后又用更低的声音说：“没有问题，你是政治犯！”我很紧张，只听他又说：“我有几句话请你记住：是招，还是不招。要招就招到底，招到底也不一定能活命。你要不招就硬到底！硬到底也不一定不能活命！”这时看守又走过来了，他沉默起来，把头放在枕头上，假装睡着了。

快要睡觉时，我瞅着没有人，又问他：“我应该怎么办？”没想到他只回答我说：“睡觉，睡觉。”我一抬头，发现看守又走了过来，我看到看守们在我们这个笼子外边走来走去，我只好沉默地等待。又过了好一会儿，在看守的注意有所转移时，那个人抬起头来，压低声音告诉我：“少说话！你的时间不多了，你必须赶紧准备口供。口供必须尽量想得圆满些，要自始至终不改！”说完，他睡了。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反复考虑着他的话，并准备了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口供。

第二天，看守开门进来说：“上午局长请你吃饭，现在就去。”随即把我押到一间客厅。客厅里已经摆好了一桌菜。起身迎接我的有省公安局、国民党省党部，特种刑庭的负责人等五、六人。他们装出很客气的样子，请我坐下。公安局长便说：“我们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意思，请你吃饭，大家认识一下，谈谈你的过

去和未来的工作。”然后又加上一段明显诱惑的收买说词，什么“你正年轻有为，前途远大……”等等。接着，便让我谈，我说：“谈什么呢？我是个写小说的，只能谈些小说的写作，别的我就什么都不懂。”有个人说：“不必客气，你很懂政治嘛！”我当即回答：“我从来不谈政治，也厌恶政治。前年，去年，我接连出版了两本小说，可以代表我的思想，我很欢迎你们批评，请你们看看。”另一个人狡诈地说：“你的书我看了，有表扬，有批评，这就是你的政治观点，怎能说不懂政治？”稍停了一下，他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请你谈谈，谁都知道，我国有两个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你认为哪个党好呢？”我回答说：“我从来不问政治，对于党，我也从不研究，因为我对其不感兴趣。”他又追问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总有点比较吧？”我立即回答说：“对共产党我不了解，对国民党，我倒有点意见，为什么呢？我只不过写了几篇小说，没有骂过什么人，也没有得罪什么人，你们凭什么剥夺我的自由，突然把我抓起来呢？这还有点民主、自由的意味吗？你们说共产党坏，是“匪”，他可没有抓我，不让我写小说呀，叫我根据什么辨别是非呢？”那些家伙一时无言以对。一个家伙忙岔开我的话题说：“不要光谈论了，来来，大家都喝几杯，吃点菜，润润喉咙……”这家伙把杯子举到我面前来邀我。我知道，这是妄图灌醉我，我恭敬地表示谢意：“很对不起，我在礼！”有个人说：“今天是好日子，大家都很高兴，喝个杯把两杯没关系，来，来来！”但是这种劝酒的包围形势，对我没起作用，被我拒绝了！敌人的饭，我吃了，但他们并未因此对我客气。饭后，又把我押回了拘留所的笼子里。

到这时，我发现他们还没有掌握什么证据能证明我的共产党

员身份。这使我更有信心对他们进行斗争了。我很明白，请我吃饭，只不过是他们审讯的一个开始。

不出所料，请客第三天，就把我押送到侦缉队。敌人用铁链子把我锁在一个套间的床腿上，动辄，都得请批准。即使上套间里面的便所，也是如此。

第二天，我被带到审讯室，屋中约有十余人在座。在一个长条桌案后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嘴里衔着小旱烟袋，不时用手捻着小胡子。他先问了我的姓名、籍贯，然后便沉下铁青的脸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共匪的？”斗争开始了，我按准备好了的口供回答：“我从来不问政治，更没有加入过任何政治团体。”小胡子狰狞地笑了，然后他时而威胁，时而恐吓，但不管他怎么问，我都是这一种答案，最后他把眼一瞪，拍着桌子吼道：“看来，不给你一点颜色看，你是不说实话的！来人！”

爪牙们把一个约米半长的坚实木凳抬到屋中间，把我推坐在凳上，用绳子把我的大腿牢缚在凳子上，然后往脚跟下垫砖，同时又用另一根绳子把我的两手腕捆在胸前，把捆住的双手拉向脚尖，绳子通过凳下的滑车向上拉，这还不算，他们看我不说，又让两个大胖子，将两根二米多长的粗木棍，对我进行压杠子，还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向后扯。我感到筋断骨裂的剧痛，开始时，我还能愤怒地挣扎着反抗，但在一阵昏晕中就失去了知觉。劈头盖脸的冷水又把我浇醒，不知何时，我又被押回牢房了。我身体本来有病，经过野蛮的折磨，更加虚弱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敌人见我身体有所恢复，又把我绑上了老虎凳，小老头以为我会害怕了，口口声声说：“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是共匪。”还说什么“看你年轻轻的，只要坦白了，可以判轻一

点。……”等等。我当时一口咬定我只是写小说的。并义正辞严地指责他们折磨一个无辜青年的匪徒行径。当我说到：“你们既掌握了证据就枪毙我好了，你们这样伤害我，社会会惩罚你们的。”刽子手们被激怒了，大胖子竟然坐到了交叉在我小腿间的粗木棍上，跳动着，一阵剧痛，我又失去了知觉。

又过了十几天，我第三次被押上老虎凳，这时我的身体已经很衰弱，支持不住了，刚开始用刑，我就浑身颤抖，感到脸上的血在麻麻扎扎的下沉，晕眩来的更快了，小老头见我体力不支，以为我的决心也会被动摇了，他忽而停止了用刑，过来对我说：“我们估计，你也犯不了什么大罪，如果你犯有什么小罪，你就说出来，我们也好交差，你也可以得到开释”我声音微弱，语句断断续续，但我始终说的是：“我没有罪，我从不谈政治……”。我张开疲乏的眼睛，发现桌旁的一个青年书记员正和小老头彼此使眼色，然后，书记员对我提问说：“你知道有人告你吗？”我答：“不知道。”他又问：“你有仇人吗？”我说：“我没得罪过人，”他说：“包括你家乡的人。”我这才明白被捕的原因是家乡有人告的密，因而我就把家乡亲属中有人看我父母早亡，想要谋夺我家的土地一事告诉了他们，并说现在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小老头听完我的解释，突然厉声喊道：“你不要瞎扯，要老实坦白，你是不是共产党杀人部的部长？在信阳同一个姓苏的专搞杀人勾当？”我知道，他们这是指一九二七年冬，我在信阳工农革命军六大队四支队任党代表时，地方苏维埃政权处决过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党代表要在处决的布告上签名。姓苏的肯定是他们对“苏维埃”一词的误解。“杀人部”的提法也不像是真正知情人的用词。看来，告密陷害我的人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于是我抓住这一点，

反击小老头说：“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也不认识什么姓苏的，更不是什么杀人部长！你们看我像个杀人部长吗？‘杀人部长’这样的官名有哪个党用过呢？共产党会用这样的官名来吓唬老百姓吗？很明显，你们是受了坏人欺骗。坏人利用了你们的无知，来借刀杀人。你们既然甘心当他们的枪，甘心做残害青年的刽子手，就枪毙我好了。”我说这些话，虽然，气力不足，声音微弱，但是敌人却在认真地听，而且弄得他们哑口无言，只好把我松下来，送回了拘留所。

我多么想把我受审的情况告诉那位面色青黄的同难者，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我被关进了陆军监狱。关在这里的政治犯，完全是在国民党特种刑庭的控制之下，因此一到这里就感到斗争很尖锐。

我刚被关进乙监三号笼子没几天，我忽然接到一个小纸条子，上面写着：“注意姓李的！”当时我不明白条子上的意思。到了下午，三号又关进来一个青年政治犯，口口声声说他自己是什么“西山会议派”，他是“反蒋”的等等，我一问，他名叫“李再冰”。我马上想到上午小条子的提示，因此，我说话就特别小心。同时也使我确信监狱中有同志在关心我。

不久我被调到甲监，这是一个政治犯比较集中的牢房。大家知道我受过三次刑，叫我“三老虎”。狱中许多难友愿意找我说话。在谈话中我知道了这里关着一个原浙江省团省委书记，四川人，名叫石天柱，他经常被叫出去接见。他每出去接见一次，紧接着就会有同志被暴露出来，有的甚至被枪毙。另外还有一个浙江青年，名叫汤健豪，嘴中常骂人，表面很左，可暗地里也在干

坏事。后来我们一起调到丙监大笼子，可巧，那个在侦缉队审讯我的小老头犯了贪污罪，也被关进了丙监。这里是类似犯人治疗室的地方。那个汤健豪喜欢吃小老头家中送来的东西，并合伙破坏我们的活动，引起大家的谴责。我出狱后，听说汤健豪后来像癞皮狗一样，也被敌人枪毙了。

狱中难友经常谈到曾在狱中光荣牺牲的烈士生前事迹。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们中间传颂着的胡公达的烈士，牺牲的那天是深夜，他被从笼中叫起，为了振奋全监难友的革命精神，他不顾敌人的阻挠，向大家讲出了最后的心里话：“同志们，我的革命任务结束了，同志们肩上的革命担子还很沉重，很艰苦，革命路途还很长，同志们一定能肩负起这个任务，直到胜利！”人走远了，可这雄伟的声音还在难友的耳边回响。“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枪声响了，胡公达烈士倒下了，可他的革命精神却在鼓舞着我们狱中的同志。

不知从何时起，甲监传出了一部分人要去反省院的消息，说是国民党要办一个反省院，对政治犯进行改造，只要愿意去反省院短期学习“三民主义”的，并在学习后写出心得，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并表示是受了共产党欺骗才加入C.P(共产党)和O.Y(共青团)。自愿脱离O.P和C.Y，为国民革命而努力，就马上可以获释。这个消息在笼子里传开了，有些人议论、甚至推测，而绝大部分人则沉默。

一天上午，警察封锁了甲监，看守们打开笼子，叫大家各自把行李捆好，搬到门口来等候点名。点到谁就自己扛起行李上反省院。结果，大部分人点到了名，就剩下我们十几个人没点上，就拿着自己的行李，又被锁回笼子里。

第二天看守又送回几个人来，并向我们说明，凡是刑事犯都不能反省。大概我是被怀疑的“杀人部长”，是与刑事案有关的政治犯，不具备去反省院的条件，所以没点到名吧！

在狱中，我的病越来越重了，最后敌人把我送进陆军监狱瞭望塔低层的停尸房。凡是病重或濒临死亡的犯人最后就送到这里。

瞭望塔有四层楼高，楼底停尸房是一间阴森的大房子。当时只我一人被抬放在一个角落里。

一天，“外役”送饭来时，我发现碗底有一个小条子，上写着：“要求监外治疗。”“外役”低声对我说：“明天医官来看病，你请求一下监外治疗！”说完拿起碗走了。

第二天，医官来看病，我提出了监外治疗的请求。医官让我写一个申请，我就照办了。过了约有一周，典狱长来了，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刑庭批准你出监治疗。只有一个月，到时就要回来！知道吗？”我回答他：“知道”。随即，“外役”拿起我的衣服、行李，把我送到监狱中间的办公处。那里有一个人在等我，我并不认识此人。他扶我出了监狱的七层铁门，经他介绍，我才知道他是杭州一个书店的经理，名叫黄道源（后来听说我出狱不久，他就被捕入狱约半年之久）。

我以“监外治疗”的名义出狱，是党在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上海泰东图书公司里就有不少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是他们用连环保，把我救了出来，记得那是一九二九年的春天。

出狱后，病也马上好了一大半。我来到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因我在杭州入狱之前，整理了过去写的两部小说，一部长篇的《案》和一篇短篇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寄给了他们，所以他们

又马上支给我二百元稿费。我拿了钱去做了几件衣服。经过几天的休息之后，我就去北平了。

登上北去的轮船，望着卷起的浪花，脱离虎口的我，向往着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展望着我们的未来，还想着一个月以后，敌人将再次对我追捕，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当时我曾写了一首长诗，现记得有这样几句：

北冰洋的春火，
烧炸了那铁的城壕。
高加索的雪峰呵，
捣破了晚霞的哀悼！
……
你灰色的狂波呵！
临死的追逐……
也不过疯狂的微颤。
……

我到了北平，又继续北上。经哈尔滨三中楚图南的介绍，我改名谢潘，号仲武。在吉林市的毓文中学教书。在这里，因我在课堂宣讲列宁的书，触怒了反动派，大半年之后我又转到了哈尔滨第五中学，和我党的朱大鹏同志接上了关系。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中东路事件”，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我和朱大鹏同志进行反对国民党对苏联的挑衅，并到火车站去迎接东北军的败兵和被送回来的俘虏兵，并把我党揭露国民党联日真相的宣传刊物送给这些军队，让他们认清形势，同时也送点食品给他们表示慰问，争取这些士兵，让他们知道我

国人民的真正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苏联。

我们的斗争激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因此我们被宣布取消教学资格，并不准我们在东北停留。

一九三〇年，我又回到上海，先在博古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任“工联”宣传部长时，我是干事。我后又调到《红旗日报》社工作。在此期间，党的中央组织部对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正式恢复了我的党组织关系。一九三二年我又被派到满州省委，担任秘书长的的工作。以上就是我狱中生活的前前后后。

（吴晓梅 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月



抗日战争胜利的那年，一个偶然的机，碰到一位老战友。六、七年没有见过面了，突然会见，他却不敢认我。说我从苏北去延安学习时在海上遇难牺牲，还说，那年开过追悼会，烈士名单上就有我的名字。

这些话，引起了沉重的回忆……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一只高大的帆船从延河口^①开出来了。高耸的桅杆，扯起了帆篷，帆篷饱孕着海风，船很快地驶进了茫茫大海。追逐着翻滚的白色浪花向北驶去。

这是一只从海盗手里缴获的大帆船，长五十公尺，宽二十公尺，船上有五根三丈高的大桅杆，中桅下面有一个灶房，有七、八个舱，分头、中、后舱，载重量为几百吨，吃水五尺多深。船上有四个老大，一个姓马的指导员和二十多水手。

^①延河口，即新黄河口。

这只船载着我们去延安学习的新四军干部。我们计划是从苏北出发，沿贡海，绕过鬼子封锁区连云港去赣榆拓汪，再经山东陆地去延安。

行动前，部队驻在王垛。三月八日，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召集我们几个负责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作了一个分析。最后他说：“鬼子的扫荡正由面转到点，日寇要对根据地进行“驻剿”，情况紧急，要走现在就走。”我们分析了走的方法，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师参谋长彭雄同志负责带七旅的干部（包括一些地方干部）走陆地去山东；一路由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同志负责带八旅与独立团干部走水路去山东。时间紧迫，去延安的时间不允许迟延。

十二日，我们走水路的同志从王垛出发，十三日船从老黄河河口出来，因风不顺，又弯进了延河口，在那里等风。这时，走陆路的干部尚未集中起来，同时敌人对陆地封锁太严，所以，彭参谋长带了少数人赶来，要和我们同走海路。这样，我们一行五十多人，在彭、田、张三位同志的率领下，大家穿着便衣，化装成商船，在三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钟，从延河口开船了。

我们没有武装护送，而且有几位女同志，每个干部带有一至两名警卫人员，但武器都是驳壳枪，手枪，全船只有一支从鬼子手里缴获来的马拐子步枪。彭、田、张和我（旅供给部长）等七人带有妻子，坐在后舱，其他人坐在中、头舱里。

我们这些“旱鸭子”被这无边无际的大海深深地吸引住了，尽管有些晕船，但还是好奇地仰望大海。海风拂面，浪花滚滚，船在徐徐前进。

掌舵的老大根据他的情况，望着指南针，向水手们指挥着：

“向左……向右……”

水手们有秩序，有节奏地劳动着。

我感到新奇，不时地拿着望远镜眺望，掌舵的老大姓王，他大声地问我：“你常在海上跑吗？”

“不，这是头一次”。

我们聊起了家常……

夜幕降临，一片昏黑。船里静悄悄的，发出轻微的鼾声，同志们入睡了。可警卫人员还在来回巡逻，确保干部们的安全。

第二天拂晓，风渐渐小了，船也走得慢了，这时，船正行驶在敌封锁严密的连云港海面上。

“船老大，风怎么小了？”我问道。

“不要紧，风不会没有的。”老王答道。

“加桅吧！”

“五根桅全到顶啦！”

天已经亮了，风也停了，而且开始了早上的退潮。我问老王，“船到了什么地方？”

“奶奶山”

“离拓汪还有多远？”

“七十八海里”。

奶奶山是日本鬼子在黄海边上的一个据点，距连云港很近，大白天，遇到敌人怎么办？我很焦急。马上派人请来参谋长、田旅长。

参谋长问我：“船为什么不走了？”

“没有风”我答道。

“到了什么地方？”

“奶奶山，离敌人据点很近”。

“告诉同志们，别焦急，该休息的就休息。”参谋长是个很稳重的首长，当他看到同志们有点心慌时，他却非常沉着。

大约在七点多钟的时候，突然传来两声清脆的枪声。大家不约而同地问旅长：“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们：“远方有黑点在漂动。”黑点越来越大。

“是鬼子的巡逻艇！”船老大大声失色地喊起来。

彭参谋长取下望远镜，向大家说：“同志们，敌人来了，大家不要动，敌人上来了，听我的命令开枪！”他又向船老大们说：“敌人要盘问我们，你们就说是从上海到青岛的货船。”随后，他到各舱作了战斗布置。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船上有人，参谋长叫大家都下到舱里，几位首长临时分了工，他留在灶房指挥全船对付敌人，田旅长，张主任回到后舱，马指导员带着船老大和水手们站在船上，准备和敌人对话。

“砰！砰！”鬼子向天开了两枪，船老大和水手马上把桅篷降了下来，这是敌人订下的海上规矩。

……

“你们是干什么的？”鬼子翻译官的声音。

“我们从上海来，到青岛去，做买卖的！”船老大回答流利。

“我们查一查，登记一下……”

敌人巡逻艇渐渐驶近了，撞了上来，木船晃动一下，便被敌艇紧紧抓住了。

从船舱的窗口看去，巡逻艇尾部站着一个鬼子，正好对着我，

不到一公尺远。他盯住我。猛然，我头顶上的灶房上响起了皮靴声，我抬头一看，是个鬼子小队长，他看见舱里有几十个人就“好的好的”狂叫起来。

“旅长，怎么办？”我请示站在身边的田旅长。

“打！”

与此同时，参谋长在灶房里发出了战斗的命令：我端起马拐枪一下就把对面的鬼子打倒了。田旅长接过枪继续向巡逻艇打了两梭子弹，张主任也扔过去七、八颗手榴弹。警卫员们的“二十响”开火了。日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惊懵了，哇哇直叫，我又趁势把站在灶房上的鬼子打倒海里。

敌艇转向了，鬼子们恼怒了，敌艇在离我船三四百公尺远的地方停下，鬼子们躲在钢板后面架起两挺机枪向我们猛烈地扫射。越射越猛。子弹象雨点似的向我们扫来。厚厚的船板被打得象蜂窝，船漏水了，水手们不断牺牲，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短枪，手榴弹都够不上敌艇。战斗不久，我们就有不少同志牺牲、负伤。我的左腿负伤。

彭参谋长脚负伤了，仍坚持指挥战斗，他很严肃地命令大家：“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决不让敌人得到我们一点什么，现在，大家火速把所带秘密文件撕毁，扔到海里去！”

“对！对！”

我和田旅长在船舱抵抗敌人，不料，又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左腿下部，我第二次负伤了，血流满脸，昏昏欲倒，田旅长赶忙扶住了我，问：“怎么样？”“不要紧，没伤着眼睛！”

这时，从舱口跳下一个人来，是旅长的警卫员小郑，他手里拿着一支“二十响”，大腿上滴着血，是刚负的伤。田旅长看到自

己刚十七岁的警卫员这样勇敢，激动地抱住了他，问：“参谋长他们怎么样？”小郑边喘气边说：“参谋长在上灶房指挥，脚挂了花，跌倒在中舱，他看到船头打得紧，又看到马指导员和不少水手牺牲负伤，眼看鬼子艇要接近船头，他又要上去指挥，我们拦不住他，敌艇刚开到船头，被我们一阵手榴弹和‘二十响’打退了。就在这时，参谋长负了重伤，胸口中了三颗机枪子弹。我们把他扶进舱里，他说：‘不要管我，我自带有药，你是田旅长的警卫员，快找到田旅长和张主任，告诉他们，要坚决打到底；那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就是这样爬了上来的。”

参谋长的模范行动，给了我鼓舞和力量，也是给我们战斗的命令。

下午一点多钟，战斗打得更激烈，敌艇围绕着我们船，疯狂扫射。舱里，没有负伤的同志在血水中抵抗敌人，负伤的男女同志，搬运船板，棉花、被子堵塞漏洞，在舱里筑起工事，抵挡子弹。

“跳海，新四军战士决不当敌人俘虏！”

“炸船，和日寇同归于尽！”

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警卫员很快到舱内请示参谋长。“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绝不会给敌人征服，但是现在跳海，炸船都还早。我们死要死得有价值，等敌人上船来，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那不是更有意义吗？”参谋长说。

突然，又从舱口上跳下一人，正好落在田旅长身上，旅长以为是敌人，一下把他按倒在地上，一看，原是张主任的警卫员戴文天。他是冒着敌人扫射从船上面滚下来的，他的驳壳枪卡住了，“首长，给我一支好枪，到船中舱去抵抗敌人，我是海上打

过仗的，我知道，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敌人是不敢上来的！”田旅长满足了他的要求，给了他一支“二十响”和几条子弹，只见他把子弹揣在口袋里，两支“二十响”，手上拿一支，腰里掖一支，说了声：首长，放心，我就是死也要完成任务——绝不让敌人靠近我船！就向舱口一跃，翻了个身，上去了。

敌人的机枪又猛烈地扫射着，忽然，我的头部又负了重伤，便昏过去，一直昏了两小时，同志们以为我牺牲了。

在我昏倒后，还发生许多情况，那是后来我在医院听到的：

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多钟，海上的枪声渐渐稀落了，过了一会，双方对峙着，都停止了射击。

寂静的气氛笼罩着海面，紧张得喘不过气。战斗并没有结束，敌人以为我们全死光了，便想把我们的船拖回连云港。敌艇狡猾地绕着我们，用冷枪试了几次，见我们没有回声，就大胆地把巡逻艇开了过来。

难道我们真没有人吗？不！在中桅下面就卧着一个战士，他身负四处重伤，鲜血染红了白帆，他手握“二十响”，仇视着敌人的舰艇，他就是戴文天。他从舱里上来的时候，又一次负了伤。他忍着疼痛，把卡壳的“二十响”的故障排除了。这时，敌巡逻艇上的鬼子从望远镜里看到了他，子弹象暴雨似的落在中桅附近。他以粗大的桅杆为依托，和敌人战斗了很久，忽东忽西，硬是把敌人顶住。后来，他的子弹快打完了，就滚到船板上，把自己隐蔽起来。就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

当敌艇靠近木船，有七、八个日寇暴露了半身。这个浑身是胆的战士，突然从船板下跳了起来，对准这些鬼子开了火，顿时，把这些鬼子送上了西天。敌巡逻艇，不得不拖着尸体向连云

港退了回去。

“同志们，敌人逃跑了”。

大家跑了上来，把躺在血泊中的小战士抱了起来。这个不到十八岁的战士，英勇顽强，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同志们望着他苍白脸色，非常激动。

正在这时，船老大老王吃力地说道：“同志们有……风”“快……拉桅吧！”

老王的话，提醒了大家，忘记了战斗的疲劳，忘记了疼痛，深深地吸了口气，海风把我们的船向岸边吹去。船老大老王，奄奄一息了，但仍坚持指挥大家把船向前驶进。

“向东歪舵”

“拉……左手，拉……右手。”

海风吹拂着他那银白须发，是他把船驶进了离拓汪四十来里地的海面，船老大老王，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心血：“同……志……们”，就这样，可敬可爱的老王永远告别了我们。我们再也没有人来指挥这只船靠岸了。

船，在大海里飘荡，见到陆地了，大家齐心把船划到离岸三、四里的地方，负伤的同志在大家扶带下游水上岸了，海滩上留了滴滴鲜血。

就在我们靠岸的时候，敌艇用密集的机枪封锁我们上岸的道路，我们的彭参谋长和田守尧旅长光荣牺牲了。

我还在不断地流血，眼睛被迷住了。“伍部长，你在那儿？”这是我的警卫员杜文东在呼喊我。我非常高兴，“我在这儿！”但因流血过多，喊不出声来。杜文东要把我扶上岸去。我说：“我已经不行了，给我留下几颗手榴弹，准备和敌人拚！”杜说：“张

主任叫我把你扶上岸去的，咱们死也要死在一起，”非把我扶上岸不行。

黄昏了，潮水把我们推上了岸，浑身都是血、水、泥。

“什么人，缴枪！”

“缴枪，新四军没有这种习惯，有本事朝我胸口打！”

当他们发现我们是新四军时，一个操南方口音的指挥员命令：“一排长，赶快去把他们扶上岸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就是山东独立团的同志。

我们被送进野战医院。

海上血战结束不久，刘少奇同志来电慰问我：“你这次负伤是不幸中的万幸，望你安心养伤，有什么困难找罗政委。”

这一场从早七点多钟到下午五、六点钟的战斗，敌人舰艇始终没有拉走我们的船，最后胜利终于属于我们！

后来我们了解到，日寇巡逻艇共有十二人，其中八个鬼子，四个汉奸，最后，死在海里两人，死在艇上六人，其它全部受重伤，连开船的也被打断一只胳膊。而我们活着的人很多，都上了岸，而且后来终于到了延安。

（张永和 整理）

护送陈毅同志赴延安

曾 昌 明

(全国政协委员)

.....

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
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
行行过太行，迢迢赴延安。
细细问故旧，星星数鬓斑。

.....

这是陈毅同志一九四三年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前留别华中诸同志的战斗诗篇，今天重新诵读，不由得使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三十多年前我们在华中敌后建秘密交通线的战斗经历，当年随陈毅同志辗转数千里，奔赴延安的艰苦征程，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建立华中红色秘密交通线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抽调大批干部到延安党校整风学习。为此，新四军军部调集了几十个旅团级干部组成教导队前往，我和叶彬同志也参加了教导队。队伍从黄花塘村出发，走了一天一夜，就遇上了日寇的疯狂

扫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教导队只好折返军部。

就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把我找去，传达了党中央重要指示和华中局的决定：要我负责交通局迅速打通从华中局到延安的交通线，尽快把干部队的同志输送到延安学习。这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从曾山同志那里出来，我立即赶到华中交通局，传达了任务。经同志们一起分析情况，了解敌情，提出了各种行军路线和行动方案。最后，决定首先打通与八路军运河支队的联系，进入鲁西根据地，再从鲁西根据地经华北根据地前往延安。但这一交通线必须突破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的敌人封锁线，那里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

我们的方案很快得到上级的批准。交通局的同志们身负重任，分头迅速地投入了紧张的开辟交通线工作。我带了几个同志首先到了泗阳县的新四军四师，师政委邓子恢同志正在那里，他是我的老领导，红军长征时我留在闽粤苏区负责交通工作，在敌后三年游击战争中常和他朝夕相处。现在又重逢，更增强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邓子恢同志看了华中局的组织介绍信后，热情地对我们说：“好得很！我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他当即批给我们经费和武器，并亲自给九旅党委写信。让邳县给我们配备十多名精干的干部，九旅给我们解决武器装备。于是，我们这一支武装秘密交通队，就活跃在邳县、睢宁县、铜山县之间的陇海铁路沿线地区，建立起形形色色的秘密交通站，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从而在人民中扎下了根。我们还深入敌人戒备森严的陇海路两侧以至峰城、枣庄等敌人严密设防的战略据点，监视敌情，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并与八路军运河支队（即原铁道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往鲁西根据地的通路终于打开了。至于进入鲁西以后，

在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五省的交通联络，则由鲁西二分区、冀鲁豫军区等负责。这样，一条连绵数千里的秘密交通线迅速建立并联接起来了。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干部就沿着这条交通线迅速安全地奔赴延安，许多干部在这条交通线上南来北往，畅通无阻，就是这条地下交通线，在万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护送陈毅同志从安徽、江苏徒步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奔 向 延 安

一九四三年十月下旬，我接到了让速返军部的电报，当即赶回军部。曾山同志交给我一项新的任务说：“党中央、毛主席指示陈毅军长前往延安参加‘七大’，并参加整风学习。为此。组织决定安排叶彬同志和你一起，利用你亲自开辟的这条新交通线护送陈毅军长到延安。华中局还规定：为了绝对安全保密，只能经各根据地，不能坐火车。”

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心脏。多年来，我是多么向往着这革命的圣地啊！因此，听到这个消息，加上又是护送陈毅军长同去，非常兴奋。接受完任务，曾山同志带我去见陈毅军长，向他介绍说：“曾浪波同志（我的原名）是亲自建立新的交通线的，由他陪同你前往延安。”陈毅军长，我很早就闻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我向陈毅军长汇报交通线情况后，于十一月下旬，陈毅军长带领两名警卫战士，还有我和叶彬同志一行共五人，从新四军军部安徽省天长县黄花塘村出发到江苏省邳县土山区新四军四师九旅驻地。经过数天繁忙而又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后，十二月初，我们离开了华中根据地，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途。

出邳县抗日根据地不远，就是陇海铁路，为了掩护陈毅同志安全通过铁路，九旅派出了一个连和二十多名武装便衣交通员。我们赶到铁路边上，天已黑了。茫茫的夜色中，陇海铁路象一条盘在地上的巨蟒，蜿蜒伸展。铁路两侧，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拉上铁丝网，挖了封锁沟，筑起封锁墙。铁路沿线，了望站、碉堡林立，鬼子的巡道车和装甲车在铁路上频繁往来，车上的探照灯凶狠扫视着铁路两旁，不断开放机关枪射击，虚张声势。

敌人的巡道车刚过，部队就迅速越过静悄悄的田野，插到铁道旁布置好警戒阵地，警惕地注视着铁路边上的动向，机警的武装便衣交通队员敏捷地架起梯桥。我们就从梯上跨过封锁沟，越过封锁墙和铁丝网。由于我们事先在陈毅同志的带领下周密地侦察了敌情、地形，制订了严密的战斗方案，并且进行了严格演练，所以，在敌人的眼前过路，部队的一切行动却是紧张肃静，秩序井然。我们就在敌人两趟巡道车之间相距不过半个多小时的间隙中，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越”了敌人严密戒备的陇海铁路，而且还从容不迫地派出后卫人员彻底消除了过路留下的痕迹，保住了交通线和队伍行军的秘密。

越过陇海铁路以后，队伍连续走了一天一夜，赶到了枣庄附近，和运河支队取得了联系。护送过津浦铁路由运河支队负责。九旅派来的连队和交通站的便衣武装交通队就回去了。我们稍事休息后，在陈毅同志的指挥下，由运河支队派出的武装交通班带路，摸黑穿过敌人重重堡垒。第二天夜黑我们从沙沟站过津浦铁路。

沙沟站是微山湖附近的一个大集镇，也是从微山湖通过津浦铁路的重要关卡，敌人一直控制得很紧。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

不断发展，敌人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士气日益低落。威名远震的“飞虎队”——运河支队抓住战机，对驻防沙沟站的伪军展开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迫使相当一部份伪军和我军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秘密统一战线关系。这样沙沟站就成了我方人员通过津浦铁路线的安全门户，虽然如此，为了应付任何不测事件，我们在过路前还是作好了各种准备。运河支队牢牢控制了敌据点内外的要害阵地。我们带着运河支队的的一个班护送陈毅军长迅速通过闸门，跨过津浦铁路进入微山湖。

微山湖是运河支队的根据地，这里可以控制津浦铁路和鲁西平原，是日寇、伪军、蒋介石顽军和我们争夺的要地。设在山上的交通站可以了望全景，湖光景色十分优美险要。正如陈毅军长诗中所说从淮南到此已是“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图。”我们在微山湖休息五天，就向鲁西大平原前进。

从微山湖到鲁西二分区，要通过沛县、丰县。这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无遮无拦，更为危险的是，那里是敌、伪、顽三角割据的区域，鬼子、伪军、国民党顽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扫荡”“清剿”十分频繁，关卡、炮楼星罗棋布。我们一进入这平川旷野，就感到气氛异常紧张。碉堡炮楼上枪声阵阵，远望还多处火光冲天。秘密交通站的同志告诉我们，最近，敌人在遭受到我军沉重打击以后，对游击区进行疯狂报复，经常偷袭，“清剿”，包围村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敌便衣特务夜间活动也十分频繁。

陈毅军长听了汇报，沉思片刻，然后果断地决定：急行军快速通过。并鼓励大家要以过雪山草地和三年游击战争的精神奋勇

前进！

夜，黑沉沉的。我们由秘密武装交通班的带路，开始了急行军。我们要在一夜中横穿共约一百五、六十里路程的敌伪顽三角地带。为了避开敌人，不能走大路，专走那些坑坑洼洼的小道，这就更增大了行军的困难。我知道陈毅军长在早年苏区作战曾负重伤，大腿留下了残疾。可是在急行军中他却以顽强的革命毅力紧跟在向导后面，还不时鼓励我们加快步伐。虽已是严冬时节，但我们只觉得浑身发热，好几层衣服都湿透了，当东方发白的时候，我们终于在敌、伪、顽的夹缝中穿出了三角地带，赶到了预定的目的地，和正在那里急切等待着我们的八路军鲁西二分区骑兵排胜利的会合。我们顾不上休息，又沿着当地军民与敌人周旋的交通壕策马驰骋，奔向新的目的地。

一九四三年底，正是隆冬腊月，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安阳市附近。安阳是敌人封锁太行山根据地的重要据点，敌人对过往人员检查很严，封锁比陇海、津浦铁路更为严密。敌人扬言：“就是共产党的苍蝇也飞不过去，”气焰十分嚣张。以前刘少奇政委过时是武装部队硬打过去的，但这个办法代价太大，交通站同志建议：“为了不惊动敌人，安全过铁路，可以考虑通过伪军中的统一战线关系，化装成他们面目混过去。”这有一定的危险性，任务重大时间紧迫，怎么办？在这紧急的关头，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陈军长身上，陈毅同志皱了皱眉头，沉思了一会，用很重的四川口音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紧，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他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现在就化装前进。”我们就这样在陈毅同志的指点下认真化装。陈毅同志化装成绅士坐桥子，二个警卫战士化装伪军随同保护。我化装为商人坐黄包车，叶彬同志骑着毛驴

化装成回娘家的妇女，秘密交通站的同志化装成伪军后，随时准备战斗。下午一时，正是过往行人最多的高峰时刻，我们把武器藏起来，混进熙熙攘攘的过路人群中，出其不意地穿过安阳市过了平汉铁路。敌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们眼前大摇大摆，神态自若的，就是那个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新四军陈毅军长。

一九四四年元旦过后，我们到了太行山八路军前线指挥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邓小平政委和滕代远参谋长热情接待和慰问了陈毅军长和我们。滕代远同志还问我：“还记得从上海送我到中央苏区的事吗？”首长对秘密交通人员的爱抚，使我十分激动。两位首长还通知伙房做一顿高粱窝窝头慰劳陈毅军长和我们。当时部队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常啃榆树皮和野菜，高粱窝窝头就要算高级的优待餐了。我们在那里休整了十天左右，就由晋冀鲁豫解放区向晋绥解放区太岳军分区前进。

我们日夜兼程赶路，过了胡家坪，又在大雪纷飞中奋勇前进，由解放区进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在一批又一批的秘密武装交通员带路下，不久就到了同蒲铁路。同蒲铁路和汾河，日寇作为防守八路军的天险，自百团大战以后，鬼子吓破了胆，调集重兵扼守同蒲铁路和汾河。但困难再大也难不倒我们，经过周密的计划，我们通过有联系的“伪军”，开铁路闸门，夜里穿过同蒲铁路，先到汾河附近的秘密交通点站住脚，然后又趁黑夜渡过汾河，渡汾河的那天夜里，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千里冰封的汾河面上狂风呼啸，冰面既硬又滑，我们一步一拐，几步一跌，有时还得在冰面上匍匐前进，同志们的鞋袜都冻成冰块，疼痛难熬。但是，胜利的激情使双脚越来越有劲。夜渡汾河以后，我们仍然在冰

天雪地中日夜徒步行军，迅速来到晋绥解放区第二军分区。

晋绥第二军分区绝大地区已解放，但主要公路干线和部分重镇仍被日寇占领和控制，敌人经常出来蚕食，打埋伏袭击，军分区司令员陈赓同志派一连部队护送我们，为了安全，我们爬山越岭经水晶坡，向吕梁山区前进。一路上，雪越下越大，满山遍野白茫茫一片，雪深盖膝，我们爬上滑下，反复“朝拜”，登上一个又一个山头，下山时连滚带跌的下来，跋涉十分艰难。正如陈毅军长诗中所说“雪涛冰柱鸟难过，水晶坡上蚁旋磨。下马敲冰图寸进，赤手攀援如刀割。行行行行觉衣重，朔风吹来裘又薄。进退艰难人马困，不复少年轻腰脚。……”因为我们走了崎岖的山路，终于使敌人在大路上的埋伏扑了空。我们继续前进登上吕梁山区。吕梁山区比太行山更高峻雄伟。陈毅同志带着我们在白银世界中奔波，大家越走脚越重，因为陷在深山雪海中，我双脚已被冻坏，不能行动，以牛代步，在佳县过了黄河，二月底进入大后方陕甘宁边区。三月七日，宝塔山的巍峨宝塔遥遥在望，我们终于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巧过封锁线

邵 剑 秋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八路军运河支队工作，一九四三年冬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开会，路经运河支队、微山湖铁道游击队等活动的地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皖南事变”，我党中央为了保卫我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坚持抗日到底，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胡服）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建立了党的华中局。在华中局与延安之间的交通线上，日本鬼子封锁严密。一九四三年三月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等团以上干部去延安学习队，乘帆船经海上去山东滨海区，当走过连云港海面时，与日本鬼子巡逻艇发生遭遇战，彭雄、田守尧等同志壮烈牺牲，这是一件沉痛的教训。因此，急需解决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与延安的地面交通问题。而当时坚持在陇海路东段以北峰滕铜邳地区的鲁南八路军运河支队（原称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与陇海路南新四军第四师邳睢铜军分区相隔在铁路南北，日本鬼子封锁严密，十里一据点，五里一碉堡（岗楼哨所）。铁路两边都挖有一丈五尺宽深的壕沟，两边架

设铁丝网，十里留一个路口，住有日伪军把守，盘查过路行人，凡无保甲连环良民证的人不准通行。就连当地群众过铁路走亲戚都有困难，当时群众形容说：“一路相隔，远如天边，比隔大江大海还难。”尽管如此，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即有个别同志由延安经过晋冀豫（太行山）、冀鲁豫湖西地委、微山湖铁道游击队，转到运河支队，转到陇海路南到达华中新四军。这一情况引起了新四军和四师的领导同志的重视，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到四三年一月，新四军第四师首长彭（雪枫）、邓（子恢）、吴（芝圃）、张（震）派奚原同志（现在北京工作），化装为群众，经邳睢铜军分区，由高守云同志带路过陇海路到运河支队。奚原同志的任务是调查了解陇海路以北和津浦路西微山湖及湖西地委一带的敌、伪、顽、我的态势和斗争形势（并绘图）。一九四三年夏四师首长又派罗惠连同志（已牺牲）到陇海路北运河支队了解情况。旋经华中局与山东分局罗荣桓、朱瑞同志联系同意，于一九四三年秋，运河支队和峰滕铜邳地区划归新四军第四师三分区领导。正式成为华中局与延安之间的交通线，护送来往干部。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早晨，运河支队交通员赵新兰同志（现在贾汪煤矿）从陇海路南邳睢铜军分区回到支队部驻地——都公唐山，把军分区赵汇川司令员的信掏出来，兴高采烈又带点神秘的神气说：“这回我接来了一位重要的干部，是赵司令员和曾昌明同志亲自送来的。”接着他似乎忘了整夜奔波的疲劳，拉过条小橙坐下，靠在门上滔滔不绝地讲着经过。

在听赵新兰这津津有味长篇叙述时，运河支队政委纪华、副政委童邱龙，副支队长邵剑秋，看了赵司令员的信。信很简单，只写了送干部过路，要我们即去北许阳。我们嘱咐小赵注意

保密，回去好好睡觉，不要乱讲，我们就一同动身，前往东南面五里左右的北许阳。才知道护送的是陈毅军长。赵司令员讲了护送陈军长的任务：要绝对保密，要通过运河、津浦铁路的敌人封锁线，护送到微山湖铁道游击队，转往湖西地委、冀鲁豫根据地，这段护送任务很艰巨，要确保沿途的安全，你们要作周密的布署。接着，赵司令就带我们去见陈军长。看来，军长大约有四十岁，戴了一顶线帽，穿着长袍，罩了件青色大褂，身体健壮，和蔼可亲，单从他的化装外表上看，好象个文人学者、大学教授。他与我们一一握了手，说：“你们坚持这个地方辛苦了。”然后询问了当地情况，政委纪华同志作了汇报，扼要的讲了运支对敌斗争的形势，讲了日、伪、顽合流三角斗争的复杂情况，讲了敌人扫荡围攻封锁蚕食的情况，现在我们地区很小，处在徐州战略要地外围，徐州及其周围经常住有鬼子一个师团（伪军在外）在敌人枣庄、贾汪、利国驿的三个矿区心脏地区之间，在津浦、陇海铁路和临（城）、枣（庄）、台（台儿庄）、赵（赵墩）铁路之间，还有贾（汪）、柳（泉）支路，穿入内部。在这个铁路框里，大部分是敌占区、顽占区和三面政权的游击区，敌人的据点碉堡密布，经常出动合击，天天打仗，我们的一面政权很小，仅有一个黄邱小山套，东西约十华里，南北约五、六华里，还不能完全控制。山东分局罗荣桓同志曾指示，叫我们在这个地区坚持到最后胜利，作为收复徐州的前进阵地。自运支建军以来，在此地已经三起三落，坚持到现在。陈军长听到这里显得很兴奋，面带微笑的问：“你们坚持这里有信心吗？”我们齐声回答：“有信心。”陈军长又问：“你们信心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回答：“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党的三大法宝，我们这里有红军干部和抗大干部作骨干，有兄弟地区

部队支援(南有新四军四师,北有八路军沂河支队、铁道游击队);还有运河支队这个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本地土生土长起来的,熟悉各种情况,与当地群众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对当地日、伪、顽内部情况很了解,我们能利用他们的矛盾,相机各个击破。”陈军长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接着他面色严肃地指示说:“你们这个地方很重要,从华中到延安的交通线只有这一条,要好好坚持这个地方,确保这段南北交通线,以游击战为主,向敌伪区开展武工队活动。部队不要过于集中,以连为单位向外开展活动,发展自己,积蓄力量,为将来战略反击作好准备。你们地处徐州战略要地附近,反攻徐州很重要呀!”随后,陈军长又讲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指出目前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在以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运河支队在这个铁路框里,受到日、伪、顽的围攻,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局面,北与鲁南山区,南与新四军四师都隔着敌人铁路封锁线不容易联系,只能看到黄邱套这个小天地。对外面的天体有多大,不太了解,听了陈军长讲的形势,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接着赵司令取出地图,陈军长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北去的路线。如何通过运河封锁线、津浦铁路封锁线,如何与铁道游击队联系,以及行动时间问题。最后赵司令提出:陈军长通过陇海路日伪顽地区,很疲劳,最好在这里休息一天,明天夜间再向北去。我们也都同意赵司令的意见。为了让陈军长休息好,就告辞回支队部了。下午一时许,支队部接到谢绍唐同志送来的情报,贾汪煤矿由徐州增来鬼子兵(贾汪原住有鬼子一个中队)。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即去北许阳报告。陈军长说:“我刚来到这里,不了解

情况，你们看着办，叫我走，我就走。”大家共同分析研究，我们夜间过陇海路时，敌人虽然不会知道我们的意图，但会发现部队过路的。敌人突然增兵，有扫荡的可能，为了陈军长的安全，我们要争取时间，以今晚走为好。陈军长说，决定今晚走，我只有一个要求，在途中能让我休息个把小时，行动计划就这样确定吧。陈军长这样的民主作风和果断的决定，给运支同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当即返回支队部，通知护送部队作好一切准备，包括渡运河封锁线的准备，指定熟悉道路情况的干部带队，在沿途村庄布置了警戒部队，支队党委决定由童邱龙副政委带队护送到铁道游击队。下午三时许出发，在临出发前，陈军长又详细询问了运支的干部情况，因运支胡支队长身体患病，年龄较大，不能同支队部行动，住在较偏僻的村子里医病，军长说，我因时间紧迫，不能去看望胡支队长，你们对他的医治和生活要关心，还有孙副支队长未见面，请你们代我向他们问好。在这样的紧张情况下，陈军长对部下的关怀，仍无微不至，运支同志深受感动。

下午三时许，陈军长由我们三人带警卫部队陪同，从北许阳出发了，军长的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牵着一个驮着三个人行李的小骡子随同出发，经过北涧溪、都公唐山等村，沿着黄邱山套南麓的山径步行着，陈军长问这就叫黄邱套么？有个同志回答：“是的。”这里群众有句古传的谚语：“黄邱套自古都是藏龙卧虎之地。”陈军长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回答：据说清末这里有个农民领袖刘平，在黄邱套起义，号称幅军，响应太平天国和捻军北征，发展到十多万人，配合北上捻军，攻下台儿庄，围攻峯城、徐州，洪秀全封刘平为汉王。刘平与清兵僧格林沁激战数年之久。北山上还有穆柯寨，山下有饮马泉、放马场，

山后有穆家庄，庄上有穆家大楼，穆桂英就在这里占山为王。近代的英雄豪杰也多在这个地方落脚。断截运河线上的“皇纲”（即南方各省给北京皇帝进贡金银财宝）。所以有此说。陈军长说：“当代它又成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藏龙卧虎之地了。”引起了大家哈哈大笑。行军到了龙门山前，陈军长远望南山上有人活动，便问：南山上是什么人？运支同志回答：是国民党土顽韩治隆的哨兵。陈军长说：“你们这里的斗争形势真是犬牙交错呀！”当走过佛山前的时候，太阳已渐落西山，日寇较大据点贾汪煤矿电灯已亮，气笛声，日伪据点的鸣枪声，互相交织传来，陈军长用望远镜观察了贾汪的情景。便问：“距这里有几里路程？”运支同志回答：“不到十华里。”陈军长风趣地说：那么你们给日本鬼子是近邻喽。当走到杜安南山时，黄邱套外的唐庄、后孟、平山子、万庄等日、伪据点历历在目，支队同志介绍了各日、伪据点的情况。陈军长说：毛主席曾说过，哪里有敌人，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抗日的游击队。你们这里就是这样的。陈军长站在杜安南山，纵观环围，细看了黄邱套外敌、伪、顽对我军封锁、蚕食的情景以后，若有所思，然后又转向西北延安方向，遥望片刻，便迈着稳健的步伐，沿着崎岖不平的山径又前进了。黄昏时到达山下我护送部队驻地——杜安。我们给护送部队开了个会，检查了准备工作情况，并作具体布置，如渡过运河封锁线警戒问题，在路上发生遭遇战如何处置的问题，决定叫熟悉道路的四班作尖兵等。在杜安稍作休息，由童邱龙副政委和丁瑞庭大队副（丁是当地人熟悉道路和各种情况）带护送部队，乘着夜幕，穿插日、伪据点空隙，于夜十时许到运河畔。运河历史上是我国南北水运线，现在成了敌人的封锁线。西起韩庄，东至台儿庄，八十三华里，有九个

节制闸闸口，即韩(韩庄)、新(新闸子)、巨(巨梁桥)、万(万年闸)、丁(丁店)、顿(顿庄)、候(候新闻)台(台儿庄)外加上六里石闸口，当地民谚说：“八闸九渡、六里石也在数”。在抗日艰苦的年代里，由于我运河支队坚持这个地区，日、伪在各闸口专设八个据点，各据点之间日伪军日夜巡逻，封锁运河，控制渡船，把这个长方形的铁路框地区，切成两个不等边的四方形。这次护送陈军长，选择了据点之间距离较大的韩、新之间的德胜庄上游渡河，董副政委指挥部队先向河两岸上下游布置了警戒，陈军长乘事先准备好的渔船，安全夜渡过运河，仍走着田埂小路向西北方向前进。深夜的津浦铁路韩庄车站和运河铁路桥上鬼子据点的探照灯，不时的向外扫射，束光刺目，照到了行军途上的村庄和田野，表现了敌人的内心恐惧和虚弱。行军至距津浦铁路韩庄车站约五六华里的长埠村附近休息，当时是农历十一月下旬，“大雪”季节已过，“数九”即将到来的深夜，天寒地冻，冰霜在地，白茫茫的严霜沾满了每个人的身上。战士们抱着枪、袖着手轻轻地跺脚取暖。钩镰形的残月由东方渐渐升起。陈军长在地头田埂小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又出发了。于鸡叫头遍时到达黄楼（津浦铁路沙沟车站东数华里）找到我联络人员。正巧，铁道游击队住在津浦路东的界沟村（界沟在黄楼北约三华里），此时天色尚早，当即赶到界沟与铁道游击队汇合，同时见到鲁南二地委负责人于化琪同志和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季伟同志。当天夜间铁道游击队护送陈军长过了津浦铁路封锁线。

在运河支队同志们的记忆中，陈军长过路，除了艰险跋涉外，便是他切实地了解我们运支的斗争情况。他走后的三个月，新四军四师派郑平同志来运支任政委，加强领导。几个月后，九旅开

过陇海路北，由我们运支配合扫除威胁我们的伪、顽武装，把苏北、皖北和鲁南连成了一片，运河支队实现了第四次的腾起，迅速壮大发展起来。这些措施都是陈军长决定的。当然，他考虑的不止是解决运支部队的处境问题，而且为了确保华中局与党中央的地面联系，并在日寇投降后，抗击蒋匪北犯解放区，把守山东的南大门向东北转送干部和部队。这个远大的战略决策，使我们今天缅怀起来，仍钦佩不已。

（一九八〇年十月）



一九三八年的四月初，日寇以一〇八师团为主，集中了三万多人的兵力，分由博爱、邯郸、邢台、石家庄、阳泉、榆次、太谷、沁县、长治等地出动，对我晋东南地区发动了野蛮的扫荡，开始了企图消灭我军主力的“九路围攻”。妄想以分进合击消灭我主力在榆次、辽县、武乡等地区，摧毁我正壮大和巩固中的抗日根据地。

我三八六旅根据一二九师首长指示，必须在日寇主力向根据地合围时，将我主力部队先主动到外线地区活动，寻找有利机会打击敌人和歼敌主力，各游击支队和武装自卫队同时向敌展开，以麻雀战、游击战骚扰敌人，配合主力歼敌，有力地配合了我各主力部队先后在麻田镇、大东村、大南坡等地区，袭击、阻击、歼灭和消耗敌有生力量，迟滞敌军的行动，对我军主力集中歼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长治北犯日军一〇八师团步兵、骑兵共六千余人，侵入我晋东南地区后，于四月十二日又分兵两路继续向我根据地进犯，一路以一〇五联队为主，经襄垣向辽县侵入，另一路以一一七联队为主，经沁县向武乡进犯。十三日，这两路日军分别陷入了我辽

县、武乡两城我军主力和游击队的严重打击之中，敌人处于十分疲惫、十分恐慌的情况下，师首长决心，集中我军主力给进入武乡的敌人以狠狠地打击和歼灭。十四日拂晓前，我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进至武乡县西北地红土窑一带集结待命，尽管一夜的急进，加上天气的寒冷，但同志们都忘记了疲劳和饥饿，热烈的讨论着歼敌方案，请战书、决心书、保证书雪片似地飞向上级。连队讨论正热烈时，朱总司令来了！大家立即安静下来。身材魁梧的朱总司令大步的走过来问：“你们是哪个部队？”连长徐占奎上前报告：“报告首长，我们是七七二团二营。”朱总司令说：“你们团的对手是日寇一一七联队，战斗力比较强，我们的部队是在实战中成长的，完全可以对付而且还要消灭它。你们在动员中，将敌人的战斗力向战士们讲清楚没有？”徐连长答道：“部队出发前，首长在动员中都讲了，大家都讨论了，连与连，班排之间都订出了歼灭敌人的计划，很多个人都写了决心书，完成任务的保证书送团政治处了，坚决完成首长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朱总司令又指示：“一个指挥员不单在平时要关心爱护战士，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减少伤亡，战场上减少伤亡就能保持我有生力量，达到歼敌之目的，否则，就难于完成任务，做一个指挥员必须懂得这一点。”徐连长回答：“首长指示我记住了，坚决执行！”陈赓旅长说：“七七二团初战以来一直是打胜仗的，团里老战士多，应警惕，绝不能骄傲。”我们目送首长们往前面去了，同志们说：“首长的看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我们一定多消灭几个敌人，决不辜负首长的希望。”黄排长（长征中的副连长，抗战整编时为排长）说：“我们（原二七四团）过去叫夜老虎团，这次战斗中，发扬夜老虎传统，配合友邻部队作战，一定能够吃掉小日本！”

正说着任务来了，马上出发。

兄弟部队六八九团、七六九团亦相继到达武乡附近一带。

十五日黄昏时，师首长命令以一部兵力向武乡之敌进行猛烈攻击。该敌受到攻击后立即弃城沿武乡、襄恒大路（路可行马车，不能行汽车）南逃，该县城为我军收复。此刻，师首长决定消灭该敌，命令三八六旅的七七二团，配合友邻部队迅速追击歼灭敌人，以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右岸实施平行追击，以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左纵队，沿浊漳河左岸向南急进，以七六九团为后继纵队沿大路跟进，经过一夜地急追猛进，十六日拂晓，整个纵队已追上敌人，七七二团为左纵队的前锋，全纵队和敌人一接火，马上就将敌人截成了几段，将敌人压缩在长乐村漳河谷地。我团对手就是日寇一〇八师团一一七联队。敌人在进退维谷中，就困据在长乐村要地上，实行坚守顽抗。

当敌人忙于集中实行顽抗时，我团二营两个连，肃静迅速地由西南角山上隐蔽地运动接敌。当时，日本鬼子很傲横，它以为我们不会接近，不敢短兵相接，当我们两个连从山坡西南面隐蔽地运动到地埂上，就在敌人头上面，敌人成群集队在路上，还未发觉，我们爬在地埂上，每个人背八九个手榴弹，力气大的背十多个，手指扣着拉火环，急等着冲锋信号，一营有两个连爬伏在我们后面的坡上，为我们的二梯队。过了半小时左右，从指挥所上空飞起三发红色信号弹，总攻开始了，只听隆隆的炮声和炮弹的呼啸声、爆炸声在敌群中响成一片，我轻重机枪和我们手里的手榴弹也迅速投入敌群，各种枪炮声和敌人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在我们前沿连前面，硝烟弥漫，敌人死伤成堆，人呼马叫，血流成河，由于我军火力组织和指挥等各方面的配合，一开

始就压得敌人昏头转向无还手之力，近半个小时，敌人都未能发挥火力。

激战约半小时，敌人发现我进攻的主力是从西南山运动下去的，于是，组织了三百余人向我们反扑。因敌只发现同它近战部队（二营两个连），而几次反扑都被我们杀伤大部败回。后来，由于我们手榴弹投完了，为了更有效地更多地消灭敌人，叶团长决定，敌人再反扑时，一营的两个连为二营的预备队，二营两个连往后撤，引敌人进入我们的口袋阵。当敌人又向我们猛扑时，我们按叶团长的指示，给敌一阵杀伤后就后撤至二线阵地。敌占领了前沿阵地后，又疯狂地猛扑二线阵地，此时，一营的两个连突然以各种交叉火力猛烈开火，在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敌人又倒下一大片，残余之敌又一次溃败而逃回去了。一营两个连完成任务后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但是，日军在训练中贯彻了武士道精神，加上精神上的武士魂的麻木，它们不承认自己会打败仗，因此还进行垂死的挣扎。他们通过电台要一〇五联队从辽县增援，敌三千多人赶到长乐村附近，向我军左翼猛攻，企图解救一一七联队被我团全歼的命运。我六八九团与敌人进行了反复冲锋，连续打退敌人多次攻击。战斗十七小时以后，辽县之敌又以千多人来援，我团七、八两个连各以一个排，自长乐村外路边，牵着敌人的鼻子，拉牛似的边打边撤，慢慢地往西山头引。这个山头，是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所在的旅指挥所。

在指挥所，朱总司令亲临前线，刘伯承师长亲自指挥，另外因为是统一战线，蒋介石还派来个什么“联络参谋”。

当我军的两个排牵着来援的敌人一〇五联队上山时，敌人以

为我们是退却，攻得很猛。首长指示：把敌人引到指挥所前五百米左右阵地消灭！我们将敌快引到阵地前时，蒋介石派来的“联络参谋”怕的要命，吓得要死，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说，“朱……朱总司令……这……这……不行……我们快往……后撤……撤吧！这里不……不行呀！日本人上……上来了！”拚命地向朱总司令要求往后撤，这时的旅指挥所已成了团指挥所了，那位“联络参谋”正向朱总司令要求后撤时，敌人的三发炮弹在指挥所前后爆炸了，那家伙更急着要往后撤，朱总司令左手往腰上一叉，右手摸着胡子凝视着前面的敌人，十分沉着而面带微笑地说：请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这家伙一看朱总司令不理睬他，就跑到刘伯承师长面前说：“刘师……师长……这里不……不行了，快撤……撤吧！”刘师长先听他向朱总司令要求撤时就烦了。现在他又来啰嗦，将右手一背，对那个“联络参谋”说：“不用怕，不用怕”。又用左手一指敌人说：“你看，马上就叫他下去。”刘师长布置两个连埋伏在指挥所前面三、四百米处阵地上，亲自指挥，当敌人到了刘师长亲自布置的伏击前沿时，我伏击部队突然出现，在各种火力和手榴弹的袭击下，敌人又丢下一大片死尸，连他们的指挥官也被炸弹炸成几段丢在阵地上。这时朱总司令背着手走来走去，微笑着看大家打扫战场，刘伯承师长看着部队拼刺刀时笑着说：“看，我们的部队仍然保持着红军时代的优良作风和战斗风格。”又对那个“联络参谋”说：“喂，你看，日本人不是败下去了吗？”那家伙赶快点着头说“败下去了！败下去了！朱总司令，刘将军指挥英明，英明，兄弟佩服、佩服……”。

我们七七二团敬爱的英雄团长叶成焕同志，在前沿伏击战激

战中不幸光荣牺牲。这是我们部队的一大损失，烈士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十七时以后，其他几路敌人数千人赶来援救，在此情况下，全歼一一七联队已不可能，为巩固已得胜利，我们仍以少数兵力打击日寇，我主力到黄昏后主动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两千二百余人，缴获枪支一百余支，重机枪两挺，弹药和军用物品一大部。

此次战斗，对当时巩固晋、冀、豫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也在我军的战斗史册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于会泳出国丢丑纪实

侯德章

一九七四年冬，北京京剧团《杜鹃山》剧组访问阿尔及利亚。他们对外简称杜剧团，团长是窃据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文化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走卒和打手于会泳。当时，我作为驻阿使馆参赞，奉命全程陪同，历时一个月，对于会泳的所做所为感慨颇深，虽没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但也可从这个小小的侧面看到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往来领域对我国外交政策的破坏。

最初的印象

杜剧团访阿起因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布迈丁主席访问我国。当时江青以毛主席夫人的身份请布看现代京剧《杜鹃山》，布可能出于对女主人的尊重，当面表示十一月一日是阿武装起义二十周年纪念，欢迎此剧参加庆祝演出。根据国内指示，使馆经多次联系才获得阿有关方面的邀请。使馆为搞好接待工作，专门进行了动员，成立接待组，并吸收援阿医疗队和工业专家参加。我们虽已意识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直到十月中旬剧团先遣组到达后，才明白要搞好此次接待，比我们原来设想的困难要多得多。

十月二十六日，中国民航两架巨型专机滑行到阿尔及尔机场

停机坪上，波音七〇七载道具，伊尔一六二载人。大使和主要外交官均到机场迎接。舷梯靠接以后，使馆礼宾官入仓迎接，大使则候在梯旁。于会泳问礼宾官：“你们大使姓什么？”在大家惊诧之际，幸而有人提醒了：姓林，你怎么忘了呢！

阿方的车队把剧团拉到了首都西郊一个大宾馆，那里有一座宏伟的建筑，敞亮的前厅灯火通明，演员们在沙发上坐下来，等候分配房间。可是，过了一会儿，阿方通知，司机搞错了地方，杜剧团不是住在这里。到新地方一看，是一座乡间别墅式旅馆，住起来也舒适安静，但缺乏前一个宾馆那种雄伟宽敞的气魄。本来在这里只住两夜，不存在什么问题的，于会泳却十分不满，认为阿方有意压低接待规格，好地方不给他们住。晚餐时，余怒未消，饭菜基本没动，面孔却老是板着。俗语说：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团员们见团长如此之不高兴，欢乐之情也顿时消散，食欲索然不振了，饭菜大部剩了下来，经理十分难堪。而更可悲的是，这些不寻常的举动，很快就传到了阿尔及利亚的最高领导布迈丁耳中，并在后来接见时作出了直接的反应。

阿尔及利亚新闻文化部长对这个主席邀请的剧团很重视，决定在该团到达之第二天接见团领导。本来于应熟悉一下部长的情况，但他却一点也不关心，只嘱咐使馆找机会转达他要见布迈丁的愿望。

离部长接见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了，办事人员提出准备出发，因路上要一刻钟。此时，于会泳看见一张乒乓球桌，提议打球，打完球已超过了上车时间，他又想起给部长的礼品应当签名。有人递上自来水笔，他不用，一定要毛笔。哪里去找？有人想到大使办公室有，可是在另一座楼，跑上跑下时间不够了。于会泳坚持

要毛笔签名，只好去拿。在此期间，有人问于对外怎么介绍身份？于自作主张地说：“副组长就是副部长，就这么介绍。”文化组的其他人讲，文化组比过去的文化部权还大，人民日报的文艺版也归我们管。这些，我们只能“同意”。由于于会泳的拖延，使阿新闻文化部长在会客时干等了一刻钟，这在我国的外交活动中是极为罕见的。

江青的“关怀”

杜剧团到阿之前，国内通知使馆：团内有个党委会，到阿后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根据这一指示，也根据接待出国代表团的通例，使馆党委在剧团到达之第二天，即请其党委负责同志到馆会晤。这里含义甚明，即请他们来汇报，但我们也有缺点，碍于于会泳是中央委员，没有明讲汇报这个词儿。“首长”

（这是团员们对于会泳的称呼）却另有想法，他的目的是来玩一玩，特地带了不是党员的女男两主角。

于会泳到馆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替江青赠书。江青盗窃国家文物、慷他人之慨以拉自己的势力已是多年惯技了，这次搞到了海外，她把古诗源和词综两本书题上自己的名字赠给从未见过面的我馆大使。于会泳绘声绘色地转达江青对大使的“关怀”，并说，这两本书都是据毛主席的藏书影印的，主席都读过，并有圈点痕迹，极为珍贵。大使对此没有表示欣喜，却产生魔杖袭来之感，立即理解到这次接待工作非比寻常。

于会泳等人在使馆党委内和其他许多场合，不断谈到江青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从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有趣的情况。他们说，《杜鹃山》原作以写雷刚为主，没有突出党的领导，没有突

出毛泽东思想，“江青同志”把这个戏拿过来以后叫人们改，总改不好，后来把于会泳和女主角从上海调来，于排除一切干扰，杜门拒客，九个月搞出来了。以雷刚为主改成了以党代表柯湘（女）为主，她是毛委员从井冈山派来改造农民武装的，完全符合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江青同志”很满意，并曾亲自修改审定剧本，指导演出。于会泳完成此任务后就成了国务院文化组实际的全面领导，文化组组长是别人兼的，只管给剧团解决房子、车辆、用品、经费，从不管创作方面的问题。

杜剧团来阿一切都是江青安排的。原来只带一个戏，江青为了扩大影响，决定把《沙家浜》几场戏带来。兴师动众，团内几个重要角色，是江青同意或由她指定从上海、青岛、烟台调来的，江青还批准制作法文和阿拉伯文两种字幕，后来又指示广播事业局制作可供八百人用的同声传译设备，并派人随团安装。又要新影和电视台派人随团拍电影和电视片。海报和演出说明书都是江青亲自审定的，说明书的封面改了三次，为了印刷得好，江青亲自向印刷厂作了交代，烫金用的金粉从上海空运到北京，甚至由那个照相馆给演员们照相，也是江青安排。说明书印制十分精良，每本成本四元，“江青同志”希望每个观众能够带回一本留作纪念的艺术品。关于这一项要说明一点，国内原指示在阿演六至九场，使馆根据将要演出的三个剧场实有座位，以百分之百的上座率计算，建议印十六开本四页说明书八千份，即可人手一册而有余，但江青、于会泳一下印了两万本，每本约二十页，后来把剩下的一万二千多本原机运回，只此一项直接损失即达五万元。当然，这对那些大量吮吸民脂民膏而又高唱反对算经济账的人来说，可不算一回事。

杜剧团临行前三天，江青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集体接见团员们，除总理病假外，其余都到了。江青大谈她如何冲破阻力搞京剧改革，说一九六四年政治局内只有一个人支持她，这就是柯庆施，我们要永远纪念他。谈到《杜鹃山》的优点，如何如何之多，连对白，押韵也是优点，大吹于会泳在这个戏上如何付出的辛劳和作出新贡献。接见时，江青当面答应赠给每个女同志一件“国服”，要尽量花梢一些，并且一定得穿，将来还要从电影当中检查。在场的某政治局委员，当即指示服装店备料，散会后去量身体，三天内全部做好。江青又说，阿尔及利亚雨多，赠每人一双白塑料凉鞋，由商业方面解决。接着就指示，把广州、上海库存的白塑料凉鞋用飞机运来，让大家挑。

接见时，姚文元指示，要拍好电视片，特别是要把电影片拍好，但要注意，不能替资本主义作宣传，不能去拍那些高楼大厦等花花世界。因有这一条“指示”，随团摄影的同志大大为难了，他们很难找外景，有的同志风趣地说，可以到地中海边拍些海鸥，这样就不会宣传资本主义了。

于会泳又谈到，江青还曾单独召见他，反复交代了京剧样板戏首次出国的重要性，授权他代表江青向布迈丁主席赠礼并转达问候之意，要他照顾女主角，也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他还说，江青面赠两瓶高蛋白，于和女主角各一瓶，并嘱咐要按时吃以保证健康。江青在经济上授权甚大，人民币开支，于自己可以批，涉及外汇时，向江青讲一声也就可以了。他们出国后江青仍直接抓，电报回去她都要直接处理。

于会泳等人的介绍，使我们茅塞顿开，不由得使人思考一个问题：江青怎么那样重视于会泳呢？

住房的风波

使馆派我和杜剧团导演周仲春同志等先期到达第一个演出地点阿尔及利亚东部大城市安纳巴，拜会了当地负责人，察看了剧场和住地。因接待条件限制，住地分在两处，市中心东方旅馆腾出两层安置团领导和女演员，其他人住在职业学校。该校环境很好，有很大的活动场地，宿舍内有淋浴，而更难得的是职工非常热情，口口声声讲中国是支持他们取得独立的好朋友，接待中国剧团是他们的光荣。政府为了接待我团，命令该校放假两周，全部交给了我们使用。周仲春和我对阿方的安排都表示满意，表示感谢，并即电话报告了大使，大使也认为阿方考虑是周到的。但于会泳一听说要住学校顿表不悦，并假以词色。从而，此事引起了一场风波。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那两架中国民航的巨型专机到达安纳巴，省长代表和文艺界人士前往迎接。人们鱼贯而下，欢迎者在梯旁排成了队列，几个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少女向团长副团长等献了鲜花。仪式虽然简单，却充满着热烈友好的气氛。全团一百三十人，再加上若干陪同人员，下飞机要用一点时间，只有全部下来后才能分配车辆，离开机场。可是于会泳不耐烦了，吵着要先走，他问清了那辆是团长的汽车（有两辆从阿尔及尔派来的小车，专供团领导使用），就拉着女主角上了车，并且很快开走了，有关人员只好跟上，只留下秘书照料其他人。

我们把于会泳和副团长领到东方旅馆三楼他的房间，向他解释，安纳巴虽有十多万人口，但市内旅馆只有三个，这是最好的一家，而象这样带浴室的房间只有两间，分配给团长副团长。

守候在旁边的阿方人员在为他们能接待中国剧团的领导而骄傲，期待着团长夸奖。但出乎意外，于会泳颇不高兴，拉着脸说：先休息会儿再说吧。继而走到窗前向外看了看说：是邻街的，我神经衰弱，最怕外边吵。阿方人员耸了耸肩膀下楼去了。

刚刚坐下，于会泳若有所思地高声问道：女主角安排在哪儿？周导演告此在二楼，并说明女同志都在二楼，于立即前往察看，边看边提问题：房子邻街，车马喧嚣，影响她的睡眠，室内没有厕所，夜间不方便，也不安全，两个人一间，互相干扰。要立即把女主角调整到三楼，住单间。我说转三楼可以，不邻街又带厕所的房间没有，女同志在外不能一个人住一间，这是有规定的。于会泳说，上边要我照顾好她，我要尽到责任，就安排在三楼吧。

于会泳提出，当天集中力量解决住房问题，第二天开始要抓排戏，一行人到了职业学校。十月底天气，地中海南岸开始进入雨季，空气是潮湿的，港口城市安纳巴已颇有凉意，但仍谈不到冷，气温在二十度上下。阿方为接待杜剧团，调来一批军毯，每张床放三条，还有些床单之类。说不上什么享受，但是可御寒，大家认为在当时当地条件下也说得过去了。从阿尔及尔听说住职校就不满的于会泳，看了现场更加不高兴，不顾阿方人员在旁就连珠炮似地提出责问：三十来人一间屋，一个人打呼噜大家怎么睡？一人走动岂不要把所有的人惊醒？房间没有暖气，淋浴后感冒了怎么演戏……？！演员们本已安排住下了，有的躺在床上休息，没有更多的反映，但见到团长如此表态，一个个情绪也改变了，有的人对我讲：这和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想的相差太远了，我们是布迈丁主席邀请的客人，怎么住到学校来了呢？

我向一位团的干部打听，出国前团内是如何进行出国教育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团体出国总要请有关方面讲一讲被访国情况，应注意事项等等。这位干部回答说：现在谁来管这个，这项工作根本没有进行；样板团在北京要什么有什么，只要首长一句话，谁知道什么叫困难。我又问，在阿尔及尔为什么不请大使讲一讲有关问题？他倒反问我：这种红线剧团，谁眼里有大使呢？

看完职校住房，于会泳要我向大使汇报，职校条件太差，希望阿方解决。大使说，阿主席府已通知了使馆，剧团明天可以住到旅馆去。与此同时，于会泳召集团内干部开会，商量分工问题，主要是谁抓生活，谁抓思想政治工作，谁搞对外联络。排戏由他亲自抓，但团内一切，事无巨细，他不点头一件也办不成。出国前连这些准备都没有做，真令人叹为观止了。

当地通知，下午省长接见。于会泳临时召集了个碰头会，要求大家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都提出来，他去面谈。我说，这儿剧场是全国最大的（一千二百个座位），演出没问题，住房分两地不太方便，职校条件不理想，根据当地情况，也可以了，是否不提什么困难？于说不行，一定得提。果然，见面没说几句话，省长就问有什么困难没有？于会泳说：困难是有的，主要是职业学校条件太差……。没等于会泳说完，省长就插话说：我都知道了，布迈丁主席正在拉巴特（摩洛哥首都）开阿拉伯首脑会议，他从那儿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你们解决住房问题，今天是我任职的最后一天，明天就离开了。我最后要做的就是签发三道命令，征用本市的三座旅馆，让一切客人搬家，腾给你们住。说着就拿出打印好的命令，准备签字。在场的中方同志看到省长那严肃的面孔，

听着那不愉快的口气，都小声劝于会泳不要让省长签发这些命令，于会泳置若罔闻。省长见此情景，就开始签字。有人提醒于会泳：空气太紧张了，应当缓和一下，要感谢省长的接见。于说：“干吗老是感谢，感谢已经太多了！”这些话当然没有翻成法文，可是省长已察觉了，就说：好吧，你们去看房子吧！把命令交给一位阿方官员，自己很不礼貌地快步走出了会客室。

于会泳率有关人员去看房子。在第一家旅馆，看到有的人正在往外搬行李，问他们去那儿，他们不做正面回答，却说：这是中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大家见此情景就劝于会泳不能这样做，下一个旅馆也不必去看了。于会泳不答应。在第二家旅馆，有的人把行李搬到了楼道上，有的则与店方吵嚷不搬。据了解有些人是援阿的外国专家，因没地方住才安排到这里的。阿方陪同的官员冷冷地说：不要紧，已经叫警察去了，警察会赶他们走，不搬怎么行！大家闻言，感到事态严重，就坚决向于会泳提出，不能这样了，这样下去既得罪了人，又影响两国关系，我们就住在职业学校好了。直到这时，于会泳才有气无力地说了声好吧。

我们已经住进的东方旅馆第一层，原来是留着准备住零散客人的，临街的餐厅和咖啡馆也在单独对外营业。可是到了第三天，忽然都关闭了。我曾见一个西方人夜间去投宿，柜台人员讲这儿住着中国剧团，不留其他人，那个西方人还不甘心，问有没有空房，伙计说，有空房，但不能住，那人只好牢骚而去。那些经常在这儿吃饭、喝咖啡的人，只好望店兴叹，悻悻而去。为此，我曾找旅馆经理谈过一次，劝他一楼和餐厅继续营业，他说：“不行，上边有命令，这儿只招待你们！”

难产的首场演出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是阿尔及利亚武装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二十周年。一九五四年的这一天，在东部奥雷斯山区打响了第一枪，独立后这一天就成了国庆节。二十周年大庆的演出活动安排在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全国同时开始。演出团体全国统一分配，各有自己的服务范围。我杜剧团服务于安纳巴等三个省，还包括一个设在君士坦丁的第五军区，票在半个月前即已分发。所有这些，使馆都及时向国内报告过，于会泳都很清楚。

舞台工作人员非常辛苦，他们在抓紧搭台。道具二十八日已全部运到安纳巴机场，因海关手续欠妥，向剧场晚运了六个小时。阿方不惜工本，从阿尔及尔调来两辆载重二十吨的工程用车，两趟就运完了那近七十立方米的道具行头。当晚加夜班，阿方有的人通宵一块干，到三十日，台搭好了。两眼已经熬红的剧院经理，这时非常高兴，对于会泳说，看来明天晚上演出不成问题了。于会泳则出人意外地大摇其头。经理大惊，说，你们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了，为什么不演出！于会泳固执地不肯点头。这位经理在阿文艺界颇有名气，是阿国少有的电影演员、导演，对我国很友好。他忿然离开剧场，回到经理室，双手颤抖着对使馆人员说：“你们如果不演，我会被戴上手铐抓走的，外边早就传说我招待不周，得罪了你们。”此话传给于会泳，他坚持样板团在国内有成规，至少一场一休，彩排也是演出，三十日彩排，三十一日就得休息，要保护演员的健康。

我们使馆几个陪同的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访问了几个演员，都说明晚可以演出，而阿方不但早已发了票，海报也早已张

贴在各通衢要道，报纸、电台都已报道了庆祝节目。我们认为有条件演，也应该演，于是向于会泳提出正式建议：我们应布迈丁之邀，是专门前来庆祝阿二十周年大庆的，条件已具备，应按时开演。报告了大使，使馆党委同意我们的建议。于会泳仍不答应演出，通过副秘书长向我一本正经、一字一板地讲了这样几句话：

“由于阿方海关拖延了我们半天，耽误了我们开箱、装台、彩排，致使我们无法在明晚演出。勉强去演不能保证质量。如果使馆党委决定演出，我可以演，但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很明显，于会泳这里讲的中央就是他的主子江青。宁可得罪东道国，牺牲人家的庆祝活动，也要保证自己的所谓演出“质量”，这种事，也只有江青这一伙人才干得出来。我知道有风险，由于责任所在，就对于会泳说：“我相信我们大使和使馆党委决不会做违背中央精神的事，但我们是专程来庆祝的，在统一庆祝日，全国只有这一个剧场不庆祝是说不过去的。”有人建议可否演几场，加点沙家浜等，以示庆祝，于仍不同意，说：“我可以把剧场让给他们，由他们另行安排。”我说，“剧团和剧场都是全国统一分配，这地方留给了我们，他临时到那里去找剧团？”僵持不下，不欢而散。

后来，于会泳派人把我找去，在场还有副团长、秘书长、导演等。于不愧是个很受江青青睐的演员，白天尖锐争论的一切好象都不曾有过，郑重其事地对我讲：“为了庆祝阿尔及利亚国庆二十周年，我决定明天晚上演出《杜鹃山》三场和《沙家浜》“智斗”。但要说清，这不是杜鹃山的首场演出，明天晚上正式演出是不能保证质量的。你可以向大使报告。”我当然要报告，不在话下。我们当即通知剧院经理，经理长舒一口气说：“你们救了我！”

但旁边的人却很不满，说：我们票印的是《杜鹃山》！并似自言自语地说：既然招待不起，这种团就不应该请。

三十一日晚上，安纳巴剧院门外，成串的五彩灯泡从屋顶拉到树上，纵横交错，聚光灯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灯光下红旗闪动，柯湘的巨幅剧照光彩夺目。当地要人陆续到达剧场，单经过介绍的巨头就有十三位，包括了党政、军、群等方面的头头脑脑。场内座无虚席，都在以急切的心情盼望帷幕拉开，以欣赏东方异国情调的艺术。可是，于会泳却来了个惊人之笔，让报幕员宣读他亲手写的声明：为了庆祝阿国庆二十周年，我们专门安排了些小节目，明天我们的《杜鹃山》正式首场演出，欢迎大家光临。那些从数十公里、上百公里外来看盼望已久的《杜鹃山》以饱眼福的人是如何的失望，自不难想象。节日的票有分配的办法，他们明天还能来光临吗！而那些能来的权要们又怎么样呢？

十一月一日晚，《杜鹃山》正式演出，我们作了一系列准备，并决定由我陪于会泳等在贵宾席上。预定八点半开演，但重要的地方官一个也没到，有人说，本地习惯九点才能来，又等到九点。这天于会泳真有耐心，快到九点十分了，他还不下令开演，却不时出外看看，然而当地要人们仍是一个也没有到，给军官们留的五十个座位，非常显眼地空在位置最好的地方。台上的人们无法等下去了，自己拉开了帷幕，于会泳无可奈何地仰在贵宾座位上。

枝节横生

十一月二日，杜剧团在安纳巴演出了最后一场，按预定计划，第二天全团转到西部城市奥兰，但于会泳没与使馆人员打招呼，自

行通知阿方剧院经理，明天全团休息一天，四号转移，舞台明天开始拆。于会泳当然有他的道理，三十一号以来没有休息，根据一演一休原则应该补休，二号这一天有一半人到九十公里的盖尔马市与我驻阿医疗队、专家组联欢，的确有点累了。我们得知后赶紧找于团长研究，说明阿方交来的接待计划上明明写着三号到奥兰，我们不按时走会打乱人家的计划。于不答应。我们报告了大使，大使同意我们的看法，并说，应当服从阿方安排，宁可自己辛苦一点也不能再拖。而阿方的反映异乎寻常的强硬，从首都跟来的陪同说：“你们明天不走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家的统一安排，飞机都准备好了。”经理说：明天东欧有一个歌舞团要来，你们今晚必须拆台。于会泳再也无法拖了，只好下令拆台装箱。

经布迈丁主席批准，阿尔及利亚空军拨了两架运输机给杜剧团运道具，又包了一架波音七二七民航机运人。同志们经过一整天的休息，疲劳已经消除，在晚霞辉映之中到达安纳巴机场。大家遗憾地看到，和初来时的情形已大不相同，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没有了，代替的是有礼貌的冷淡。在候机室，以剧院经理名义举行了一个简易的茶会，摆了几盘夹心点心和饼干，几瓶桔子水和可口可乐。经理未到，由副经理代表，一个官方人士也没有。东西吃光喝光后大家登上了飞机。才过了一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比阿尔及尔还洋气一点的第二大城市奥兰。

安德鲁斯宾馆

奥兰西郊约三十公里处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海湾，密茂的树林覆盖着浅浅的山岗，平静的地中海岸有一条走廊般的沙滩，沙质细而清洁，海水没有受到污染，保持着高度的纯洁性。法国人曾

在那修建几座别墅，并以西班牙古城安德鲁斯命名。独立以后它被建成旅游避暑胜地。这里盖有大楼数座，有巨大的餐厅、舞厅、小卖部和剧场，但最具特色的是一座座小别墅。别墅分普通和高级两种，前者两个房间，后者三间，各带有厨房，洗澡间，客厅，走廊休息室，并有微型墙院一个，每到旱季（五至十月）即出租给游人，有的一住一两个月，拚命在海滨晒黑他们那白种人皮肤——这些租住者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对岸的欧洲人。而我们到时已届雨季，秋风潇潇，人去楼空，正好用来招待我们。除杜剧团外，还有一个朝鲜歌舞团，也有一百几十人。他们已结束了在奥兰的演出，正在附近的西迪·拜拉拜斯表演，那里距这里约一百四十公里，夜间演完还得赶回这儿住宿。

阿方给杜剧团以盛情招待，分配的都是高级别墅，每个房间二至三人。于会泳按部长级待遇，单独一座小别墅，只有秘书住在旁间。他看到自己住屋既不靠街，近旁又无其他建筑物，树荫蔽天，绿草如茵，庭院整洁，环境幽静，表示满意。接着就问女主角安排在那儿，是否单间，人们回答和其他女同志在一起，于会泳又重复了在安娜巴说过的话，并说：“她睡不好就要影响演出质量。这个团可以没有我，不能没有她，一定要找个单间。”人们从这些话中立即领悟到，的确不负江青重托，照顾确实周到！

这种照顾发展到须臾不能相离，对外就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例如坐车，于会泳每次总把两个主角拉去同坐一车，而且同坐后排，人们看他们太挤，劝他们分出一人，以照顾“首长”，但于会泳始终不肯。又如吃饭，于会泳每次总要把女男二主角拉在自己左右，有时她们先到，已和其他演员一起吃起来，于会泳也要硬把他们拉出来。到后来阿方服务员颇为知趣的给他们摆了个主

席台，使之面对大家，以显示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不同于众，于会泳对此颇为欣赏，心安理得。又如，经使馆同志提议，与朝鲜歌舞团团团长会面，本来是领导层的事情，于会泳临时把女主角带了去；朝方团长很尴尬，说：“不知中方带演员，不然我也要把卖花姑娘带来，省得柯湘寂寞。”

杜剧团一到安德鲁斯宾馆，犹如聋子放炮，散了。原来就很松弛的纪律，此时更加松弛了，每次吃饭都稀稀拉拉，前后可相差一个多小时，给食堂造成不少困难。有一次午后，我到个别墅去，见一间房百叶窗严严实实的关着，人声阒寂，推门进去，有三个人睡意正浓；他们早饭没有吃，午饭也忘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知道。每当集合上车时，总有些人不按时到，不能准时出发，团领导或视而不见，或无能为力。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朝鲜歌舞团却能井然有序地行动，两两相较，鲜明对比。

我受命陪同，道理上讲要从政治上、两国关系上多负点责任，随时向团领导提供阿方情况。遗憾的是，我无法完成这方面的任务，团领导从不问我政治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他们除把我当作一个“交涉”工具外，就是只问吃的情况。即使主动提出问题，于也根本不理睬。

提到剧团的吃饭问题不能不补叙点事情。为了把接待工作搞好，使馆向我国驻阿医疗队和经援专家作了动员，他们都积极加以支持。在东部时，专家驻地距演出地点九十公里，使馆专拨一辆面包车，不管风雨晦暝之日还是漆黑的夜间，每天一趟运送专家、医生们做的熟食，有酱牛肉、酱鸡、茶鸡蛋、馒头、包子等。为了使剧团吃到面条，动员了许多人来擀，到职校再煮熟。专家组专派一名技术员到职校烧开水，医疗队派一名医生住在旅

馆。为了保证吃好，使馆派厨师李宗华住在职校，使用学校的炊具烧大锅菜汤、煮大锅面条。我们原想，有了这些补充，演员们即使吃不惯当地饭菜也不会挨饿了，但这是个片面的想法。到奥兰后，我们把厨师放在饭店厨房去搞自己的汤菜，人家就不太欢迎了；到阿尔及尔后仍这样做，终于受到了一些惩罚。这种做法带有大国主义气味，是对人家厨师的严重不敬。自己大量供应的做法，助长了演员们的依赖思想，对主人的饭菜更不感兴趣，并且有人屡屡发出怨言，国家主席请的客人，就让吃这个饭！

在安纳巴时，于会泳和几个主要演员的夜餐都单独做，热量是比较充足的。到奥兰后住在一起，不能单独做了，于会泳就感到难耐，有人和我研究怎样搞点小灶。我说李师付一个人难以分身，他建议大家的夜餐可以停一下，或到食堂去吃，抽出李师付给首长等人做。正在为难，有一位汽车司机自告奋勇上厨房，三个人与一百多人的夜餐矛盾方告解决。使馆同志拿出炒菜用的白酒奉献于团长，此物真灵，那晚我第一次看到首长的笑脸。

五 次 交 涉

安德鲁斯别墅区秀丽的风光和清新的空气引起的好感，在举手可以触天的于会泳身上并没有维持多久，这位“斗争哲学”培养出来的“首长”又开始斗争了，十天中他进行和计划进行的交涉有五项。

第一次交涉，用电。奥兰剧场是典型的法兰西贵族戏院，座位只有七百个，三层楼，屋顶绘制着文艺复兴时代的飞天壁画，自下仰望，绚丽多姿，数十年来，它迎接了无数剧团，前几天朝鲜歌舞团还在此演出过。于会泳却发现了“问题”，照明不理

想，要求阿方增加一倍电荷，以保证演出质量。此事一提出，阿方就感为难，增加输电量要架新的高压线。由于于会泳的坚持，阿方只好答应，并派了两名技师、十几名工人开始施工，打算切掉两个工厂的电，转供剧场。我问搞照明的同志，成倍供电，我们有多大需要，他答高峰时有五、六分钟需要。我说，少一点可不可以？阿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许多困难，如果能克服我们可以克服一下。照明的同志们认为无碍大局。结果是电增加了一些，工厂也免于关闭。后来于会泳未再提此事，显然没有影响他的演出。

第二次交涉：在城内找住房。于会泳去剧场看过后提出，三十来名舞台工作人员要加夜班，来回跑太辛苦，要在城内就近给找住处。向阿方提出后，人家回答说：在这儿，我们已付了全部房租，在城内另找房子谁付钱呢？于会泳玩了个花腔，表示这件事关系到能不能按时演出，相信阿方会加以解决。果然，第二天解决了。不然，谁敢保证布迈丁的卫士长不会再来电话呢？

第三次交涉：票价。杜剧团秘书长与剧院经理见面时，经理提出一个问题，说鉴于前几天朝鲜歌舞团演出时没卖票，剧场秩序很乱，因此决定象征性地卖票，每张一个第纳尔（按购买力合人民币一角），以维持秩序。秘书长作了个前所未闻的表示。他问：听说前年北京杂技团在这儿演出过，那时多少钱一张票？对方答：八第纳尔，那是营业性的，这是国家招待。秘书长又说：我们样板团在国内和杂技团票价一向不同，在日本东京，北京交响乐团（样板团）和杂技团也先后在一个剧场演出，票价也不同，请阿方考虑；不过，我要向团长汇报，最后有什么意见再告知。使馆的一秘把这情况告诉了我，我们当即开会研究，一致不同

意秘书长这个搞法，并要他们将以下意见告知于会泳：第一，票价属阿内政，我不应干涉；第二，杜剧和杂技团演出性质不同，不能以票价高低来衡量剧团是否重要；第三，高票价不利于我为阿工农兵服务。他们当晚回答说于团长已休息了，不便惊动。到第二天九点，仍未从于团长那里得到回答，这时已过了与阿经理约定的时限，阿方即在广告牌上公布：根据中国方面的建议，每张票价定为八第纳尔。此公告贴出后才得到于的回答，同意使馆同志们的意见。

第四次交涉：用车。奥兰当局出于友好，在阿尔及尔派来的两辆小车之外，特增加了一辆团长用车，是法国造的“哈蚂头”，阿部长、省长多配备这种车。十一月上旬末，地方当局通知开车的司机，瑞典首相即将来访，车不够用，要调他和车一起去参加接待，并由他转告团长翻译。阿方这一做法是有点粗鲁，本应由官员们来通知一下，不过这种做法也并非无因。于会泳得知后大怒，说这是撤掉了他的部长级待遇，有意识地冷待，立即让人通知我去交涉。我说阿方处理问题的方式虽欠妥，但瑞典首相来却属实，估计接待确有困难，我们应该体谅；况且，我们在安纳巴没有哈蚂头车也一样活动。结论，不能交涉。于会泳余怒不息，连说“歧视”、“不友好”，但也只好暂时按下，另找机会发泄。不久机会果然被他找到了，于是形成又一次交涉。

第五次交涉：还是住房。十一月十三日，开始拆台，第二天全团要去阿尔及尔。三十来位舞台工作人员所住的那家旅馆提出，他们要接待瑞典首相的随行人员，需打扫房间，请我方人员回安德鲁斯宾馆住一夜。恰在旅馆的于会泳得悉，立即找经理谈话：明天我们就去阿尔及尔，今天你赶我们出门！你这儿不让住，我

们可以睡在马路上，要我们搬回海滨无论如何办不到。经理慑于团长的威势，很快改变主意，通知今晚可以不搬。于会泳洋洋自得地向别人述说这次交涉的经过，并借此发挥说，这些人就是欺软怕硬，很不友好，我早就说过就得斗，一斗就有了房子，这不是明明欺负人吗？听者不禁哑然失笑，你斗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外 事 活 动

于会泳眼里除了他的首长江青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他把这种贾桂作风直接带到了国外。他曾说过，我给江青同志的报告，只要在信皮上注明于会泳，当天就可以批回来，别人都办不到。我们闻之咋舌，但也只能相信。在奥兰，他让秘书写了一份报告，封面上写“江青同志亲启”，下边落款为“于会泳，阿尔及利亚”，信当然已经封好了，问我怎样最快送到北京？我说要先送到使馆，由信使带往北京，不过信使刚走几天，要过三个星期才能再来。他们提出，可否派专人回国送一趟？我表示无法办到。国内明明规定剧团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可是于会泳写报告回国却与使馆党委打个招呼也没有。

于会泳对外活动中的目中无人，却使他碰了个钉子。初到奥兰时，我去拜会省政府秘书长，他除答应帮助剧团解决困难外并告诉说，省长准备会见于团长。奥兰省长在阿尔及利亚有较重要的地位，预先告诉要会见，自属友好表示，我们向于会泳建议，可相机向政府秘书长表示，团长很高兴能与省长见面，具体时间请阿方定。但于会泳不以为然，说这等于求人家，有失身份，等他来看戏时见一见也可以。团内有些人则研究，到底是我国的副

部长大，还是他们的省长大？这位省长架子也不算小，他的试探气球放出后，等了三天（自十一月六日到九日）没有回音，竟于九日宣布取消会见，当晚在奥兰首场演出他也没有露面，不但省长没出席，省里党、政、军首脑一个也没有去。后来演第二场第三场，仍是一个要人也没见到。

安排剧团参观，是奥兰特有的项目，在短短几天中安排了三个。头一个参观新农村，这是布迈丁农村改革的得意之作，动员许多力量和外国设计家进行建设。参观时间为十一月八日，首场演出之前一天。但到了出发之前，于会泳忽然宣布他不去参观，不但自己不去，女男两主角也不去，由副团长率队前往。这种临时改变，明显的降低规格，对组织者意味着什么是不难明白的。第二个参观项目是阿尔佐炼油厂（十一日），这是阿现代工业的代表作，人民的骄傲，没想到于会泳不通过使馆人员迳自在头天晚上宣布取消这个项目。这一天晚间并没有演出任务，只有下午有一个小型的联欢。第三个项目是十二号参观化肥厂。前两个“参观”的效果在这里明显地表示了出来，一位导游在大门内迎接，建议大家不要下车，他驾小车引路，兜一圈就可离厂，这样比较节省时间。有人主张客随主便吧，我没同意，对导游讲：我们是来学习的，重要的是要有实际收获，还是希望给讲一下，参观仔细一点。导游很高兴地答应了，把大家带到接待室，看了模型，又请工程师作了介绍。原来他们早有准备。

还必须提一下奥兰剧场的联欢。剧院经理为表示中阿友好，建议当地表演家与杜剧团团员们见见面，互相奉献些小节目。杜剧团演出了《沙家浜》的“智斗”、《林海雪原》的“打虎上山”、《杜鹃山》武打等节目，每一节目都得到阿方人员有礼貌的鼓掌

欢迎，气氛不错。轮到阿方表演了，两个姑娘在台上跳舞，伴以节奏明快的鼓乐，台下阿方人员接着节拍，哗哗地拍手，间或有叫好声、口哨声，十分欢乐、活泼。看得出来，这是两个姑娘的拿手好戏，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节目。这是一种阿拉伯舞蹈，其特点是除手足动作优美之外，腰部和臀部摆动幅度较大。于会泳认定这就是西方的摇摆舞，自己端坐不动，示意大家不能鼓掌，电影机也停止工作。剧场气氛很快就起了变化，经理纳闷而难堪，这个节目刚完就宣布联欢会到此结束。宛如一支曲子弹到中间由于断弦嘎然而止。双方人员都在纷纷议论。于会泳还以为取得了一个胜利，洋洋自得地说：“这种摇摆舞可不能拍电影，要是在国内一放，小青年们马上就会扭起来。”

两副面孔

于会泳对人的态度可用一句谚语来概括：看人下菜碟。

在奥兰的中期，有一天晚上空台，全团休息。我想，自己身为使馆陪同，半个多月来不曾和于会泳单独接触过，抽机会交换一下意见，对工作有好处，敲门，听到说“进来”。于会泳半躺在沙发中，两脚搁在小凳上，一位女医生正在给做按摩。“有什么事吗？”他问。我讲了来意，他照旧仰在那里，头也没点一下，只是轻轻哼了一声，接着就对医生讲：对，对，就是那儿，使劲捏，好。同时闭上眼睛养神。当时的情景，使我想起了有名的“市公洗足”的故事，不同的是，我没有郗食其的胆识，不敢面斥其“不宜倨见长者”，于也不肯停下按摩。过了约一分钟，为了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我告辞了，于睁开眼说了声好。

更令人气愤的是有关对我们大使的态度问题。大约十一月十

一日，大使给我打电话，说前几天因为忙，离不开首都，未能亲到奥兰照看杜剧团，现拟亲来探望，回程时，车上有两个空位子，还可让两个演员乘坐。大使就这个计划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肝功能不好，这四百多公里旅行，怕会引起犯病，刚送走政府代表团，可稍事休息，剧团十四日返阿尔及尔，见面在即，不必专程一趟了。大使接受了我的建议，要我转告于会泳，并致问候之意。于会泳当时在剧场看演员们准备联欢节目，我到时他正仰在二楼包厢的软椅上，由一个男医生给按摩，旁边有两三个人说话。我讲了以上的事情，于会泳身子连动也没动，翻了一下眼皮，用极为不屑的口气说：“啊，对咱们还来这一套！”说完就指使医生按摩何处，再也没理我还在旁边站着。

若说于会泳总是用上述态度待人，那就冤枉了他。他在江青面前是贾桂和李莲英，对下级也有特为热情、关怀之时。这里讲一下十一月十四日回阿尔及尔路上的见闻。由于是长途旅行，我劝于会泳坐使馆的汽车，同车只有新华分社首席记者张瑶我们三个人，他同意了。这是他第一次和女主角分开，女主角坐阿方小车，就在我们前边。还没有出奥兰市区，于会泳就多次嘟囔前边那个车危险，女主角不安全，神情焦躁不安。张瑶同志和我交换了个眼色，到郊外停了车，他说：看起来非得我下去叫女主角上来不可，不然无法前进。于则忙着去问候女主角。我们向于讲可以更换一下乘客，他欣然同意，阿方司机说：我开这种车已经十八年了，连根汽车毛也没碰断过。更换乘客以后，于会泳谈笑风生，一点危险感也没有了。于向女主角讲自己的日本之行，搞审椅子的经过，作了几首什么诗等等。耐人寻味的是，于讲了如下的故事：当时江青同志要调你到北京搞《杜鹃山》，我就是不放。后来江青同志改

变办法，调我到北京，把你带上，这我才同意。开头我认为你有点骄傲，可是我的指导你还是愿意接受的……。女主角听着听着进入了假寐状态，于赶紧解下自己的雨衣轻轻给盖上。为了不惊动她，他也闭目养神了。

车行二百多公里，到了预定野餐的地方。这野餐是我援阿医疗队帮助准备的，有包子、酱牛肉、茶鸡蛋，由使馆的面包车载上候于中途。这是和阿方司机们一起吃的野餐，以显示中阿人民之团结友好。从奥兰出发前我曾与阿方司机见面，每人一包中国烟，一杯咖啡，共同研究旅途安全问题。我们吃完了饭，演员们乘坐的三辆大轿车还没有到，于会泳就提出要先走，我没同意。过了一会儿，他又提要先走，说有食品车等他们就可以了，我说，大队人马没有来，他们的安全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们怎么能先走？于会泳无奈，只好再等。大队到了，全体无恙，安排他们午餐，我们才继续上路。

别扭的开头

十一月十四日傍晚，《杜鹃山》剧团全体人员到达阿尔及尔市西郊之水上旅馆。这是一个饭店兼旅游区，处于一个窄的半岛上，房屋依山岗修建，一座比一座高，远远望去非常壮观。防波堤把本属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割出一块，形成一个内湖，可以游泳、划船，也可凭窗慢品咖啡，浏览海上风光。这种天工加人工的安排，给饭店带来了繁忙的生意，每年可赚取许多外汇。但接待杜剧团，情形又不同了。这是官方招待的，无外汇可赚，没有小费收入，开水是使馆派人来烧的，饭店连咖啡也卖不了。附带说，当时有人匡算过一笔账，阿方接待杜剧团只是饭费、房租、运

费、招待费等直接开支，即可达九十万第纳尔，按汇率折合人民币四十四万元。各饭店接待这种团，都带有“政治任务”性质，它本身是缺乏经济刺激因素的。

旅客到达旅馆，按常规应先到柜台登记，领钥匙而后进房间。我们使馆同志忽略了这一点，把大轿车直接引到山顶楼前，但碰了锁。回头再找柜台，那里人讲：谁知道你们怎么进去的，越过了我们，也许是从海上来的，空中来的？

餐厅相当阔绰，我们却没有与食堂人员的关系搞好。中午十一点刚过，演员们三三五五地来到了，找地方落了座，服务员不客气地说：我刚摆盘子你们就来了，我还怎么工作，难道你们拿盘子吃吗？此后缺刀少叉、盘碟不净之事屡有发生。使馆李师付在食堂借了一角之地开始做汤，和前两站一样，却不能得到主人的好评。演员们也 and 过去一样，有了中国汤就把阿方的菜剩下，而剩下越多，菜的质量就越次，就这样恶性地循环着。我们只顾自己人吃得如意一些，却忘记了尊重人家的自尊心，终于受到了一点惩罚。有些演员随意向阿方要炒面、炒米饭，这些东西有了后，两菜一汤就变成了一菜一汤，餐桌上自然要传出些责难之声。后来才知道，除面包算主食外，其他都算菜，吃一个炒面自然要减少一个菜。招待标准是国家定的，饭店决不会给贴一个生丁。

我鉴于以上情况，曾与主管生活的秘书拜会一次饭店经理，希望双方很好合作，共同努力搞好接待工作，以不负布迈丁主席之望。经理答应合作。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一月十六日，舞台队在城内搭台（距饭店约二十公里），突然要求饭店中午给送三十份饭去。于会泳总觉得和在国内一样，愿意怎么办，只要一

张口就行了，可是饭店不同意给送饭，说从来没有这项业务。说来说去，最后还是给送了，但已拖到下午两点，而且数量不很多，早已饥饿的舞台队同志们很快就把饭菜打扫了个净光。出人意料的是到下午五点，他们又通知饭店送晚饭，说要开夜车。这一下搞崩了，阿方接待人员上下都表不满。我又找阿方中央陪同（从奥兰就在一起的）研究如何缓和紧张局势，同时劝舞台队回店吃饭。而更出人意料的是，有人决定从十七号起舞台队全体到使馆用餐，阿方中央陪同得悉后说，这个决定不可理解。

演出和演员

在阿尔及尔的首场演出是十一月十九日，即全团到达之第六天。由此可见，借口搭台紧张而让饭店给送饭，纯粹出于习惯性的傲慢，使馆没有坚决制止他们并顺从了他们一些非份要求，确实是考虑对外关系少了一些。按前两站的成例，搭台时间有三天即可。

使馆为搞好在首都的演出，又做了许多工作，向政、军、经、商、文各界有关系的人物发了许多请帖，以大使名义邀请各国外交使节，将首都附近的援阿医生、专家进行适当组织，保证都看到戏。在戏院后台安了个烧水点，专供开水热水，每次演出后分发几百个包子，保证演员们能够果腹安眠。于会泳和女主角等数人则基本上在使馆用晚餐。

首场演出时，阿尔及利亚文化部长到场观看。由于事先的工作，初等教育部长，政府秘书长也到了，按阿的惯例，这已经是很重视的了。演出结束后，文化部长破例上台祝贺。还拍了电视片。看来一切尚称顺利。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首场演完后，于会泳

提出：第二场、第三场将是买票看戏的多，票价十个第纳尔太高了，穷人看不起，不利于我们为阿尔及利亚的工农兵服务，请使馆向阿方提出，要求他们降价。这真是一种讽刺，在奥兰时他们要提高票价遭到使馆反对，现在于团长接过其中的一些理由倒打过来了。大使当即表示，票价问题是阿方内政，我们不便干涉。于会泳很不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剧团演戏，票价与我们有关，怎么是他们的内政呢？大使仍不同意交涉，只好作罢。

演出第三场亦即最后一场时，团内出现了险情。有人向于团长汇报，女主角发烧了，于赶紧去问，原来是扁桃腺发炎，引起发烧，曾经达到近三十九度。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尤其是再有几小时就要开演了。虽然柯湘有B角C角，并且是演技很高的两位女同志，但来阿后就一直没用她们，这压轴戏又怎能让她上呢？随团医生早已给用了药，驻阿医疗队掌握着法国药商给的一些高效退烧药也拿了出来，针片并用。温度虽有下降，仍在三十八度左右。此时第一次看到于团长满面愁云，甚至眼睛湿漉漉的，不安地走进走出，时而长嘘短叹，时而抓耳挠腮，时而“责备”女主角有病不早讲，时而追问医生们能不能使烧退快一点。女主角表示坚强，一再向团长保证可以演出，可以演好。于会泳仍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有的演员在一旁冷嘲热讽地说，“演员嘛，还有不得点病的，只要锣鼓一响，三十九度也照样上场。”那一晚的演出还是正常的，观众中多为阿尔及利亚的文艺爱好者和欧洲侨民，对他们来说东方异国情调的艺术，也算一新耳目了。不过具有一千座位的剧场二、三楼仍有不少空位。散场后，我们看到多处扔着白送的人手一册的说明书，有的搁在座位上，有的则散落在走道中。想到它们昂贵的成本觉得扔掉可惜，顺手拣了五、六本带回使

馆。不过使馆可不缺，此物那里有十多箱、一万二千多本正在等待往回运呢！

接见与赠礼

十一月二十五日，布迈丁主席接见于会泳等人。这次阿国庆二十周年，据说应邀祝贺的代表团一百个以上，阿方定了个不成文规定，革委会主席不接见团长是副部长以下的代表团。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李水清部长，已受到过接见，可是于会泳早在刚到阿时就通过使馆向阿方示意，要代表江青向布迈丁赠礼，布只好在拖之又拖之后宣布要接见，但同时告知，只接见代表团部分，不接见演出部分，人数也不能太多。在这种情况下，于会泳宁可把一些团领导人排斥掉，也带上了两个金童玉女。这不禁使人想到贾宝玉脖子上那块通灵宝玉，某个演员难道是于会泳须臾不可离开的命根子吗？为了这个命根子，外交上的准则都被他踢掉了。

于会泳代表他的首长江青向布迈丁问候，布表示感谢，说全靠江青的安排，我们在北京才得以看到你们的戏，你们的戏演得很好。接着布就讲：我们接待不周叫你们吃苦了，听说第一餐饭你们就没吃好。愚不可及的于会泳正盼望布惩治接待人员以出口气，当然不肯替他们说话，大使只好出面圆场，说接待是很好的，第一晚吃饭少，主要是演员们有点不惯于长时间坐飞机，不惯于时差。布迈丁说，还有个饭菜不习惯，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时请我吃饭，那个松花蛋是好东西，我就吃不惯。布迈丁又提到，你们在外地也吃苦了，房也住不好，我已经知道了。然后谈到他春季对中国的访问，说阿中两国是友好国家，不存在问题。

于会泳代表江青向布迈丁赠礼，礼品有：宋人清明上河图复制品一份，音乐《历史长河》全套录音带（包括古代至今的乐曲数十首），全部样板戏唱片，《杜鹃山》影剧片一部。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杜剧团赠送下边的礼物都远远超过规定，不过他们把它叫做纪念品，像“样板戏总谱”一书，开本，数百页，塑料皮装，每本成本至少二十元上下，他们带了几十本，到处送。应该说，这些劳民伤财的东西，人家并不欢迎，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

布迈丁的回礼很别致，给江青一件典型的阿拉伯女长袍，包皮外面写上半尺高的法文字母，毛夫人。给每个演员（不分男女）四瓶出口葡萄酒，拉了整整一卡车送到使馆。

有意思的是，于会泳对团秘书长说：咱们文化组还有浩亮、庆棠等几位领导，应给他们带回点什么礼物……。秘书长即找大使研究，并添加说：这几位领导和老于关系很好，不带点东西回去过意不去，他们出国时也都有过这方面的先例。大使表示已经明白了，随即与其他同志研究，决定不给个人送礼，而由使馆开支购买二百公斤当地桔子，五十公斤给机组，一百五十公斤给国务院文化组，由他们自己去支配。于会泳得悉后没有说话，此事也就了却了。

临别的争论

《杜鹃山》剧团完成演出任务后，全团上下都在为离阿回国而奔忙，人们每天进出于使馆，请使馆弄饭、派车、换钱、购物等等，却无一人想到应该向使馆汇报一下，至少也应征求征求意见。大使考虑到中央曾有明确指示，党委要领导他们，离开之

前应该来汇报，但仍碍于于中委的权势，不好明讲，就提出剧团和使馆两个党委见见面一起谈一谈，之后请剧团党委在使馆吃饭。于会泳大概只听到了后一句话。

两个党委集合之后，剧团党委的委员都不知所措，面面相觑，无人讲话。大使憋不住了，只好说：请剧团的同志们先谈谈吧！于会泳装聋作傻说：“谈什么？你们谁有话说？老张有说的吗？”老张是副团长，也不肯说，于会泳要他讲，他才东拉西扯地讲了几句，主要是于团长抓的紧，演出成功之类。剧团有两个较年轻的党委成员，一个说：本团到阿后政治思想抓得不够，外事纪律教育差，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具体事例还没有讲就被团长顶了回去。于会泳说：什么思想工作还不够，大家怕得很，有的人什么话都不敢说了。另一个说：我们对外活动注意不够，布迈丁接见时两次提到叫我们吃苦了。于会泳说是他们接待的缺点，对资产阶级就应该斗，你越退让，他越欺负你。经于会泳两次压制，团党委没人发言了。

大使按原定计划作综合性发言，讲了不久，于会泳就表现不耐烦，时而看表，时而与团内的人耳语一两句，后来竟拿起一张报纸翻过来翻过去，弄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大使早已发现了于的这种不礼貌的行动，出于工作需要，还在讲下去。于会泳耐不住了，打断大使的话说：“该开饭了，会就开到这儿吧！”大使说：“我还没说完，不多几句了。”很快就谈到这次在阿所发生的问题，检讨了自身的缺点，指出应对团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外事纪律教育，并特别提到在奥兰和阿尔及尔两次干预和企图干预东道国的票价，这种做法是不妥的。票价问题是阿内部的问题，我们不应干预。说至此处，于会泳插进来，说：票价关系到我

们剧团，不是阿的内政，我们有权提出意见。剧团党委的成员们没人肯发言。我支持大使的看法，指出在奥兰的做法是欠妥的。这样的会只能是不欢而散。国内指示剧团党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在于会泳看来是一钱不值的。

会后便饭时，女主角出来了，陪她的有男主角。他们不能参加党委会，于团长仍把他们带了来陪餐。而一到餐桌，于团长的面孔立即变了，食欲颇旺而谈笑风声，会上的不愉快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混乱的收尾

十一月二十六日晚，大使为《杜鹃山》剧团访问阿尔及利亚举行规模很大的招待会，剧团一百三十人全体参加，请阿官方约二百人（实到百人左右），还请了几个友好国家的外交官。为了这个招待会，使馆上下已忙了多日，光是几十只鸡的鸡毛，就动员了不少人去拔，其他帮厨、采购、招待、收拾庭院、布置礼堂等，占去了许多人的时间。许多外交官穿起白大褂端水送酒，夫人们在后台紧张地刷洗盘碟，连几个学外语的学习员也被动员来参加服务。大厅里有一架钢琴，音乐工作者们通过它进行着交谈，有的女演员在和夫人们周旋。虽然阿方没有高级官员出席，招待会的气氛还是相当热烈、很成功的。阿尔及利亚官方对文体活动一向重视较差，不大出席这方面的活动，只有大型的足球赛除外，知道了他们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不计较其礼迂，也不要求绝对的对等。

外宾全部离开以后，杜剧团的无组织状态就立即暴露了。有人提议与使馆人员一起照相留念，好长时间组织不起来，而一宣

布要回宾馆，就一窝蜂似地去抢车，全无礼让可言。剧团走后，人们收拾庭院，发现两件最大的乐器，排笙和大倍斯仍在停车场一角，并没有交代给任何人，看样子是拿不上车而丢下的。然而明天上午就要离阿回国，这些大乐器难道不要了吗？使馆连夜派车送到宾馆，交给它的主人。

宾馆内乱作一团，达到一个月来之高峰。几天来，人们都在为如何合理用掉那不多的外汇补助费而大操其心，尼龙袜、尼龙布、小孩服、刀片、小食品、小纪念品都成了热门货。有的数人组织在一起，有的则和司机搞好关系一两个人去市场，女主角也居然瞒着于团长，拉着一个翻译跑了一趟自由市场。分东西、算账、装箱等，有人一个通宵没有入睡。我发现，有些人把前几天分到应当喝掉的可口可乐，原瓶装入了自己的箱子，至于分到饼干、巧克力，统统带回北京的就更多了。

最令人感到头疼的是，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集合时却集合不起来，有人一早上街买东西、退换东西迟迟不回。说来也实在小气，有人买两双袜子，已退换过一次，今晨又去退换，完全不顾中国人的尊严与国家影响。而这些，团内从不讲一句话。

前一天晚上我曾提醒团内负责人，离开宾馆时，房间要稍事整理，钥匙插在门上，便于服务员检查。但我没有具体抓，而二十七日早上我还有一摊子工作要做，也顾不上管团内的事了。结果，离开时也和进来时一样一哄而去，到底留下了何等问题，谁也不知道。在机场则更乱，群龙无首，各自一方，集合点名更谈不到。按机场规矩应排好队顺序出关，杜剧团的人则一拥而上，在那里乱挤，出关的效率反而更低了。我多次到该机场，从未见过任何代表团出现这样无政府状态。剧团一位翻译告诉我：“我

陪过许多代表团，从来没有见过比于会泳水平更低的团长。”真是有其将必有其兵。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被江青选中，把守着中国文艺文化牢狱的大门，不放任何异己的社会主义作品出来。于会泳曾对我们讲：“今后剧团出国主要要出样板戏，杂技团一类的不解决问题。”看来，他连国门也要把住了。

十二点半，专机慢慢滑向起飞跑道，杜剧团在阿尔及利亚引起的乱才平静下来。

（一九八〇年九月）

王佐、袁文才被杀事件

裘之倬 邹耕生

袁文才、王佐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前，宁冈、井冈山两地方武装的首领。后来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革命，成为红四军三十二团的优秀指挥员，立了不少战功，光荣地被选为湘赣边界特委委员。袁、王被杀事件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上的一大悬案，多年来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结论。在彭德怀同志蒙冤期间，则被说成是彭德怀同志的一大罪行，广为流传，这是不公正的。历史真象究竟如何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里，我们试就自己了解的材料作一粗略的叙述，以期能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澄清有所帮助。

被杀情形

一九三〇年二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为名，召集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率领本县武装，到永新县城集中。袁文才、王佐也接到了同样内容的通知（给袁、王发通知的单位尚不能确定，一说是边界特委发的，一说是红四军发的）。袁、王接到通知后，于二月下旬的一天带领一部分部队，开

进了永新城。

袁、王二人被安排住在城东门附近，所带的部队安排住在另一个地方，中间隔了一段距离。王佐住的那一栋，当地呼为“家祠”。入夜，袁、王和部队都受到了大量酒菜的款待，特委书记朱昌偕亲自把酒菜带到袁文才房间，和袁对饮，九、十点钟才离去。

这一天，永新城内只有先到的各县地方武装，没有正规红军部队。彭德怀同志和红五军军部远在九十多华里外的吉安县永阳镇附近。但就在这天晚上，红五军第四纵队（三百人以上）从永阳附近出发，直奔永新城，拂晓前从北门进城，立即分头把袁、王住地和袁、王部队的住地包围了。他们每人脖子上（一说臂上）都挂了白带子，受命遇到没有挂白带子的，可以开枪。永新城这一晚也换了新口令，而且是双重的，一普通，一特别，对回答不出的也可以开枪。

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来不及动作，就被朱举枪打死在床上。

王佐已经听到了动静，带着警卫员冲出了包围，跑到东门外。东门外是永新有名的“东关潭”，——其实不是“潭”，只是绕城而过的禾水的一段较深的河床。河面上本来有木船和木板构成的浮桥，这时已被拆断。王佐在桥上跑了一段，落入河中，追兵迫近，河对岸山上似乎也有部队。王佐不会游泳，终于沉没了。几天后，尸体在下游浮出水面。

袁、王带的部队同时被缴械，一批干部被当场逮捕，以后下落不明。战士愿留的编入红五军，不愿留的允许回家。

那一夜，永新城内枪声杂乱。第二天传出话来：“袁、王反水，被红军解决了。”

事情的起因

袁、王遭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袁、王本身的问题 袁、王二人出身绿林，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部队有很多不良习气，他们从来是天地人“三不管”，过不惯受人约束的生活。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进军赣南，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曾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随同部队出发。袁文才中途开小差，跑回了宁冈老家。他们对毛泽东同志很尊重，很听毛泽东同志的话，但对别人却不一定。不服从上级调动、不遵守红军纪律、遇事自作主张的事，时有发生。一九二九年二月《杨克敏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写道：“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力量，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袁、王二人相较，则王较爽直，但都是个性很强，不大接受批评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口是心非，……甚至不接受（如袁文才从前不主张宁冈分田，说宁冈农民根本不能革命）……。”这段话是基本可信的。

在生活方面，袁、王也不检点，吃喝嫖赌的行为都是存在的。有一份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红军第五军寄来的信》的文件，说他们“自过花天酒地的山大王生活……”，生活作风方面的不够正派，可能是有的。

2、边界地方党委的问题 边界地方党委对袁、王怀有很深的恶感。这有历史的渊源，也有新产生的矛盾。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提到：“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矛盾历来被统治阶级利用。土客籍群众之间的流血事件纷起更迭。边界建立党的组织以后，也反映到共产党内。一九二八年井冈山斗争“八月失败”时，土籍农民受反动派挑唆，大部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红军重回边界打跑白军后，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经过教育好了一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袁、王二人是客籍的首领；边界地方党委成员多为土籍；感情上素有裂痕。

喜欢闹独立性的袁、王，对地方党委的不尊重，更加深了这种裂痕，双方离心离德，互相猜忌起来。边界特委关于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八月边界情况的一个报告说：“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从二八年到三〇年一直作为边界地方党委主要成员的王怀、刘珍、龙超清等人，对袁、王都是讨厌的。和袁、王接触较晚的后任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也是同样。据个别资料记载，龙超清有一位亲属，是被袁、王杀掉的。从当年留下的一些边界地方党委的文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边界地方党委对袁、王深恶痛绝的情绪。

3、中央有关政策的“左”倾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一段“对土匪的关系”：“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

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开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或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些话显然是错误的，可以说是开了三〇年以后肃反工作中极左政策的先河，对尚能参加革命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群众，采取“严厉镇压”、“完全开除”、“驱逐出去”的做法，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孤立自己，有利于国民党反动派。

湖南省委也有类似的指示：一九二八年六月一封给边界的指示信说：“……四年的改造工作，应当立即开始，注意洗去流氓无产阶级、土匪与红会的分子，增加工农的志愿兵。”

中央和省委的这些精神传到湘赣边界，边界地方党委自然地把袁、王划入“土匪”的范畴。早在一九二九年二月《杨克敏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就预言：“……我们与他们（指袁、王——作者）利害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也任过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在同年八月以后写的一个报告中说土匪问题“急待解决”，对解决办法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下策就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亦即杀掉。

对袁、王的评价

袁、王的早期行为表明，他们确实是绿林中人，决不仅仅是与“绿林好汉”有过来往而已。王佐十几岁就入了伙，是井冈山著名“匪首”朱聋子的得力部下。袁文才也在二十岁左右投身绿

林，担任他所在那一伙的文书。后来他们成为首领，就单独大张旗鼓地操起了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营生。井冈山一带“自来为土匪、散军的窟宅之所”，大大小小的司令举不胜举，袁、王能从一个普通成员，成为自拉杆子，独占一方的首领，是和许多对手进行了多次生死搏斗才取得的，实属来之不易。

但是，袁、王有不同于一般绿林的地方，他们除了经济目的以外，还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目的。两人出身贫寒，袁文才家里是普通自耕农，本人是学生。王佐家里几乎一无所有，从小就离开家庭给人当裁缝学徒。参加绿林前，都有过痛苦的生活经历。袁文才先是失学，后是老婆被人强占，母亲被豪绅枪杀，王佐则从小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怀着复仇，寻找出路的动机加入了绿林。因而他们“劫富济贫”的旗帜特别鲜明，专和官府豪绅做对头。他们具有正义感，做事情讲几分公道，加上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政策，所以获得宁冈、井冈山群众的拥护，成了那一带群众的“保护者”。上引的一九二九年杨克敏的报告也承认：袁、王“与各地的土豪劣绅作对，结下很深的仇怨”，并且“各有群众”。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袁、王二人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革命影响，袁文才和宁冈县共产党组织结合，夺取了宁冈县政权，自任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佐和遂川县农民协会发生了联系，把自己的部队改称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袁、王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和莲花、永新、安福等县的农民自卫军一起，率部队攻打永新城，救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百人，立了一大功。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在四面白色恐怖的包围下到达井冈山地区，得到了袁、王的积极协助，顺利解决了立足点问题，使部队得以休养生息。倘若袁、王当时不是积极协助，而是反戈相向，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立脚几乎不可能。袁、王这一历史功绩不能抹煞。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袁、王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使袁、王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他们从革命中发现了自己的出路，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王佐对毛泽东同志推崇备至，经常翘起大拇指说：毛委员真了不起，是中央人材，能成大事的！袁文才也感叹地说过：共产党真会带兵，这样搞怎么能不打胜仗！他们由原来的“受编不受调”、变为“既受编也受调”了。王佐在毛泽东同志批准下，由何长工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二月，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同年五月改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袁任团长，王任副团长。他们多次参加重要战斗（如龙源口战斗、黄洋界保卫战等），有战绩，有贡献。

一九二九年初的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当守山的主力红五军不得不突围下山的时候，王佐仍然在山上坚持斗争。敌军主力一撤走，他就打出山林，扫荡了还在为非作歹的地主武装挨户团、靖卫团，恢复了山上的红色政权——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在边界特委的领导下，继续打起了红旗，就在这时，他把自己的部队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担任了五纵队副司令员。袁文才一九二九年一月随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四、五月间私自离队跑回边界，当然是一个错误。但回来后接受了党的组织处分，继续投入边界的革命斗争，担任了宁冈县委常委。这样一

直到被杀，他们的表现基本上是好的，对边界地方党委的决议仍然执行。三〇年二月，他们老老实实按上级的通知，自动前往永新城，就是他们对革命忠诚的明证。

袁、王不算太长的一生（均为四十岁左右），经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对黑暗社会的自发反抗，使他们成为“绿林好汉”，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使他们靠近了革命，最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身上带有种种缺陷，但从发展趋势看，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存在改正错误、抛弃劣习，成为较好的革命战士的很大可能性。对他们要历史地看待，不能用今天的水平去要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他们这样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呢！

我们认为，袁、王是革命的同志，袁、王具体领导的队伍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杀害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责 任 问 题

袁、王被杀，责任在谁？

首先，中央的“左”倾政策要负主要责任。在袁、王事件的演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央“六大”关于土匪问题的决议。决议传到边界是一九二八年底，关于“土匪”问题一节，当时回避了袁、王。袁随红四军主力到赣南，据说得知了。或许这就是回到边界后，和王佐的态度都发生变化，被指为“处处怀疑”的原因之一。边界地方党委则以中央决议为依据，大做文章，动不动就提出实行“解决”。于是双方愈搞愈僵，终于把“解决”付诸实行了。

把袁、王被杀事件和以后肃AB团、“改组派”联系起来看，可以看出是势所必然，不是事出偶然。袁、王即使三〇年二月不

被杀，以后也要被杀的。在肃反的极左政策指导下，连宛希先这样历史清白、表现突出、资格很老、职务较高（曾任前委委员、边界特委书记）的同志，都被安上反革命罪杀掉了，袁、王还能幸免吗？

其次，湘赣边界地方党委要负第二等的责任。一九二九年一月初，毛泽东同志在“柏露会议”上传达“六大”决议后，曾在小范围内对袁、王有一个分析，认为袁文才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虽然不是党员，但过去和豪绅对立，经过改造又入了党，性质已经起了变化，不能视作“土匪”，没有理由杀他。毛泽东同志这一分析是比较中肯的，所以当时没有按“六大”决议去处理。边界地方党委却不是这样，他们囿于偏见，根本不作具体分析，一口咬定袁、王就是“土匪”，均属该杀之列。向上级反映情况也不实事求是，多为污蔑不实之词。

袁、王被杀后，赣西南特委（一九三〇年四月宣告成立）在“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的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的列字一号通告中，给袁、王的罪名是两条：一是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让我们逐条来看看吧！

在分田刚开始的时候，袁、王可能有想不通的地方，有过不同意的表示，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们是按党组织和毛泽东同志的话做了的。宁冈是根据地分田最早的一个县，而且分得比较彻底。王佐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土地革命的解释，把井冈山的田地都分给了农民群众。这是有大量资料证明的。至于“反对建立苏维埃”，纯属无稽之谈。第一条罪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茶陵紧旁永新，茶陵靖卫团和永新赤色政权是老对手。茶陵

靖卫团团总罗克绍有一批好枪枝弹药，袁、王早就想搞过来。一九二九年冬天，袁、王用便衣“吊羊”的办法，从茶陵活捉了罗克绍，要茶陵方面拿出枪枝弹药交换。边界地方党委有人劝袁、王杀掉罗克绍，袁、王没有同意，觉得杀掉个把人作用不大，也夺不到他的枪枝弹药，就把罗克绍关押在井冈山。一直到袁、王被杀，王佐的弟弟王云龙反水投敌，罗克绍才被放出来。这就是所谓“勾结茶陵靖卫团”的事实。第二条罪名是捕风捉影，胡乱猜疑。

杀害袁、王时，湘赣边界地方党委是具体的谋划组织者，当时的书记朱昌偕是为首的行刑人！

据一九三〇年七月《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载：“这一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

“……完全由彭同志指定等几位同志开会，CY完全没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永新城来……。”彭清泉（即潘心沅同志）的责任包含在中央“左”倾政策和边界地方党委的责任之内。

最后，彭德怀同志也有责任。一九七九年十月《近代史研究》发表的他的《往事回忆》一文中说：湘赣边界地方党委在永新县城举行扩大会议期间的“某天晚上，特委书记朱长偕（即朱昌偕——本文作者）同志和另一个同志，可能是王怀，也可能是陈正人同志（记不清楚），二人来到五军军部。他们反映说，王佐、袁文才要边区武装归他们指挥和改编，在会议上威胁特委通过他们的提议，作出决议，王佐在讲话时手里拿着驳壳枪。我们当时说一九二九年夏，王佐同五军去粤北活动时表现不错，为什么现在变得这样呢？他们说，主要是袁文才从红四军回井冈山后挑起来的。我们又问其原因？他们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四

军前委在宁冈讨论‘六大’决议时，袁、王二人参加了，在讨论时，将‘六大’决议中关于争取土匪策略的一段剪去了。……但不知袁文才在红四军怎样得知了‘六大’决议的全部内容，他回来就同王佐说共产党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土匪出身的，王佐非常听信袁的话。朱长偕同志说，如果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同志进抵永新城郊。”

“假设这些符合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一年，当敌人进行‘三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决定在桥头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就犯了轻信的严重错误。”

我们认为，彭德怀同志对自己的批评是适当的。他在袁、王事件上所负的责任，就在于轻听轻信了地方党委负责人的诬告，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铸成彭德怀同志这个错误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他到湘赣边界的时间较晚，以后又多次到湘、鄂、粤、赣边界进行游击活动，对边界的情况不可能象毛泽东同志那样清楚。再者，当时规定，红军凡到一地，须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所以朱昌偕等人的话对于红五军是有一定份量的。

事情过去了整整五十年，我们终于重新迎来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党史的大好时光。强加给彭德怀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袁文才、王佐同志的屈死应予正确张目。这样，才可告慰先烈！

本文参考文献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委的信（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九日）

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共“六大”决议案之一（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界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邓乾元：《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八月）

江西省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

赣西南特委向省委的报告（一九三〇年三月）

由红军第五军寄来的信（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

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一号（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红三军团历史发展的座谈会纪录（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斯诺：《中国的红星》

张国华、柯长工、陈正人、谭震林、彭鹤、陈伯钧、李立、周礼、姚喆、李寿轩
等同志的回忆。

（转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关于叶挺同志的资料

〔编者按〕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不幸被捕，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在囚禁期间，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气节。这里刊载的两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被囚期间的叶挺将军

沈 醉

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地区纠集七个师兵力，围攻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捕后，解送到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囚禁了一个很长时期，蒋介石即命令顾祝同将叶将军解往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实际上，是交由军统局去看管。当时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公开职务便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处长。叶将军解到桂林，即由杨继荣派办事处警卫组特务将叶将军囚禁在桂林七星岩附近一个山洞内。内

部看守由军统特务负责，外部另派有一个排的宪兵担任警戒。

一九四三年春间，蒋介石又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叶将军解往重庆。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我有个兄弟叫沈默，任军统桂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兼民众情报处的警卫组组长，是负责看守叶将军的人。有一天，我接到他从桂林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第二天将乘班机解送叶将军到重庆，要我去接他们。我当即与军统司法处处长沈维翰联系，他告诉我，早已通知军统特务团（又叫特务总队）团长杨清植作好了准备，希望我和杨一同去机场照料。

第二天上午，我和杨清植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当其他所有乘客都下了飞机后，我才看到沈默陪着一个头发胡须很长的人最后走下来。这个人手上提了一盏植物油灯。这是用几根竹子做成架子，上面安放一个小铁锅，灌上植物油，加上灯芯，便可点燃作为夜间照明用的。当沈默向我和杨清植介绍这便是叶将军时，我们先向他行了军礼，他客气地点了点头。我说了一句：“军长辛苦了！”他毫无表情地回答：“没有什么。”走出机场时，他仰头看望了一下，便自言自语地说，“呵！到了重庆。”我很好奇地问他：“军长为什么拿着这个油灯？”他微笑着把灯举得高高地说：“我这两年一直和它作伴，我准备把它带在身边作一个永久的纪念品。”

杨清植专门为叶将军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窗子都用布蒙好，因为由珊瑚坝飞机场到公路上，要爬几百级石阶梯，恐怕被人认出来。叶将军看了那乘轿子，很不高兴，不想乘坐，但杨清植坚持请他坐进去，最后，叶将军才勉强答应了。我们紧紧跟着，还有二十多名便衣警卫都分散在前前后后。杨清植生怕出问

题，担心会有人劫走，所以把轿子一直抬到汽车旁边。下轿后，我和沈默、杨清植三人陪叶将军乘一辆汽车，前后都有一辆警卫汽车，一直把叶将军送到林森路望龙门第二十二号军统特务团团长的住宅安置下来。这所房子离特务团在望龙门两湖会馆的团部很近，一向是团长的住宅，这次是临时腾出来给叶将军用的。

在返回途中，我埋怨沈默为什么不给叶将军理理发，弄成这个样子，多惹人注目。他便告诉我一些叶将军被俘后的情况，和在桂林的生活。他说，叶将军自被俘后，便一直拒绝理发、修面。坚决表示他是在前线抗日的军官，没有什么错处，为什么要逮捕和囚禁他？因此以不理发、不修面表示自己不获自由决不妥协的精神，什么人去劝他都不行。叶将军在桂林弄了一头奶羊，每天亲自去放牧和割草当饲料，自己挤羊奶吃。这次原想把羊一起带走，因坐飞机不便才没有带。叶将军每到黄昏，因规定不能出山洞，便只好在油灯下看书报，写日记，所以对这盏油灯很爱好，这次一定要带着走。平日对一些看守的小特务态度很和蔼，从不要求做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但是一些大官去见他时，越是官大，他的态度也越坚决、严肃，总是抗议为什么囚禁他？……我回军统局见到戴笠时，便把叶将军已解到重庆及在桂林的情况向他报告。他指示我，在生活方面可以好好照料一下，并再三告诉我一定要使叶将军理理发，因为蒋介石可能要见叶，隔不多久，有天戴笠便告诉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要去看叶将军，要我先去准备一下，特别是给叶将军理好头发，换一套好点的衣服，房间也要弄整洁一点。我立即带着理发师和副官等去见叶将军。我先和他谈了一些生活起居方面问题，他表示没有什么要求。最后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说重庆的天气如何闷热得难受，许多人头

上长虱子等一类话，劝他把头发稍许剪短一点。不料话刚出口，他便看出我去的用意，马上睁大着眼睛，很严肃地对我表示，不获无条件释放时，他是不会剪去头发的，天气再热也能忍受，叫我不必替他担心。我印象很深，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

“我决不会为了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理须发。”衣服也不肯换。我碰了钉子后，只好回去向戴笠复命。他说，这个人的个性一向倔强，他爱怎样就由他去，以后慢慢地来，不要太性急了！

大约过了两、三天，陈诚便去看叶将军，戴笠特别叮嘱杨清植要多加注意，因为陈的态度傲慢，叶将军个性倔强，怕出问题。杨清植便带着几个警卫伏在窗子外边。他们两人过去认识，见面后，谈了一些闲话之后，陈诚便提出想请叶将军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征求叶同意。叶将军当即断然拒绝，并坚决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去继续担任军长，同时督办围攻新四军的负责人外，其他任何工作都不会去做。并且一再责问陈诚，为什么要袭击正在对日寇作战的新四军，他抗日有什么罪，要把他逮捕囚禁起来？他还一再指出国民党这种做法只是对敌人有利，对国家和民族不利。问得陈诚无话可说，最后只表示希望他考虑一下，以后再谈。陈诚去时，趾高气昂，出来时便垂头丧气，什么话也没有说，便气冲冲地走了。

又隔了一个时期，陈诚再次去看叶将军，仍然没有结果。据说，叶将军的态度更为强硬，弄得陈诚狼狈不堪地匆匆走了。

自从叶将军断然拒绝陈诚提出请他去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戴笠便奉蒋介石的命令取消了对他的优待，而把他从望龙门二十二号移送到中美合作所内白公馆囚禁。

叶将军便在这所座落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西边楼上正房内囚禁了一年多。以后，因中美合作所的美蒋特务看中了这座房子，戴笠便把囚禁在白公馆的其他犯人移禁到中美合作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将叶将军一个人移到中美合作所东南角洪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离囚禁廖承志先生不远的另一座小平房内囚禁。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释出时为止，再没有换过地方。当时戴笠把这个地区划为中美合作内的“禁地”，专为囚禁高级政治犯用的，警卫特别森严，一般军统特务分子都不能从这里经过，更不准接近这些一排三、五小间的独立平房。

叶将军被囚禁在军统期间，我去看过他三、四次。每次问到生活上缺少什么时，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日很早起身，便洗冷水澡，作一会体操。早餐后便看书报。他对国民党的报纸很厌恶，每拿起看一下，便丢在一边。但因他一直是单独囚禁，没有人和他谈话，所以往往只好把丢在地上的报纸又拾起来再看下去。当时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侯子川，是一个很凶残的家伙，动辄对犯人打骂，但他对叶将军却不敢随便，有时他去见叶将军，叶将军还劝告他不要对人太过分等一类的话。

叶将军移禁白公馆不久，戴笠有一次去附近看中美合作所房屋建筑工程，顺便去看看他。当时我和总务处一个管工程的科长侯楨详一同陪着去的。看守所所长侯子川马上叫人到楼上去通知。我们进去时，叶将军还是穿着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柄大葵扇在纳凉。平日我去看他，他还有说有笑，而那次戴笠去看他时，却爱理不理。侯子川怕他不知道，便告诉他：“戴先生来看军长。”他仍坐着不动，只回答一声：“我早知道了，你不

是已派人告诉过我？”戴笠向他打招呼，他把嘴呶一下，“请坐。”戴一看这样子，知道没有什么好谈，也只问了他一下生活情况，他仍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笠一看他这样冷淡，心里老大的不高兴，连坐都没有坐，站了一会便走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向蒋介石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我又特地去看过一次叶将军。当时，我有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心理，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在被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因为军统监狱中也常常囚禁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军统大特务，他们在释放出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先与家里的人见面，如何去吃一顿多年来想吃而吃不到的东西，或先去照一张相片，……等一类个人享受，以补偿被囚禁期间的损失。而我那次问到叶将军时，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听了我的话以后，象是有长时间的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回答我说：“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他的这个答复，的确使我感到惊异。我过去一直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我当时是绝不懂得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即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而甘愿长期忍受着监狱生活的种种折磨和牺牲一切。我当时很想进一步问个明白，但看到叶将军说完这句话之后，昂起头凝视着窗外久久一言不发，我怕碰钉子，便赶忙辞出，并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其实，我一直受到戴笠的指示，企图能从生活上使他多提要求，而逐步使他改变态度，转到蒋介石那一方面去。所以当我听了他那坚定明确的表示之后，感到非常失望，并把这一情况报告戴笠。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之后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用叶挺将军交换马德五。戴笠派军统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挺将军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叶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那盏从桂林带到重庆的小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提在手上，准备出狱。这时，叶将军的头发已长得披到肩上，胡子也已到了胸前。当他上汽车前与我告别时，他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以骄傲愉快的神情，抚着长发和胡子对我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要把它自动剪下来，但是我还是要好好保存起来。”

叶挺将军在恩施的几件小事

柯南山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遭俘。

叶挺将军被俘后，曾先后两次囚禁于湖北恩施。因联系一些事，我曾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会见过叶挺将军。

一九四二年，叶挺将军来恩施，住在恩施湖北省供应处民享服务部东北招待所，我常见到他和夫人带着小孩散步，衣着简朴，身体健壮，前后有不少便衣特务“保镖”。当时叶将军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都在东门小学读书，他那天真可爱的孩子，也同样有特务监视着。不久，他们全家又被国民党特务转移到别地去了。

一九四三年，叶挺将军又一次被转来恩施。我当时在恩施南

门正街湖北省银行供职兼省行员工消费合作社经理，根据省银行兼省供应处总经理周苍柏面嘱，用叶希夷的名讳给叶将军填了一张合作社购买证，从此由我社给其供应生活用品。没过几天，叶将军在一个矮小的“勤务兵”陪伴下，来合作社参观，由我负责接待。叶挺将军态度温和，对当地老百姓的食盐供应极为关心，特别问我：“山区农民的食盐能否供应得上？”我告诉他合作社不对外，但民享服务部办有物物交换，农民可以用蔬菜换食盐、棉布等。叶将军点了点头。

叶将军第二次来恩施，自己养了一批猪、羊、鸡、鸭，还需要一批良种。一天，周苍柏总经理电话通知我，要我去向叶挺将军面告，已派人到外地选购良种，一俟运到，即可送去。我当即按电话指示的路线去见叶挺将军。

叶挺将军住在西门外一幢土墙民房中，当我到房前禾场时，他正在门口。当我说明来意后，他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并带我参观猪圈、鸡笼等，他说：“中国农村十分落后，不改良家畜品种，农村副业就无法发展。我现在反正做不了别的事，想在这方面实习一下，也许能积累一点小小的经验。”在谈话中，叶将军又把农民的食盐问题提出来，要我们关心一下。当时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感到面红耳赤，因为我毕竟是为反动政府服务的，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当我告别叶将军返回时，在他住房附近受到几个摆小烟摊的人盘问，我才知道，这些人是化装成小贩的便衣特务，他们是监视叶将军的。

不久，叶将军又被国民党当局转到别处去了，从此再没见面，但他的形象使我至今不能忘怀。